

ISSN 1016-0566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出版

◎ 第 35 期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三十五期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簡述.....	區志堅 1
	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江沛 13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紀念梁啟超〈新史學〉	
	發表 100 周年」會議紀要	牛貢傑 26
	「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沙培德 40
	「中國近代國家的塑造」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任育德 47
	「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	鍾淑敏 51
學術演講	歷史的觀點與現代——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濱下武志	55
研究概況	香港本土中醫藥歷史的研究概況和史料徵集(1949-2002)	
	吳國樸 70
	從「邊緣」邁向「正統」——中國歷史裏的香港史研究	
	李培德 86
史料介紹	中央研究院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整理日治時期	
	臺灣總督府檔案計畫概述	莊樹華 102
	《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1895-1927年》簡介	
	朱蔭貴 111
	關於近代貴州鴉片檔案存藏等情況的補充	秦和平 114
	編後語	謝國興 116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永發

執行編輯 謝國興

助理編輯 吳鳳蓮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半年刊 **第35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辰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出版

GPN 2007500014

ISSN 1016-0566



學術會議

「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 國際學術研討會簡述

區志堅*

中國社會史研究早在清末民初已開始，20、30 年代馬克思主義及西方社會學理論的傳入，更為此課題建立學理基礎；50 年代，國內史學界在「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等課題帶動下，加速社會史研究，至 80 年代，隨輸入歐美等西方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史學受到衝擊，開拓不少研究社會史的新課題，學界提倡多探討中國社會的現況，也對各個區域，進行細密研究，使社會史研究，既有通博，也有專精，為團結國內社會史研究隊伍，並多與海外學者交流，故成立中國社會史學會，並舉辦一連串中國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史學會、上海師範大學、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蘇州大學、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協辦，假上海師範大學於 2002 年 8 月 15 日至 18 日舉行「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次會議為中國社會史學會舉辦第九屆有關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課題，與會學者包括：國內多個省份、香港、澳門、台灣、日本及美國學者，筆者則以任教職位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代表之一的身份，參加是次會議。因為是次研討會議的論文以明中葉以來的近、現代的社會史問題為主，故本文也以介紹這些論文，藉此可見近年學界對此課題的研究大概。同時，是次會議不獨探討中國各地區域的歷史民俗、文化及

*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導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

經濟發展，更注意商會經濟、商人社團、商業網絡、社會民眾活動與中央的關係，也有日本學者比較日本區域文化與中國社區的異同、日本社會文化的特點等。是次會議共分四組，主題是社會互動與社會變遷、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社會生活與社會變遷及綜合因素與社會變遷，按時間先後分為五場同時進行。現把是次大會討論的內容，紀錄如下：

第一組

第一場，王玉波的〈中國家庭、社會、國家互動與社會變遷——從家庭史角度的探討〉一文，認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內部存在一個多層次又穩定、規範化及習俗化的互動系統，而家庭既是社會的組織基礎，生活、經濟、國家行政及文化傳承的載體，中國傳統社會家庭權力的建立就是家庭內部及外部互動的因素；至明清二代，國家政權更扮演了向家庭徵賦役，獎勵農耕，進行教化，賑濟救貧的角色，而國家與家庭是互動的，世家大族及士紳也要倚賴國家政權而生存，家族勢力要藉國家與地方政權而建立。胡惟平的〈國家、地方、民眾互動中的徽州古村落——龍井村〉一文，指出龍井即現在徽州的績溪縣上莊鎮宅坦村的古稱，與胡適的故鄉上莊村接壤，此地保存了太平天國及抗日戰爭時期很多文獻及檔案，有助於了解戰前徽州的社會民生發展，文中提出雖然徽州名門大族胡鐵花，對兒子胡適影響甚大，但也可以多注意庭訓對胡適的影響。潘同、徐松如、徐寧在〈關於國家、地方民眾相互關係的理論與研究狀況的概述〉一文中，綜合介紹西方「內卷化」，「公共領域」內強調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理論，文中也介紹海外學者黃宗智的「第三領域論」，施堅雅的「中心邊緣論」，杜贊奇的「權力文化網絡」論；文中更談及國內學者已注意從市民社會、士紳階層、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民間信仰和傳說、宗族社會、民間社團的研究領域，探討國家、社會、民眾的相互關係，國內學者多認為近代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主要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不獨強調國家對地方的擴張，地方士紳也會反抗國家的壓迫。山本幸司的〈日本的社會史研究〉指出 20 年代的喜田貞吉為開創日本社會史研究的先河；70 年代，日本社會史學界研究對象多向職業匠人、商人、演藝民等非農民階層，還有女性、兒童、病人、家族等，研究領域也有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心性史、繪畫史等；就史料而言，更包括利用僞文書、古文、繪畫、考古遺跡、田

契等，更指出日本社會史的興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主流有關；60 年代，學界更再次把社會放在國家對立面重新考察，否定簡單及直線的社會史觀。

第二場，陳東有在〈明清時期對外經濟互動中的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一文中，認為 16 至 19 世紀海洋強國的全球經濟與中國東南沿海社會發生持續不斷的互動行為，而中央政府往往以中華中心意識輕視異域，民眾則從自身利益出發，多積極推動海外貿易，但因中央禁令使民間與海外列強的貿易，變為走私，地方政府處在中央及民眾之間，左搖右擺，但此也給予地方發展空間的機會。李玉梅的〈《徐渭集》所反映的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從現刊行《徐渭集》的詩文中，看出明中葉社會、地方、國家的互動關係，尤指出此時社會上好貸成色，思想多元，配合文士個人觀點與政治無意識，呈現出一幅後現代主義的圖像。戈春源的〈從明清蘇州山塘街的保護與建設看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社會變遷〉一文，指出今天建成的蘇州山塘街，只是塑造此地在明清以來的破壞、保護與建設情況，深入探討可知山塘街是國家法令、蘇州地方政府、地方宗族、同鄉會、宗教組織、慈善機構及民眾力量的結合；但也因出現保護力量不平等及不平衡分配資源，導致山塘街商業衰落。

第三場，吳建華的〈晚明江南的社區失控與國家、地方士紳、民眾的互動——「民抄」董宦事件的個案研究之四〉從社會規範及社會控制的角度，探討明朝萬曆年間，江南發生的「民抄」鄉宦董其昌的事件，此事反映了江南社區的相對失範、相對失控和恢復控制的過程，並指出此事使社會規範受到檢驗，道德和法律重新定位，社區心態得到滿足。唐力行的〈從抗戰前夕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組織向血緣化的回歸——兼論國家、民間社團、商人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利用 1905 年編《吳山汪王廟志略》及 1936 年編的《吳山汪王廟志略續編》，研究汪王廟的變遷，探討抗戰前夕汪氏宗族組織建立的前提條件，以及該組織結構、功能和運作機制，指出汪氏宗族組織在杭州徽商的營商網絡中的角色，可見宗族組織和同鄉會均利用血緣、地緣關係，以擴大生存空間及其與中央政府關係。張元隆的〈從清末民初教育團體看國與民的互動〉指出清末民初地方人士以社團為載體，自下至上參與研究和實踐教育革新，在國家與民眾間形成雙向對流和共振，官民結合的中央教育會成為政府職能部門與地方教育人士協同議事的渠道，也可見民間社團的多元並存和學界群體的參與意識。黃東蘭的〈國

家、地方社會與地方自治——清末川沙自治個案研究》，研究地方自治對基層社會、國家及地方的關係，以清末江蘇川沙縣發生的自治風潮為例，說明此社會的書吏、士紳和民間宗教團體「素黨」各有活動範圍，並形成各自權力基礎，最後說明清末地方自治的形式，既是導入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也多承襲傳統官紳間的協作關係。

第四場，錢杭的〈不了了之——從湘湖水利之爭看中國社會基層的自治問題〉利用大量志書資料，指出自南宋至民國，浙江省蕭山縣以西的人造水庫「湘湖」，因蕭山特殊的地形、地貌、航運、開發，不斷發生皇權、產權、地方官吏及地方自治之間的衝突，終致不能落實水利工程的美意。張思的〈近代華北農村青苗會的成長與村治——以寶坻縣、獲鹿縣為例〉以近代華北「青苗會」為例，指出村民自治與官方的利益衝突，有時也會出現利益互相協調的情況，可知地方自治以利益為調節的根據。李懷印的〈鄉村中國的權力、衝突與合法性——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獲龍縣的村長選舉糾紛〉一文，利用獲龍縣政府檔案，以村長選任糾紛案例，說明這些糾紛發生在鄉間擁有權力的士紳與傳統村社領袖之間的權力關係，及自以功名，或族中地位成為權力核心，漸向以個人實力、分工的權力的過渡情況。趙世瑜的〈權力網絡與社會變遷——以清末浙江湖州雙林鎮為個案〉利用地方志書、民間故事及檔案資料，說明清末浙江湖州雙林鎮地方士紳與商人組織的網絡，指出昔日村鎮市民生活受到外力影響下，過渡到近代的特色。邱捷的〈清末廣州居民的集廟議事〉指出清末「集廟」是街區居民在廟宇中決議事務的地方，並說明晚清廣州城鎮的居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力，在維護社會秩序上，坊眾的「集廟」成為官府、民眾之間的重要補充，但在民國的報章很少介紹「集廟」的事，此又與政府大規模毀寺廟的行動有關。方秋梅在〈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的募勇及現代意義〉一文中認為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大規模展開募勇動員，但成效並不顯著，因為清政府財政困難，及民眾對募勇動員反應不一；文中更指出戰後的募勇流向社會，終導致沿海地區社會控制狀況的惡化。

第五場，王仲的〈國民黨與商會——從蘇州鐵機絲織業的勞資糾紛看國民黨統治確立後商會權力的淪喪〉藉研究 1927 年蘇州鐵機絲織業工人抗議商人剝削的事件，以說明國民政府對民間社團採取控制措施，使具有獨立司法活動能力的商會，喪失議事的調解權，故可知國民黨在 1927 年後的勢力已滲進商會。劉宏的〈游走於國家和網絡之間：新加坡華人社團

與戰後社會經濟變遷》以新加坡華人社團在國家與跨國網絡中的角色為例，指出國家是一種自上移下建構的垂直權威體系，網絡是一種平等的橫向聯繫，而二次大戰初期，社團「區域化」運動和跨國網絡的擴張，促使華人經濟發展，並使華人社團參與大選，又述及華商在二次大戰後，重建華人商業網絡的方法，並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胡鴻保、定宜莊的〈《碧血劍》內外所見之滿漢族群互動〉利用歷史學、小說學及敘述學的方法，研究金庸的武俠小說《碧血劍》及《袁崇煥評傳》，說明金庸滿漢紛爭的族群理論及其與時代的關係。宋平的〈跨國家族的重構——聚荆堂風波解讀〉一文指出福建永春縣聚荆堂為當地鄭氏家族所建，此家族本僑居馬來西亞，及後 20 世紀 80 年代，鄭氏後人把此堂捐給家族會，家族會卻把此堂改建成學校，因此引起族人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紛爭。

第二組

第一場，商傳在〈試論明中晚期士大夫的事功思潮——以臨海王氏家族為例〉文中指出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發展衝擊舊有秩序，臨海王氏宗族王宗沐，子士崧、士昌，從子士性，均經歷嘉隆間倭亂，也受到東南沿海經濟貿易浪潮的影響；然而，他們的事功卻與時代尚浮華風氣不協調，此文可見明亡與時風尚浮躁甚有關係。顧希佳的〈村落家族文化的歷史經驗：以前童為例〉敘述浙江寧海前童村始建於南宋紹定年間，歷經明清二代至今的發展，族人均出自同一血統的童姓，作者利用大量田契、族譜及方志的資料，指出童氏家族在明清期間，頗注重地方教育，並以家族利益形成內聚力。臼井佐知子的〈明清時代之家族與宗族〉以徽州契約文書的資料，考察明清政府施行宗族秩序與宗法的倫理政策，滲透到平民的情況，也注意居民對宗教事物及現象採取的行動和意識有怎樣的變化，特別注意明代還存有民眾對僧侶懷有的敬意，至清朝，民間卻輕視佛教，可見政治權力對人們行為及意識的影響。林濟的〈新鄉紳與近代宗族〉以 20 世紀 30 至 40 年代，長江中游出現的一群新鄉紳階級為中心，考察城鄉的關係，新鄉紳以國民政府掌政者為主體，不同昔日土豪惡紳，他們成為近代政權及鄉村宗族的結合點，新鄉紳推動新族學，成為民間社會營造的一種新社會組織，但國民政府破壞了鄉村行政自主的權力，新鄉紳更成為國民政府權力伸向地方的重要力量，新鄉紳處在城鄉之間，未能有效地發揮

國家與鄉村的連貫作用。遲雲飛在〈晚清社會結構的裂變與清王朝的滅亡〉一文中認為近代的社會結構，主要由官員、紳士、民眾所組成，在晚清十年社會結構變遷，鄉村成員往往成為新紳士，原有的官員和下層民眾也發生變化；然而個別階層卻缺乏統一的政治要求，也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階層支持政權，終致中國陷入長期動蕩。

第二場，徐茂明在〈同光之際江南士紳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一文中認為太平天國亂事後，江南士紳為維護自身權利，便與地方政府合作，加強重建政治防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倫理道德、宗教信仰、風俗禮儀等各方面，重建江南社會秩序，終出現「同治中興」之局，但作者質疑是次成效的問題。湯可可在〈蘇州市民公社的社會功能和社會聯繫——近代基層民眾與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一文中認為清末蘇州出現的市民公社，既是與地方自治思想的湧現甚有關係，也知其是民眾與政府合作的結果，蘇州市民公社屬於基層商民的自治組織，以社區公益事業為中心，具有在日常公共事務領域與地方政府相聯繫的特色。魏光奇的〈國民政府人事制度與新地方精英階層的形成〉指出清末民初，隨廢除科舉制及實行地方自治的政策，士紳角色轉為新官紳階層所取代，國民政府頒行文官考試、地方自治等行政制度，使地方社會形成一種新精英階層，他們與地方精英時為衝突，時為聯合，可見這一階層的形成使國家行政與社會基層的發展了緊密的關係。馬自毅的〈新舊雜糅、複雜多變的清末民變〉指出清末除了少數民變乃是革命黨人有意識地發動外，絕大多數有濃厚的自發性、懶惰性及突發性，此乃顯示晚清社會動蕩不安與普遍的反叛心理。郭緒印的〈老上海的同鄉團體的中介與法制功能〉指出清代及民國期間地緣性的會館，及民間崛起的同鄉會，均具有互助、公益、中介、法制的功能，老上海的會館具有聯族，為故鄉民眾向原籍政府部門請願，也為商業性的，連同大多同鄉會，成為地方上，非權力的機構，對維持地方安定，甚有貢獻。

第三場，高紅霞在〈民國時期上海閩商的整體衰弱與泉漳會館的活力〉一文中認為，藉研究泉漳會館在近代上海活動的軌跡，說明它與同籍商人、行業團體、同鄉團體的關係，探究上海開埠後在閩商的勢力下，泉漳會館與東南亞的海外市場的關係，並回向上海投資，會館積極參與祭祀、救濟的情況。馬亮寬的〈試論辛亥灤州兵諫與立憲派之關係〉指出 1911 年武昌起義不久，京津地區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六鎮吳祿貞等人率部在北方響應，發動兵諫，史稱「灤州兵諫」，文中便介紹是次兵諫的

性質及兵諫與立憲派的關係。

第四場，葉漢明的〈華人社會、殖民地國家與婦女：香港一例〉利用香港檔案館藏資料，指出 18 世紀殖民地政府為防止華人自衛力量的興起，只容許保良局以安置被救婦孺為主要工作，華商領袖可以維護社會已行的蓄婢習俗，雖有洋人斥蓄婢制，但華商以中西文化差異，蓄婢不如奴隸制為反駁的理由；另外，港英政府為維持社會安定，要爭取本地華人領袖的支持，只好容許蓄婢制繼續保留，可見港英政府統治技術的背後，是一套強調中西文化截然不同，東西兩個迥異的世界。陳麗菲的〈二戰時期中國女性性受害類型分析〉指出二次大戰時期，中國「慰安婦」的社會身分類型有：妓女、家庭婦女、職業婦女、學生、被俘抗日女性；中國「慰安婦」經濟待償類型分為：經濟補償型、無補經濟補償型；文中特別指出有些婦女受中方特訓後，潛入日軍當女間諜，故她們不可稱為「慰安婦」。郭衛民的〈山西抗日根據地鄉村婦女社會作用的變遷〉指出山西抗日根據地的婦女，在抗戰中不自由地受外來人物、事功和思想觀念的影響，使自身行為和觀念發生變化，她們因此更積極參與抗戰活動。江心力指出明代內閣制的出現，不獨是一個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結果，乃有其自元入明的社會發展，知識分子要求集思廣益的效果。

第五場，池子華的〈「振興工藝」：清末「再就業」工程的一個斷面〉指出晚清十年，政府成立工藝局推動手工藝事業的發展，更為失業者創造再就業機會，工藝局兼有「再就業」及「職業培訓」的雙重職能。陳昌文的〈上海近代出版業對都市人口的吸納與整合〉指出近代上海出版業出現自身結構轉型，又與都市進行互動及整合作用，而在上海進入都市化的過程中，分析上海出版業對都市人口的吸納與整合，闡明出版業與都市發展是互動關係。潘君祥的〈辛亥變革時期上海民眾社團的組織和活動傾向〉利用檔案資料描述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商界成為民眾結社的主幹，同鄉會和同業團體的革命傾向和聯合行動，也是導致清亡的主因。宋傳銀的〈移民與漢口社會變遷〉指出漢口為一個移民城市，其社會變遷、經濟變遷及文化變遷均與移民的作用，甚有關係。

第三組

第一場，官文娜在〈前近代日本社會的養子與社會變遷〉一文中介紹

日本中世長子單獨繼承制，家督制確立的意義，以及日本中、近世養父養子關係的締結和解除的過程，進而探討日本社會養父養子關係的確立和解除在「從身分到契約」運動中的歷史意義。謝葆華的〈明代皇后生活〉以明代的皇后生活為中心，認為皇后日常生活主要是參加婚禮及太廟祭祀、封禪禮等。

第二場，卞利的〈徽州的民間語言與歌謡〉從徽州的地方族譜、志書，蒐集了徽州一地的大量諺語、歌謡及俗語，指出徽州的歌謡可分為時事類、戀愛婚姻等各種類別，並認為這些作品可以幫助了解近現代徽州民間風俗。李俊的〈中國消防史上的一座「德政碑」〉從明代弘治年間徽州知府何欽修民間「火墻」，「足以御患於千百載者」的功業，被百姓視為德政，並集資為其樹立一座「德政碑」，間接推動徽州消防文化，這也是中國消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王振忠在〈徽州日常日用類書與民間日常生活研究〉一文中指出，日用類書為研究明清時代民間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明清時代社會文化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重要依據，作者把蒐集的類書分為：綜合日用類書、商業日用類書、村落日用類書，尤其最後的一種較少學者注意，並揭示日用類書在村落生活運用的情況。

第三場，王健在〈祀典、私祀與淫祀：明清以來蘇州民間信仰考察之一〉一文中指出明清時蘇州地區的神靈可分為三類，即祀典之神、私祀之神及淫祀，藉祀典神以見統治者利用民間信仰輔助統治，而私祀則是國家與民間社會妥協的結果，因雙方在信仰領域中較少正面衝突，故形成一個比較廣闊的緩衝區；同時，私祀往往對正統政權造成衝突，終為國家所禁。井上徹在〈魏校的搗毀淫祠令——廣東民間信仰與儒教〉一文中認為明代魏校明白只靠毀淫祀，不能禁民間信仰，故下令舉行祭祀祖先，恢復里社以培養儒教倫理人格，在魏氏離職後，廣東鄉紳繼續舉行祭祖及推動地方教化，使儒學教化漸被廣東。張秀蓉的〈從《鹿洲公案》看清初潮汕地區的社會生活〉一文，從藍鼎元《鹿洲公案》中指出潮汕的審判制度、河海水運對潮汕經濟及治安的影響，婦女婚嫁引起訴訟，書吏訟獄及潮汕民間信仰。許紀霖的〈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形態、功能與自我理解——以上海為例〉一文先分析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指出這理論的成因、思想淵源、歷史形態和輿論功能，再以上海為例，探討此理論的可行性及特殊性。張佩國在〈國家話語與農民日常生活實踐的邏輯——山東「老區」土地改革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共於1946至1948年在山東地

區進行土地改革，這不獨是政權更替的表現，或地方精英構成群體轉換的單一過程，也包括地方精英活動類型的轉換、意識形態、行政網絡、組織方式的建立等各方面互相聯繫。

第四場，李長莉的〈生活方式與近代社會倫理的演生〉指出鴉片戰爭後，中國出現近代物質生活方式變遷、近代工商觀念的興起、四民失序、女子教育及文化世俗化等面貌，而生活方式變遷也是社會倫理觀念自傳統向近代轉變的啓動力量。呂文浩在〈日軍空襲威脅下的西南聯大日常生活〉一文中討論 1938 至 1943 年西南聯大社會生活史，尤其是 1940 至 1941 年日軍空襲給西南聯大師生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文中既敘述和評估轟炸帶來的人、物損失，也高度評價警報帶來的特殊社會生活及師生的精神品質，但也不應神化聯大師生的生活面貌。朱小田的〈社群心態的解讀——圍繞 1933 年的浙江鄉村調查而展開〉一文敘述 1933 年一群缺乏準備的田野訓練的學者，調查浙江鄉村的民生情況；但鄉民多不支持是次考察，更引起反抗，文中提出田野考察應多注意社群心態。劉長林、錢錦晶在〈論五四思想家對自殺現象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五四時期自殺是一個普遍現象，這些事件引起五四思想家的關注，他們討論自殺現象、原因、道德、社會價值等問題，並藉此提出新的人生觀和改造社會制度。嚴昌洪的〈1930 年代國民政府風俗調查與改良活動述論〉利用檔案資料，指出 20 世紀 30 年代，由國民政府發起，對全國市縣的風俗調查及陋俗改良活動，其實是次活動乃配合政府制定移風易俗的政策，卻對民眾生計產生不利的影響，終至失敗。

第五場，梁景和在〈近代女性陋俗文化的演變與「人的解放」價值〉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國女性陋俗文化的演變包括體觀、自立觀、女學觀、參政觀、倫理觀，也有禁纏足、興女學、女子參政、廢娼運動、解放尼姑、婚俗變革等，可見整個運動與個體解放是相互依存，也可見女性的地位日漸上升，而近代中國女性文化觀成為拯救中國女子的重要依據。邵雍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禁毒與販毒〉一文中以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已存在各種各樣的有組織和無組織的販毒群體和個人，其中也有洋行、中外不法商人、各級軍政官員及民眾，一起販毒，政府只是表面上禁毒，故民國時禁毒政策未能收到成效。徐有威的〈民國時期的土匪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一文細密地分析及評估當代中外學者研究民國土匪的成果、民國土匪的分類、興起原因、流民和鴉片、秘密社團和軍閥、地方傳統、土匪文化、社

會因素、土匪和革命等課題。單強的〈略論田業聯誼會〉指出民國時江南農村出現了大量專業收租機構，從清代租棧到民國時的田業公會及田業聯誼會，文中更敘述收租機構的內部組織、營運方法，並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指出這些收租機構就是國家、地主和佃農利益衝突下的產物。

第四組

第一場，鄧京力在〈社會理論與社會史研究——「國家——社會」理論框架的範式意義〉一文中認為，西方漢學界的「規範認識危機」論主要是致力於建構地方社會系統與國家統治機構之間的制衡，或著重分析社會空間相對國家權力的自主性，這樣頗能突顯公共領域與區域社會的整體意義。馮爾康的〈姓氏文化與地域文化〉指出姓氏文化與地域文化具有交互作用，中國古代社會往往有不同的氏族聚居，尤以明清之後，中國城市的興起，不同地域的公會、行會、同鄉會日漸湧現，最後提出研究姓氏源流要結合地域文化進行討論。黃金麟的〈武化的身體系譜學〉以身體形塑的研究方法探討清末以來，朝野人士試圖國家化和軍事化人民身體，以形成一個「國」與「民」的最終結合，此文以一種趨勢發展的角度來分析這種身體的建構，使讀者看見 1928 年軍事教育方案和其所造成的軍訓教育普及化，是與統治的政策甚有關係，也與清末的軍事改革與軍國民教育有著系譜上的傳承關係。

第二場，張志東的〈國家社團主義視野下的制度選擇——1928-1931 年的國民黨政府、商會與商民協會、天津的個案研究〉利用天津地方檔案，以社團主義分析天津的商民協會是兼具工商業社團和中央政府外圍行政機構雙重性質的組織，這組織表達了中央建立高度組織化、理想化的國家社團主義社會的特色，但在中央政府控制下，成為整合社會力量、支持政府的組織，但也因此導致組織瓦解。孫江在〈星星之火：革命、土匪與地域社會——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中心〉一文中認為不能單從共產黨內意識形態鬥爭，說明曾為土匪首領王佐、袁文才被殺的事件，此事還存在井岡山土著民勢力和移往民勢力的紛爭，這實是一種地域社會固有對立的問題，也是原有族群對立內化到中共地方黨組織及黨內鬥爭的事例，帶出中共遭遇了自己所設置的區分「階級」和以「階級」認識中國社會的困境。金秀英的〈社會革命與語言革命——國民革命時期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理

論為中心》一文藉研究國民革命時期社會革命與語言關係，即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新語言與國民革命發展方向之間的關係，特別指出引導中共發展的陳獨秀，他雖積極使用「革命」和「階級」的概念，但他所持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是不斷變化。張琢的〈兩岸觀民粹〉指出當代中國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廣大庶民，不能自發產生現代主義包括現代經濟理性和理性民主，但另一邊的台灣政府在 80 年代經濟發展下，「本土民粹主義」也發展迅速。

第三場，中島樂章的〈清代徽州的山林經營、紛爭及宗族形成——祁門三四郡凌氏文書介紹〉利用大量族譜及徽州一地檔案文書，指出凌氏藉出賣山林收益、擴張族產、編纂家譜的行動，得見明清二代徽州山區維持同族社會的門第家風，及宗族網絡建立的情況；段煉、陳凌的〈明清江南士風與華亭畫派——董其昌個案研究〉從松江濃厚的藝術氣氛、人文薈萃的環境中，以江南畫家董其昌為例，說明明清江南地區士風與華亭畫派之間的互動關係；華強的〈民國時期的「軍妓」〉指出民國時期軍人所到的地方，娼妓事業均甚為興盛，文中特別提出這些軍妓不可列入慰安婦的類別；張俊峰的〈明清以來晉江流域水利與鄉村社會〉從明清以來山西晉水流域的個案，探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又從社會矛盾、利益衝突、商業網絡的角度，探討晉水流域發生的水案，最後檢視晉水流域的工程可以引證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

第四場，左玉河的〈政府專橫，還是民眾頑固——南京國民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評析〉利用檔案資料，指出 1928 年後國民政府強行推動廢除陰曆，改用陽曆的運動，政府雖然使上層社會多採用民國陽曆紀年，卻因政府採用過激手段，終導致民間與政府的衝突。梁洪生的〈明清在華耶穌會士面向西方描述江西〉一文研究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在華傳教過程，教士們深入討論中國社會的問題，不少教士介紹及傳播中國文化，藉他們的著作以見教士對江西社會既有誤解，也有明晰的地方。區志堅的〈殖民地下南來學術的雙向發展：賴際熙及學海書樓對香港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利用香港政府檔案、口述歷史等資料，指出晚清遺老賴際熙等學者南下香港，不獨是為了金錢，或求一處安定的居所，他們一方面懷念前清，一方面卻籌辦學海書樓，此為香港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又籌辦港大中文學院，使中國文化分別朝向民間普及化和高等院校制度化的兩個方向，持續發展，也可見他們本有一套傳承中國文化的理念。嚴翊君的〈試論早期現

代推進力量配置中的矛盾性——以張謇為案例的分析〉從現代化的角度，探討清末民初張謇推動中國工商業踏上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遇與官方爭利，官方壓迫商業的政策，檢討民國時官督商辦的利益衝突問題。黃焯鈞的〈杜威來華講學對上海知識界的影響〉指出五四時期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大師來華，對上海知識界的影響，並指出其時因反對他的實驗主義哲學，而出現一些負面報導，故尚可再次檢視杜威對中國的影響。何廣中在〈開放改革及澳門回歸與高等教育的大發展〉一文中全面介紹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澳門回歸前後，高等教育政策及體制的改變。

第五場，吳仁安的〈五緣文化與家族史、譜牒文獻研究〉指出「五緣文化」是海內外族群社會關係中，五種傳統道誼因緣的總稱，文中從「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的五緣文化，分析家族融合的特色。森正夫的〈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以中國史研究為中心〉一文從日本中國明清史研究的角度，指出日本學者島田虔次在 1962 年已提出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文中並指出中國史研究與田野調查之間有很強的內在聯繫，介紹日本學者已廣用歷史學、社會人類學及文化學研究的方法，研究長江三角洲、徽州等地的社會史。岑大利的〈清前期米價的波動及其社會的影響〉指出清前期米價波動情況，米價波動的原因，滿族地方官員、地主及平民均有利益衝突，地方官藉放高利貸、商人更藉抬高米價使民間受苦。濱下武志的〈二十世紀初上海、神戶、仁川的海外華人金融網絡〉一文利用檔案資料，指出 20 世紀初上海、神戶、仁川形成一個海外華人金融網絡，尤注意商會的組織互動關係。吳強華的〈儒學、士大夫與「天學」傳播〉指出明清之際，西教士來華及其帶來「天學」的流播情況，主要因晚明學者要求經世致用，由是受到時人重視；至清建國後，士大夫對「天學」熱情漸減，致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知識。

是次研討會學者提出研究中國社會史，應多注意近、現代的情況，重視跨學科的研究，並應把社會史看作是一種思維、典範，研究範圍不獨注意國家、民眾、地方政府的關係，也要注意民間風俗、信仰、宗族、地方商會、周邊民族、海外華人、東亞民族風尚等課題；更要注意引入西方的整體文化史研究的概念，要求國內學者多引介海外研究理論，強調與國外學者接軌，注意田野考察，進行中國社會史本土化的研究。最後，是次會議強調學界不應以單一的概念及理論探討社會的活動，更注意國家、地方、群眾之間的互動，強調從多元的文化體系下，探討中國社會的特質。

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江 沛*

2002年8月21-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門中西創新學院、美國黃興基金會聯合主辦的「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昌平的九華山莊舉行，與會代表百餘人，分別來自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及日、韓、俄、美、法、德、加、澳等國，共提交論文92篇，內容涉及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思想文化與教育等方面，其中不乏頗有新意的佳作，是近年來民國史研究新成果的一次大展示，代表著民國史研究未來發展的方向。

一、傾力於政治史的突破

政治史的研究，歷來是民國史學界關注最多、成果較多、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此次研討會上，數量較多的論文涉及到民國政治史上的諸多問題，一些論文利用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提供了新的觀點。

人物研究從來都是政治史的主題之一。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通過章太炎出任東三省籌邊使一職的前因後果分析，透視了民國初年的中國政治格局。他認為，章太炎出任這一職務，不是如他在《自定年譜》中所言是為了躲避袁世凱，而是他與袁世凱在政治上緊密合作的結果。至於隨後的辭職多因體制與財政等方面的原因，而非如他所言是由於宋教仁案的刺激。饒懷民（湖南師大文學院）在分析籌安會為袁世凱帝制復辟而奔走的反動性質同時，指出應對籌安會「六君子」區別看待。楊度、孫毓筠是籌安會主角；劉師培、胡瑛自願參加，助紂為虐；至於李燮和、嚴復則是在遭軟禁的情況下被列名籌安會的，可謂是歷史冤案。

邱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以民初廣東鄉村基層權力機構為切入點，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對其內部構造、人事、實際運作過程進行了細緻的分析。民國初年，廣東省對中央是獨立的，對各縣也無能充分行使權力。南京政府成立後，雖然新縣政在廣東試行，但民初以來那種亦官、亦紳、亦團、亦匪的人物對基層權力機構控制的格局，一直延續至 40 年代末。

王奇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利用公開發表的資料，從新的角度考察了 1927-1932 年間華南地區中共地下黨的惡劣生存條件及其影響，向我們展示了以往極少涉及到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生存實態的另一面。他指出：與以往認識不同的是，這一時期中共地下黨存在著組織鬆弛、支部有名無實、經費困窘、黨員缺乏訓練、黨組織生存能力薄弱等諸多問題，不少農民為生存或其他原因投身革命，擁護階級鬥爭或革命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農民黨員的宗族與地域意識濃於階級與革命意識。中共黨在改造農民的同時，農民也在改造和利用中共黨。

曾業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從東北易幟入手，考察了東北易幟的醞釀、談判、易幟三階段，認為不宜將「京津易幟」、「熱河易幟」、「瀋東易幟」列為東北易幟的前三步驟。他認為，東北易幟挫敗了日本分裂中國的企圖，是國民政府向東北地方當局妥協的結果。張學良多次延期易幟，既有日本干涉的因素存在，但也有其「藉此統一運動，以鞏固個人地盤與權力」的考慮，這些應該客觀地指出。

1930 年胡漢民等人在國民黨內成立的以「抗日」、「反蔣」、「剿共」為政治主張的秘密團體「新國民黨」，在過去的國民黨史研究中極少被提及。陳紅民（南京大學歷史學系）依據藏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中有關資料，對「新國民黨」在北方的活動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使人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到胡漢民等人的活動及國民黨內部的政治生態環境。金以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考察了 1931 年後因蔣介石與胡漢民的「約法之爭」而引發的國民黨內部派系爭鬥狀況，特別是對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三大派系的相互利用與鬥爭給予了較為清晰的分析。他認為，蔣介石的下野是各派系聯合一致反蔣的結果，而蔣氏下野後各派系間矛盾頓生，致使蔣汪合流、聯合執政成為可能。這一時期的國民黨內部分化，既顯示了其內部權力重組的過程，也確立了此後國民黨內部各派系聯合統治的局面。

張學良有關西安事變的檔案及其口述資料間的矛盾，近年來一直是史家關注的熱點。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的心態及所為，更是人云亦云。楊天

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閱讀台灣及美國檔案的基礎上指出：現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張氏檔案中的《西安事變反省錄》，是張氏在台期間奉蔣介石之令所作，張學良在《回憶錄》中選擇了「真而諱」的辦法，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緘口不言。但在獲得自由後的口述資料中，張學良回歸本真，大體恢復了西安事變的真實面目。

皖南事變歷來被視為戰時國共關係中的重要事件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對引發皖南事變的原因特別是對國民黨抗戰時期對中共政策的演變交代不夠。楊奎松（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利用台灣的「大溪檔案」等資料，細緻地考察了國民黨對中共政策的演變並將之視為發動皖南事變的必然前提。他認為，1940 年後，國民黨試圖以軍事劃界的方法限定中共的發展區域，從而根本消除中共對其控制區的侵蝕與威脅，當其一廂情願的作法得不到實現時，其強硬的軍事驅逐計畫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皖南事變的發生。

王續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系統地討論了民國時期地方政治意識的形成及其特點，他認為地方政治意識起源於 19 世紀 50、60 年代，形成於 20 世紀初，民國之後進一步普遍化與深刻化。在國家認同的前提下，地方政治意識顯然與中央政治相對立，以地方自主、自治意識為核心，以自保和擴張意識為特徵，是地方統治集團追求自我政治價值實現的意識反映。這是地方政治意識在民國時期政治分裂、地方主義盛行的思想與情感基礎。

丁則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對南京大屠殺與日本皇族間關係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為保證天皇叔父朝香宮鳩彥王中將（攻打南京前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安全，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下達了攻陷南京後各師團劃分區域掃蕩殘兵的大屠殺令，大屠殺的高潮也就在南京陷落至入城式的五天內。每當戰爭處於即將勝利或有把握獲勝的關鍵時刻，日本天皇都會任命皇族成員為戰爭的總負責人以提高皇族的威信。

二、新史料與外交史的新意

隨著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日益頻繁，近二十年來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的譯介日多，相關新史料的大量刊佈特別是前蘇聯有關中國檔案的解密，為民國外交史的深入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此次研討會上共有 20

篇有關論文宣讀，在重點探討中蘇、中美、中日關係的同時，一些論文也涉及到諸如民國時期波蘭、越南、朝鮮與中國的關係。

中日關係及國民政府對日外交是民國外交的重點，也是民國外交史研究的重心之一。此次會議提交了數篇有關論文。鹿錫俊（日本島根縣立大學綜合政策學部）以〈蔣介石的日蘇關係觀與「制俄攘日」戰略：1933-1934〉為題，分析了國民政府試圖通過中蘇復交達到「以蘇制日」目標失敗的原因。他認為，蔣汪在對蘇、對日的認識上出發點及目的均不同，蔣介石想通過外交努力達到「制俄」與「攘日」的雙重目標，汪精衛則希望不要通過對蘇聯繫刺激日本。兩者的分歧，隱含著中國外交的不同發展方向。臧運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依據日文檔案對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對華南政策進行了考察，他指出：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國內政治分裂，日本藉機先後與廣東派、胡漢民派進行聯繫，企圖在華南地區建立傀儡政權南北夾擊國民政府。這一目標失敗後，日本轉而謀求在華南地區的經濟擴張。他認為日本的華南政策與其滿蒙政策、華北政策都是其對華政策不可或缺的部分。

九一八事變後，國聯成立了以英國人李頓為首的調查團赴中國調查事變真相。金光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根據其新近發現的李頓給其家人的信件（已刊載於《民國檔案》），詳細闡述了李頓在中國之行中與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會晤及其對日本、中國的觀感。李頓認為日本如堅持武力解決東北必須付出代價，但解決東北問題應該考慮日本利益，其對中國積弱的輕蔑及對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敬意，反映出近代西方人固有的居高臨下心態。這些資料的刊佈及其研究，對深入瞭解九一八事變後政局及國際關係極有裨益。

由於前蘇聯檔案中有關中國問題資料的解密，使中蘇關係成為近年來研究熱點之一。舍維廖夫(K. V. Schevelyoff)（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認為，以往對1922-1923年間共產國際與吳佩孚關係的研究中，多數認為共產國際對吳佩孚是高度贊揚的。但資料顯示這一時期在莫斯科也有對他的批評。蘇俄爭取吳佩孚，目的在於借其聲譽謀求中國承認蘇俄、調整中蘇對外蒙古及中東鐵路立場等。汪朝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認為，在戰後中蘇有關東北經濟合作的交涉中，蘇、美及國共「三國四方」關係的交匯極大地影響了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東北經濟合作交涉表面是經濟問題，實際上又與政治、外交及國際關係糾纏在一起。國民黨在這一問題上

游移於國家利益與黨派利益之間，前後方觀點差異較大，策略上被動應付。蘇聯則「猜忌不安」，不斷給國民政府製造麻煩。中蘇有關東北經濟合作的交涉必然失敗。王志剛（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討論蘇聯對華政策對中共革命戰略影響問題時指出，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的核心是確保其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其長遠目標則在於削弱和遏制中國的未來發展空間。蘇聯以中共力量制約國民黨政權以獲得其在東北的權益，又在與美國及國民黨政權進行利益交換中限制中共以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實施，戰後初期中共尋求和平建國的政策也為蘇聯所選擇。但當蘇聯與美國及國民黨政權關係交惡後，蘇聯對華政策一變而為鼓動中國內戰，從而引發了國共關係的急劇惡化並升級為大規模內戰。欒景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則從 1949 年 1-2 月蘇聯駐華使館南遷廣州事件為切入點，考察中國革命大勢已定情況下的蘇聯對華政策。他認為，這一行動是蘇聯慣用的雙重對華政策的必然結果，既非其對中國革命過程判斷失誤，也非其所謂不干涉中國內政原則使然，而是要以此為憑藉最大限度保護其在華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薛銜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據蘇聯解密檔案對抗戰結束後蘇聯調停新疆「三區革命」進行了考察。他指出，蘇聯在三區革命過程中採取了支持軍事進攻、力主和平談判和指揮戰略撤退三個步驟，由於中亞地區的民族因素即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分裂威脅，迫使蘇聯採取了使三區與國民政府和解的務實政策。

伊原澤周（日本追手門學院大學）根據藏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考察戰時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他重點分析了戰時中國從依靠蘇聯轉向親美問題、日蘇條約及對中國影響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過程中的問題及宋子文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對蘇外交中的心境等三個問題。

陳謙平（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對抗戰前後英國在西藏門隅地區的領土擴張進行了系統梳理，指出儘管英國利用中國抗戰之機公然派兵進入門隅地區，但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西藏地方當局均堅拒了英國的領土要求，國民政府還與英國進行了嚴正的交涉。1944 年後，這一地區遂為英印政府實際控制。

抗戰後期國民政府的對韓工作近年來漸為人知。耿雲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以此為題，詳細地分析了在促進韓國各團體統一、增強韓國臨時政府權威性、支持韓國反日鬥爭、承認韓國臨時政府合法地位等問題

上，國民政府由於意見分歧而導致其對韓工作猶豫拖延，不少問題處置失當，從而影響韓國臨時政府的實際影響與地位。國民黨人對戰後越南問題的認識與實踐，過去也極少有人涉及。羅敏（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認為，在對越問題上，國民黨經歷了一個由中國單獨托管實現越南獨立到同意法國戰後重返越南的轉變，這一轉變過程因法國國際地位的變化而產生變化。在戰後入越受降的有利形勢下，中國卻在法、越間兩不討好，最終招致在越利益俱失的結果。朝鮮半島的中國租界問題，以往幾乎是民國史學界的一個「盲點」，川島真（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以清末民初中日間就關於廢除朝鮮的中國租界交涉過程為中心進行考察，試圖檢討北京政府的外交態度並思考中國因有海外租界是否也具有近代意義上的「帝國」面貌。施樂文(H. M. Roman)（波蘭科學院非歐洲國家研究中心）則對民國時期波蘭與中國的關係進行了初步考察。他認為，民國時期的中波關係受制於國際局勢特別是波俄關係惡化、日蘇衝突等因素。波蘭承認偽滿洲國是錯誤的，以為這樣可以達到保護在東北的波僑及其利益並希望爭取日本在德波關係衝突中居間調停。被侵略後，波蘭又與中國站在同盟國的一邊。

三、社會史研究方興未艾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社會史研究逐漸成為中國史學界發展最快、影響日增的學術領域。90年代以後，最有資料條件開展社會史研究的民國史學界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不僅拓展了民國史的研究領域，也大大深化了民國史的研究。向此次會議提交的10餘篇論文，充分展示了這一潮流的學術影響。

左玉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南京政府的廢除舊曆運動為切入點，不僅對「廢曆運動」的原因、過程、效果進行了闡述，還重點考察了官民在廢曆問題上的分歧，分析了新曆與舊曆並存的「二元社會」在歲時節令上的矛盾、官方廢曆的激進作法及民間習慣衝突後不得不尋求的變通之策。

王笛（美國德克薩斯A. & M. 大學歷史學系）以抗戰時期成都茶館工人及其組織為題，通過傳統服務行業這一窗口，以男女工人競爭、茶業工會及其活動等切入點，考察其中反映的階級衝突、性別關係、大眾文化、

公共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等諸多問題。他指出：與上海、天津等城市的產業工人相比，成都茶業工人因工作場所分散而難以形成階級意識和集體行動，工人運動的發展方式有所不同。茶業工會盡力保護茶業工人的利益，在地方政治與公共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社團史的研究近年來一直為學界關注。章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立足於探討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問題。他考察了走出科考時代的知識人經由地緣、業界和階級等不同意識與身分的強化漸漸形成一種「集團力量」的過程。在他看來，所謂「集團力量」的興起涉及到的是社會動員方式的轉變，是在國家與個人間建立一種紐帶。這種對知識人聚集方式轉變以及省界、業界與階級意識形成的分析，旨在揭示近代中國形成集團力量時的一些基本特性。周秋光（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論文探討的是以往較少涉及的北京政府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組織與發展問題。該文對中國紅十字會早期初創、其在推動中國醫療事業發展上的貢獻，與企圖進入中國的美國紅十字會進行的爭執，及 1920 年後中國紅十字會的整頓與改革等問題均有詳細的闡述。趙利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討論了南京政府建立前後由國民黨旨在控制商人而設立的上海商民總會與純粹的商人團體商民協會間的矛盾與衝突，由此觀照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與民眾團體諸方面關係間的複雜性。孫宏雲（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以行政效率研究會為中心考察 30 年代的行政效率運動。他認為：九一八事變後，戰爭威脅使政治改良、革新行政的呼聲日漲，國民政府推行了多項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一些行政機關紛紛設立研究機構進行探討，形成了一場「行政效率運動」。其中由行政院設立的「行政效率研究會」的活動具有代表性，其創辦的《行政效率》在各地行政機關產生了廣泛影響。然而在一黨專制體制下，僅從技術層面追求行政效率不可避免要觸動利益集團而困難重重。徐秀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從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掃盲運動入手，對其教育救國、振興鄉村思想下的掃盲教材、授課方法等予以肯定，同時也指出平教會掃盲運動與其原先設想出入較大，既與社會宏觀環境有關，也與多數農民缺乏文化需求相關聯。

江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在概述明代以來天津娼業變遷的同時，以近代天津娼業結構為題，集中討論了 20 世紀上半葉天津公娼業的分佈、層次、內部人員如娼妓、窯主、伙友等的基本素養及嫖客群體的構成與心態、公娼業營業方式、分成行規、收支狀況以及游妓暗娼的活動方式等，

通過對娼業這一社會邊緣行業的結構與生存方式探討，既展現了政治、經濟變動與下層群體變化間的關聯，也對近代娼業形成的複雜原因、行業特徵及其規律提出了客觀的看法。

嚴昌洪（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了 1930 年代國民政府的風俗調查與改良活動。他認為：此次活動是為了配合國民政府對全國進行重新的社會整合並加強社會控制的意圖而進行的，地方政府對一些陋俗加以取締。然而過急的風俗改革與人們的習慣相違背，在實際生活中產生了許多不適，只好採取變通的方式予以解決，致使風俗改良活動收效甚微。此文力求從一個側面探討國家、地方、民眾在社會風俗改良活動中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史瀚波(B. Sheehan)（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在其建立的 3,000 多名專業銀行職員資料庫的基礎上，集中對民國時期北京和天津專業銀行職員的社會與教育背景進行研究，由此考察社會精英階層的源自及其相關的社會機制構成、社會網絡功能以及專業化等複雜的因素，進而觀照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中國社會精英階層在結構與意識等層面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四、細化與實證的經濟史研究

近十年來，有關民國經濟史的研究呈現出少有的興盛勢頭。大批資料的整理刊佈，有力地推動了民國經濟史的發展。此次會議收到的一些論文，內容涉及到了新的領域，研究細化與實證的特徵進一步明確。

閔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討論了民國初年商辦鐵路收歸國有的問題。民初各商辦鐵路無一例外地陷入經營困難的境地，無力維持鐵路的正常營業，加上民國成立後人們對於外債的危害性擔心減少，致使至 1914 年 4 月北京政府取締商辦鐵路公司，正式將各重要幹線收歸國有的行動順利結束。這一行動與清末因幹路國有政策而激起的保路運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北京政府並未將鐵路外債中的大筆墊付款用於鐵路建設，而是用於應付財政危機，致使中國喪失了更多的鐵路權益。

近代經濟體制得以正常運作一個必要的保證就是信用制度的確立及有效實施。杜恂誠（上海社科院經研所）考察了 20 世紀 20、30 年代中國信用制度的演進。他認為，近代中國信用制度經過了形成信用交易習慣、

形成信用規範及信用約束、創設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信用機構和信用品種、以信用機制重構企業治理結構、國家不良信用破壞市場信用制度發展等五個階段。此外，20、30 年代中國的信用制度在地域上發展不平衡，在上海等大城市公共物品性質的信用機構及鑒證類中介組織都有較快的發展，出現了以信用機制改善企業治理結構的成功案例。陳錦江 (Wellington K. K. Chen) (美國加州大學西方學院) 也對民國時期的信用及保證制度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在動蕩的政治環境中，無論是傳統的錢莊、作坊、行會還是銀行、工廠、百貨公司，在親友之外均要求雇員特別是財會人員有擔保，企業之間的保證制度更為細緻。然而這種信用與保證制度未必能證明中國社會信託及自發社交的層次低。一旦社會安定，保證制度就會被減少或放棄，從而使社團或企業的關係網大大擴張。他以此反駁美國社會學家 Francis Fukuyama 認為華人文化以家族為中心、社會信託層次低、不足以架構進行全球競爭的規模較大的商業組織的觀點。

金志勛 (韓國成均館大學史學科) 考察了 1930 年代前期國民政府經濟封鎖對中央蘇區對外貿易的影響。他認為，中央蘇區利用各種手段展開對國統區商人的貿易，中央蘇區出口農產品和鎢，進口如醫藥品、棉布、食鹽等。然而，殘酷的經濟封鎖大大加重了中央蘇區的經濟困難，這是紅軍軍事失利及難以支撐的重要原因。

邱燕玲 (E. M. Hill) (加拿大女皇大學歷史學系) 從 1933-1937 年間日本白糖走私及對中國主權影響的關係入手，探討這一時期中日貿易轉移至黑市及半合法市場的情形，以透視中日戰爭的經濟因素。她指出，這一時期日本商品的走私不僅是日人所為，其中有大量的朝鮮人、中國人參與，其引發的黑市交易已超出了中國及日本當局控制的範圍，但大量免稅走私白糖進入中國不應看作是一個旨在打擊中國政府的預謀。

虞和平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對南京政府時期國營與民營經濟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在南京政府統治時期，中國經濟的主體狀態開始由自由經濟轉向了統制經濟，國家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中處於領先地位。與此同時，國營與民營經濟對立與互動的關係帶動兩者共同的發展，進而使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達到了民國時期的高峰。他指出，統制經濟體制不見得就是一種不好的制度，關鍵在於其是否適應本國的政治經濟狀況。然而，如何約束統制經濟的無限擴張及對民營經濟的壓迫，是南京政府沒有解決好並嚴重影響其政治與經濟體制正常運轉的一大問題。

朱蔭貴（中國社科院經研所）的論文，關注的是抗戰前國家金融政策與錢莊業衰落之間的關係。他通過大量統計圖表，展現出這一時期中國錢莊業的整體衰落趨勢，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根源是南京政府力求建立統制的國家財政金融體系。吳景平（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觸及的課題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上海金融業及其外匯市場。他指出，「孤島」時期上海金融業仍奉國民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國民政府調整外匯政策與措施仍然可以通過政府銀行的各分支機構和上海金融業同業組織執行。英美外商銀行主要是從獲利角度進入外匯市場的，中美英政府聯手進行外匯管理促使外匯市場趨於穩定，眾多華商行莊外匯業務萎縮，難以在其中產生主導作用。日偽金融勢力始終是上海外匯市場的破壞力量。

曹必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根據檔案資料，對東北地區淪陷十四年間的經濟損失進行初估。文章列舉了日本侵佔時期及通過偽滿洲國對東北財政金融、自然資源、工農業等各方面的掠奪造成的損失統計數字，認為東北淪陷時期直接的經濟損失約為 152.48 億美元。

五、思想文化與教育領域的拓寬

民國思想文化史、學術史及教育史的研究，近年來呈現出快速拓展的勢頭。時代與社會的發展，使學者們思想與觀念上產生了新的思考；相關學科的交叉滲透帶來了思想文化史、學術史、教育史領域的新氣象。

鄭大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關注的是「一戰」與戰後中國文化轉型間的關係問題。他指出，「一戰」對中國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影響頗大，但以往較少述及其對中國思想文化層面的影響。他著重分析了「一戰」後西方文化危機中興起的「東方文化救世論」引發的中國知識群體中文化保守主義思潮興盛的情形，指出戰後中國文化思潮變動的特徵：一是進化論受到批評、互助論暢行；二是科學萬能論遇冷，要求重新審視科學功用與價值呼聲高；三是文化取代論受批，中西文化調和蔚為時尚。

劉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分析了胡適在學術思想史上的範式創新問題。他認為：胡適以進化論的觀念、全新的歷史解釋模式以及「疑古」傾向代替「九流出於王官說」的舊有學術範式，這是近代學術範式的重大創新。這種範式創新既有康有為為中心的經今文家的觀念準備，也有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此說對 20 世紀 20、30 年代史學界中疑古、釋古、

信古各派均有影響。胡適使「諸子學」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源頭，使「經學」從屬於「子學」，從而大大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文化格局的傳統認識。

吳小龍（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對以往學術界全盤否定的國家主義理論為分析對象，從其定義、對世界形勢與國情的考察、其理論的出發點等方面出發，認為這種理論的思考中具有一種對民族與國家發展的強烈關懷。然而，國家主義理論從其思想資源、理論表述、現實分析、政策方針、運作模式等方面均有重大失誤，所以在探討近代中國出路問題上，國家主義學說的失敗是必然的，它應該屬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中的一部分。

深町英夫（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系）的思考可謂獨闢蹊徑，他從身體美學與公共意識的角度考察以往多視為政治色彩濃厚的新生活運動。在他看來，新生活運動旨在通過政治權力強迫中國人改變自己的身體意識，並接受現代的身體美學與公共意識，是一種參照西方價值觀念的改造國民運動，這種運動以傳統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為改造對象，勢必引發民眾之反感與排斥。

林家有（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對 1912-1919 年中國教育體制的轉型及其影響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民國初年的教育章程既繼承了傳統教育的民族性內容，又吸收了世界先進國家的教育經驗；民國初年的教育體制突破了精英教育模式，奠定了國民教育、素質教育的基礎；國立、公立、私立多元辦學的教育體制，拓寬了教育的空間；各種教育法規及規章的頒布，使中國教育開始走上法治化階段。

六、關注史料與學術史問題

大陸民國史研究至今已有二十餘年，小結已有成果、以史料推動研究創新的心態在此次會議上多有表現。

張海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在〈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個問題的討論〉一文中，首先回顧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三十年來在民國史研究領域所做的努力，肯定民國史已成為歷史學科中極有特色的學科之一。其次是提出了「中華民國史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距今最近的一部斷代史」的民國史學科定義，民國史的研究對象應該包括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發展等各方面的內容。其三，他指出要把握辛亥革命、第

一次國共合作、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46 年國共內戰等民國史上五個重要的轉折點。

許小青（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在回顧民國學術史二十年來研究成果後指出，民國學術史的研究在宏觀上明確了民國學術的地位及現代性特徵，人物研究打破禁區，研究方法上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不僅使思想文化史研究深入至學術史的層次，不斷明晰今天學術對於民國學術的承繼關係，而且對於今天學術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借鑒作用。他認為，民國學術史在研究中有缺乏中立立場，一些著作還停留在個人傳記、紀念集的水準上，對持唯物史觀的學者重視與研究不夠。

蕭致治（武漢大學歷史學系）對五十年來大陸黃興研究的概況進行述評。肯定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數量與水平大大超過前二十年，並對民初孫黃有無路線分歧、如何評價民元南北議和、黃興與「二次革命」、黃興拒入中華革命黨、黃興與護國運動等幾個問題作了重點評述。

馬敏、陸漢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對民國時期的政府統計工作及統計資料進行了考察。他們認為，民國時期的統計工作可分自行其事(1912-1927)、統計展開但未設統計中心機關(1927-1931)、主計處協調全國統計工作(1931-1949)三個階段，特別是 1931 年後，統計工作在制度化、規範化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逐步建立起一個較為完善的統計體制，為後人留下了大量極有價值的統計資料。胡志偉（香港自由撰稿人）對香港《春秋》雜誌發表的大量多由民國時代文武高官撰寫的民國史料進行了較為詳盡的介紹。

七、若干感想

隨著民國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學術範式的轉移，提交此次會議的一些論文所涉及的研究內容及領域已很難再用傳統的分類方法加以劃分。這種研究視野的拓寬、研究內容的擴展、研究方法的借鑒，對民國史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它表明民國史的研究已開始朝著真正的多學科交叉、大視野考察、新方法分析的方向快速發展。與此同時，當前民國史研究呈現出以個案分析為主流的態勢，不少論文講究以小見大、知微見著，力求以個案研究的成果觀照歷史宏觀的發展趨勢。此外，許多研究成果對國內外資料的引用越來越重視，新刊佈的資料常常會被迅速利用。

就研究內容而言，此次會議提交的論文同樣也印證了目前的研究趨勢，即政治史、外交史仍舊是熱點，不少課題因新資料的刊佈而產生了新的說法和新的見解。而社會史與經濟史的課題在近年的學術發展中日漸受寵，研究的觸角伸向了社會構成的方方面面，不少課題的分析對於傳統結論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研究同樣歷久而不衰。這種幾大分支平衡發展、齊頭並進的態勢，顯示出民國史研究良好的發展前景。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之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三種

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

主編：黃克武 212 頁 精裝 320 元 平裝 260 元

本書收錄中央研究院第三屆漢學會議歷史組中兩個分組的論文，一為「政權與社會力量」，一為「思想與社會」。全書共收有論文七篇，討論中國歷史上時代思潮、個人意識與社會、政治發展的交錯關係。

軍事組織與戰爭

主編：黃克武 310 頁 精裝 350 元 平裝 300 元

本書收錄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中兩個分組的論文，一為「軍事組織演變」，一為「戰爭對社會的衝擊」。全書共有論文六篇，兩篇屬前者，四篇屬後者。「軍事組織演變」一分組有 Robin Yates 與黃清連的兩篇文章，分別探討馬與驥卒。「戰爭對社會的衝擊」一分組的四篇文章則主要以中國近代史為範疇，析論戰爭對中國社會的衝擊。Diana Lary 教授的文章屬於通論性質。陳存恭、張瑞德、林美莉的三篇論文則是較具體地處理抗日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性別與醫療

主編：黃克武 283 頁 精裝 350 元 平裝 300 元

本書收錄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中兩個分組的論文，一為「性別史」，一為「生命醫療史」。全書共收有論文八篇，除李貞德的文章跨越兩個領域之外，其他七篇中有三篇（鄭培凱、Susan Mann、林維紅）屬性別史，四篇（Paul U. Unschuld、梁其姿、鄭金生、真柳誠）為醫療史。這些文章一方面檢討了以往研究的成就與侷限，另一方面也發表了新的研究成果。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紀念 梁啟超〈新史學〉發表 100 周年」 會議紀要

牛貫傑*

1902 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一文，「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進入新世紀，史學發展不僅需要回本溯源，更需要清醒的前瞻。有鑒於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院和北京中商嘉誠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 2002 年 8 月 21-23 日在北京香山臥佛寺共同主辦了「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 100 周年」學術討論會。

此次研討會打破學科界限，從未來歷史學向多元化邁進的實際境遇出發，邀請了包括哲學、文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民族學等八個學科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研討會與會學者 34 人，共提交論文 33 篇。

秦暉（清華大學歷史系）：〈西儒會融，解構「法道互補」——典籍與行為中的文化史悖論及中國現代化之路〉

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國家權力的退出，產生了一種民間社會，其中包括傳統小共同體的活躍。儒家思想有濃厚的小共同體本位特徵，但秦以後中國出現了編戶齊民。在編戶齊民社會中，中國人真正的思維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和其他各種思想存在一種什麼樣的互動關係，是本文想解釋的中心問題。

毛丹（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院）：〈歷史文本中的正義面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一種政治思想史讀法〉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講的正義是政治正義，指關於城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師

邦共同政治生活的規則。人的正義其實起源於人的競爭本性。正義取決於有一個能夠執行等量強制的機構，具體到古希臘是指城邦國家。從國際正義上講，按照修昔底德的解釋，正義的基礎需要一個等量的強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因為各國間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仲裁秩序，國際政治並無正義可言。不幸的是，這種情況在當代社會同樣如此，國際倫理、國際正義並不可靠，大概也出於同樣的原因。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元氣淋漓」與「絕大文字」——梁啟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

史學既是科學，也是文學。當然，跟文學家爭鋒不是史學家的主要任務，但謀篇佈局及敍事能力也是史家之基本功。分析史學可能更多地借重於理論和史料，至於敍事史學、文學手法是不可缺少的，在這點上新、舊史學之間沒有截然的分野。漢語語境中的「新史學」經過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倡導，百年間成績斐然。論者面對這種局面，無論是回顧反省還是展望前瞻，一般都從理論提升、史料擴充、學科拓展等方面進行考慮，很少考慮到表述方式的革新。本文的目的是想為「史學革命」補充一個不太為人關注的側面，即：「述學文體」同樣值得認真經營，並非只是無關緊要。

章清（復旦大學歷史系）：〈「普遍歷史」與中國歷史之書寫〉

中國史學傳統歷史悠久，這是它的一個長處，卻面臨著一個資源太多、怎麼來處理的問題。因此斷代史基本成為後來中國史學的主流。從西方視野來看，中西歷史的「合和」發端於傳教士西來，傳教士們試圖把握中國歷史、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是從「地理」進入到「歷史」中的；從中國視野來看，中國本身也有書寫別的民族、國家的傳統，如清代所修的《明史》中，法國、義大利等國的歷史也進入到中國的歷史書寫當中。然而，當我們在文明衝突面前感受到沒法和西方競爭時，我們所捍衛的就是一個歷史的悠久性，這構成了相當一段時期中國學者在書寫歷史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情結。

張研（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今思新史學〉

今天的歷史科學，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總和性的歷史學；第二層次是綜合性的社會史學和文化史學；第三層次是專門性的政治史學、經濟史學、軍事史學等。社會史學偏重於從社會的運行和發展來對第三層次的專史進行綜合研究；文化史學偏重於對人、人類生活、思想方式的遺傳、變異等方面對第三層次進行歸納總結。近年來社會史和文化史成為研

究熱點，一方面是因為各專門史近百年發展的雄厚學術基礎；另一方面在於當今社會正處於變革時期，民族、人民對這種綜合性的歷史研究隱含著一種渴求。

朱蘇力（北京大學法律系）：〈歷史中的行動者——從梁祝的悲劇說起〉

梁祝的故事其實不是一個關於反封建的悲劇或一個自由戀愛的問題，它反映了傳統社會的習慣制度對於人類的一種不自覺。梁祝的悲劇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這種婚姻制度在當時有什麼合理性？那麼，怎麼能夠借助虛構故事來確認歷史事實？歷史文本留給我們的不是史實問題，而是一些當時的資訊。所謂史實、史料或文學史料，其實是一個保留資訊的問題。事實上梁祝這個作品也是一個歷史的建構。歷史事實必須要有一個準確的文化傳統和記錄系統。歷史事實其實也是歷史制度的建構，如果沒有文化制度、記錄制度，史實就不可能存在。

行龍（山西大學歷史系）：〈也論中國近代的城市化〉

施堅雅按照河流系統，把中國劃分為九大區域，過分強調了空間概念，他的另外一個缺陷在於過分注重空間，而忽視了時間。歷史事實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形成的，不僅表現在空間，而且表現在時間。中國百年來的城市化過程，從鴉片戰爭到共和國成立的百餘年，城市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從五口通商到甲午戰爭，這是一個比較緩慢的變遷過程；第二個階段為黃金時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其實也是城市化發展的黃金時代；第三個階段是農民離村與都市膨脹。近百年來城市化發展過程最快的階段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它帶來了都市的膨脹，農業人口大量向都市的流動。

汪暉（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亞洲想像的譜系：亞洲、帝國與民族——國家〉

日本、韓國的學者經常批評中國學者根本不關心亞洲，沒有亞洲視野，是「中國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另類的變種。日本、韓國在建立民族認同的過程中，「亞洲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亞洲觀念實際上是一個歐洲的觀念，在其歷史形成過程中同歐洲現代性的一些特殊主題聯繫緊密。帝國和國家的二元論是早期歐洲「亞洲觀」的重要部分。民族國家在帝國和國家的二元論、歐洲和亞洲的二元論中，扮演了一個擺脫帝國的過程。19世紀日本的「脫亞入歐」論實際上和歐洲早期政治觀

念、國家意識密切相關。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百年以後當思我：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再反省〉

梁任公既是中國近代科學、實證史學的奠基者，同時也是科學、實證史學的批判者。梁任公有其時代局限性，但梁任公對近代史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第一，他對科學、實證史學的引進，開創了在史實考證基礎上研究歷史的學風；第二，他在引進科學史學的同時也批判實證史學，批判只注意事實考證而不注意史學意義的史學路向；第三，梁任公在 1920 年代所倡導的「新史學」，事實上建立了中國文化本體的史學理論，從而將科學史學同中國傳統儒家道德理念和佛家的「形而上」有機結合。當然，梁任公的史學思想還有相當多的限制，但歷史學的命運或許就在於不斷面對危機，不斷尋找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

孫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關於現代史書寫的基本問題——日本現代知識界「昭和史論爭」的啓示〉

昭和史論爭是一個跨學科的論爭，是文學家對史學家所提出的批評。這場論爭引發了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對歷史學研究定位的再一次反思，歷史學在這場論爭裏借助文學家的發難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位置，他們發現歷史學並不具有那種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性。因為它必須面對經驗事實，而且是一次性經驗。當一次性經驗成為歷史學討論基點時，歷史學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用科學性來形容。第二，歷史學如果要在一個非直觀、經驗性的層面上工作的話，它需要有一個區別於文學、哲學的工作場域。這個場域在論爭中沒有被直接勾勒出來，但暗示了討論的可能性。

李伯重（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史學與變化——重新認識歷史上的江南農業經濟及其變化〉

中國經濟史學是從西方引進的，西方經濟史學在近二十年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開始懷疑英國模式是不是研究其他地區的主導模式。中國主流經濟史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馬克思主義在經濟方面的模式實際上是以英國經驗為基礎的。黃宗智勇於挑戰西方中心論，但他始終沒有擺脫斯密——馬克思模式，仍然把英國模式看作放之四海皆準的模式。黃宗智的過密化或內卷化理論在 90 年代初期引入中國後得到了一片贊同，但針對長江三角洲而言肯定是有問題。1979 年傳統的小農經濟恢復後，經濟發展相當快，這證明黃宗智模式不適用於中國。從 19

世紀各國經濟發展來看，英國模式也不是最成功的。有的學者用黃宗智的材料對比，發現 19 世紀初期江南比英國的生產水平要高，只是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後英國才高於中國，但到 19 世紀末又低於中國，英國不能養活自己的人口，必須進口大量糧食。因此英國模式沒有普遍意義，但我們把它作為一個普遍意義的模式強加給中國，這造成了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建構和解讀存在著問題。

余新忠（南開大學歷史系）：〈從社會到生命——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

醫療史是個古老的課題。近代以來的醫學史是從 20 世紀初開始的，主要是學醫出身的人進行研究。90 年代後，海峽兩岸史學界開始關注身體史，關注生命。中國醫療史中身體往往成為一種藥物，頭髮、內臟、人血、割肝割腸療法，在日常醫療活動中成為比較顯著的現象，從而引起疾病學家對這方面研究的興趣。進行疾病醫療社會史和身體史研究，可使歷史變得更加豐富，增強解釋力度。此外，醫學史本身涉及到自然科學史方面的內容，而且同人類學、社會學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係，這些都有利於進行跨學科的探索。

馬敏（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商會史研究與新史學的範式轉換〉

開始研究商會史時是為了證明中國也會有過資產階級，但一開始就忽略了商會的組織、功能、結構等本應研究的方面。80 年代現代化理論被引入到商會史研究，為商會研究帶來了新的領域、新的視野和新的闡釋框架，可以從系統整體的觀點來看待商會，從商會與社會的關係來研究商會。現代化範式也有局限性，容易陷入西方商會理想型的怪圈，容易把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忽略現代與傳統相聯繫的一面。90 年代「市民社會」理論開始運用到商會史研究。過去我們強調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市民社會提出國家和社會存在著互動關係，但市民社會理論也有它的問題。中國的市民與西方的市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樣的，西方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是聯繫起來進行討論，但我們往往對市民社會關注較多，對公共領域展開得不夠。商會史研究大致經歷了這幾種範式轉換，逐步導致商會史研究走向整體史研究，逐漸把我們帶入一個對歷史更加全面同時也更加具體真實的史學境界中。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新名詞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近代中國思想史，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張以新名詞為網結編織起來的觀念之網，幾乎沒有一種新觀念、新思潮不是以新名詞為網結編織成的網。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充斥了大量的新名詞，如國民、民族、進化、社會、革命、時間、空間等。文化史應有兩方面的含義：首先它是一種內義的設定，將文化現象作為專門研究物件；其次文化史是一種方法，一種視角，從文化角度來認知社會歷史問題。它並不認為一切人類現象都是文化現象，而是認為一切社會歷史現象都含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因素。文化史研究主要揭示兩種關係：一是文化內部各種現象之間的關係；一個是文化與社會、教育之間的互動關係。關係問題是認識文化史的關鍵。

程美寶（中山大學歷史系）：〈地方史、地方性、地方性知識——走出梁啟超的新史學片想〉

梁啟超講中國傳統史學有四大弊病，其中特別提到「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但我們現在做的歷史往往只知群體，不知個人。20世紀60、70年代以前，實證主義的群體歷史研究，往往沒有個人，這也是人類學家自認為有所貢獻的地方。現在歷史學者同人類學者之間有很多的交流，但雙方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因為人類學者進行田野調查，只要把研究物件的話如實講一遍，或者把當時的講話情景如實記錄下來，當然所謂「如實」是有所選擇的，或者是經過詮釋的，就是完成了大部分任務。但是歷史學者如果沒有材料，是什麼話都不能講的。

趙汀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歷史知識是否能夠從地方的變成普遍的〉

歷史是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而存在的。歷史也是一種敘事，是一種和生活緊密結合的敘事，同神話、童話等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歷史按照本地特定的生活而發展延續，這種先天條件決定了它只能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如果非要把它變成普遍的，除非是把它進行一種推廣，並且在別的地方也同樣適用，事實上這也是西方一直想做的事情。不僅歷史知識，西方人想把各種各樣的知識都進行推廣、傳播，最後變成普遍的。

羅宏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圍繞歷史資源的非線性實踐〉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現實問題，他們通過求籤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困惑。籤中記述的都是些歷代帝王將相遺事，包括商鞅變法、莊子、老子、孔子等人的故事等。籤子共有 100 支，每一支籤有一個帝王將相的故事。通過抽籤的研究我們實現了歷史和現實的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講，老

百姓通過抽籤儀式，給我們表演了一個沒有時間的歷史藍本，即「歷史沒有時間」。其中，一個是歷史事實，一個是歷史知識，二者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地進行著轉換。

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理論旅行」狀態下的中國史研究——一種學術問題史的解讀與梳理〉

80 年代後一些外國社會學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框架，經過海外中國學的經驗研究，又轉回到國內。在轉移過程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重視空間問題。最早的如楊慶堃的市場理論、費孝通的雙軌制等，當時的社會學家都沒有特別明確這種當代意義上的空間概念，但是這些理論經過一圈之後馬上變成一個空間問題，就是馬敏先生講過的「市民社會」理論。「市民社會」嚴格地講是和國家相對立的一個空間概念。空間在西方整個社會脈絡的解說之下擁有一個普遍的意義，實際上“Space”和“Local”是相對的意思。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超越空間對我們的束縛，進入到一個新的地方性知識討論體系中。我的解決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方式是復原，追求客觀、追求原貌，但這肯定是做不到的。第二種方式是建構，很多歷史都是被建構起來的，如果在這個框架下來理解的話，我們很難在具體的地方化語境中來處理問題。第三種方式是通過呈現的方式關注地方社會的具體內容。進入到現當代語境中面臨的很大問題是我們怎麼樣使地方性知識不受到「污染」，我們應該把眼光放在一個過渡的縫隙的歷史中去理解它的意義。歷史學界當前的任務，就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上，什麼樣的渠道上，理解已被污染的地方性知識，而不是尋求根本不可能獲取的原本意義上想像的地方性知識。歷史學界還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希望直接進入世界的語境中去和國際對話，但僅僅就目前的歷史學而言，我們受到的挑戰實際上與海外中國學研究密切相關。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殷海光的思想變化及其史學研究的可能性〉

殷海光晚年的思想有很大變化。這些變化有些非常具體，比如他對「五四」的全新認識，對胡適、對美國文明的重新感覺。殷海光以前是一個邏輯經驗論者，而到了晚年他又變成一個批判邏輯經驗論者。另外他開始關心生命和價值等問題，對史學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殷海光的學術地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是中國第三代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第二，他是邏輯經驗論和分析哲學在臺灣的奠基人；第三，他提倡用科技整

合的思路來研究歷史。作者不贊同林毓生所說的，殷海光在道德和反專制方面有重要意義，而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太大的意義。殷海光早期探討科技整合思潮，認為只有用科技整合、行為科學來探討中國歷史，中國的問題才能夠真正探討出來。

納日碧力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西學東漸」和「跨語言實踐」——以「種族」、「民族」等說為例〉

在大歷史的層面，有以下幾種歷史：一是記憶的歷史；二是身體的歷史；三是文字的歷史；四是口傳的歷史；五是無言的歷史，某些歷史有時不能說，有時可以說；六是流動的歷史；七是實用的歷史；八是對話的歷史；九是心靈的歷史。

王笛（美國德克薩斯 A. & M. 大學歷史系）：〈街頭文化、下層民衆及公共生活研究的現狀、資料和理論方法問題——以成都為例〉

晚清人物研究一般都涉及到很廣闊的背景，如國家建設、鐵路、民初政府統治、西學東漸等。晚清的傅崇矩非常關注下層民衆問題，編輯了晚清成都的百科全書——八卷本的《成都通覽》。這個題目涉及到下層群衆在公共空間中的活動。下層民衆、大眾文化是美國目前比較流行的研究。保羅·賽斯在《反抗與屈從》一書中提出下層民衆從來就沒有聲音，我們今天看到的資料實際上是被扭曲的，所謂大眾文化是強加在下層民衆身上的文化，並不代表他們的聲音。但下層民衆是可以講話的，關鍵在於怎樣使用這些記錄下來的資料，用什麼語氣來描述研究物件。如果仔細區別這些就可以發現民衆的聲音。我們在研究下層民衆時，感覺很難有具體描述，知識精英大都沒有詳細描述他們所寫的物件，大部分是比較抽象的批評。這些具體描述該怎樣去尋找？有些西方學者開始把眼光放到文學資料，比如明清的地方諺語、民間文學以及詩詞。中國傳統歷史學很鄙視文學資料，認為它不可靠，經過了人們的想像，不能作為史料來使用。但關鍵在於怎麼使用它，這是最重要的。

梁治平（中國文化研究院）：〈法律史的視界：方法、旨趣與範式〉

真正的中國法制史研究是從梁啟超開始的，儘管這種說法在法律界並不占主流。傳統認為法制史研究的奠基人是沈家本和楊鴻烈。梁啟超強調專門史研究，同時也進行專門史研究，這方面確有開山之功。民國時期中國法制史有相當的發展，學術流派主要有三種：一是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為代表的傳統學派；二是歷史著作家楊鴻烈開創的學院派；三是瞿同祖等

人的社會學派。這時法律建設已相當成熟，中國法制史正式列為大學課程。1949 年後由於意識形態漸趨指導地位，大陸史學界對法律史的研究採用了相對簡單的教科書模式，臺灣的法制史研究基本上可歸為兩種傳統：一個是台大傳統，一個是中研院傳統。台大傳統的代表人物是戴延輝。戴延輝利用了大量清代檔案，並結合了當地資料，放在清代中國的視野中進行研究。梁啟超從國家建設角度製造了國民歷史，台大傳統把它繼承下來，將法律史研究和臺灣民族主義運動交織在一起。另一個傳統是中研院傳統，以張偉仁的大內檔案研究為代表。這兩個傳統有一個相同的地方，都把法典研究放到程式研究之上，這也是最近的一般趨勢。另外比較重要的是美國最近二十年的研究。除了法學界之外，最近比較活躍的是黃宗智的一個工作班子，目前大概有將近 10 人的規模。它完全是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法律史的研究交織在一起。

劉北成（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熱月政變」學案〉

世界史在中國是一個非常薄弱的專業，基本特點是缺乏一手材料。因此中國史似乎更注重地方性知識，世界史則更注重普遍性知識。世界史學科在 1949 年後才正式建立。1949 年以前，在國外學西洋史的人回國後基本上仍然研究中國史，同時可能做一些翻譯、介紹性工作。1949 年以後的世界史研究集中討論的是規律問題，這與世界史學科建立的宗旨有密切關係。世界史學科建立的政治色彩非常明顯，基本上是為意識形態、五種生產方式作一個學術的說服論證。改革開放後世界史方面的主要變化還是一個大範式的變化，還是在探討規律。影響較大的有提出生產力標準的劉宗緒先生和提倡現代化理論的羅榮渠先生。

張世明（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國家主體性——近代以來法律體系基本單元與歷史記憶慣常空間的型構〉

法律制度史和學術思想史有很多溝通的地方。雷家驥在《中國史學觀念史》中談到中國中古時期有一個新史學運動，是從司馬遷之後開始的。梁啟超的新史學發生在近代，國外的新史學運動從法國起源，那麼梁啟超的新史學新在何處，與當時西方史學相比有哪些創見和超越？有學者指出梁啟超的〈新史學〉、〈中國地理大勢論〉、〈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均有大段抄自日本學者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其實當時為引進西方思想對國外著作的抄襲是普遍現象，決非梁啟超一人。有學者認為梁啟超提出的「新史學」主要借鑒了日本人的思想，當然他後來寫〈中國地理大勢論〉

時，已經有很多人在大量介紹西方的史學思想了。歷史學不單是一個史學思想的問題，它與政治觀念聯繫密切。這一點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中就非常典型。

葛兆光（清華大學歷史系）：〈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減法〉

過去的思想史比較注意進步、發展這樣的東西，注意描述一些新的、不斷湧現出來的東西。作者比較希望多關注一些在歷史生活裏不斷被簡省的東西，因此創造了一個詞叫減法。考古發現本身就意味著它曾經消失過，也就是說它曾經被歷史減去過。減去的東西我們不要過多地考慮它有很多新的東西，我們要考慮它為什麼會消失？上海博物館公佈的秦簡，裏面有一片叫「衡篇」，代表中國古代曾經有著非常發達的關於純粹語言方面的論說。當然減法和加法實際上是一體兩面，並不是說只有減法或者只有加法。

王銘銘（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生活史中的「治亂」與「文化」：一項個案分析〉

歷史學和人類學結合在一起的作法是合理的。19世紀末期有個叫哈維蘭的人類學家，曾經說過「人類學或者是歷史，或者什麼都不是」。20世紀60年代，埃文斯教授曾針對這句話展開對歷史人類學的論述。他認為人類學首先是人文學，而不是科學。人類學從事的是雙文化翻譯，是把當地的東西翻譯成大家都能聽得懂的東西。人類學家是世界史專家，因為他們研究的是整個世界歷史。埃文斯認為人類學那種功能主義、學究主義的作法要想得到徹底改變，必須恢復跟歷史的對話。在這兩層意義上，埃文斯認為人類學是歷史學，而不是社會科學。埃文斯的觀點對中國的社會科學有很重要的啟發。中國的歷史時間是一個治亂的過程，而不是進化的過程。把治亂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和時間觀念，是考慮梁啟超之後新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

趙旭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圖式衝突中的英雄觀念重構與真實性告誡——以華北一村落有關抗日英雄的集體記憶為例〉

大部分關於歷史是什麼的討論都建立在歷史存在的基礎上，即對過去的一種重新建構。另一方面實際上也存在一種假說，認為歷史是在一個周期性的變動中發展的，梁啟超〈新史學〉中也滲透著這種觀點。歷史往往是在一種周期性的迴圈過程中來完成的，這種歷史的抖動是有重心在起作用，並不是隨意的抖動，它靠一種思想、一種理性在支配。隨著時間的推

移，我們會逐漸忘掉一些細節，而使一個大圖式的輪廓更加堅實。

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傳說・歷史・歷史記憶——從 20 世紀的新史學到後現代〉

歷史學家和以研究傳說為主業的民俗學家幾乎都把歷史和傳說放在對立的立場上來看待。那麼除了掌握歷史書寫霸權的歷史學家、官方語言之外，有沒有可能通過傳說來表達歷史記憶？顧頡剛先生既是歷史學家也是民俗學家，他在解說孟姜女傳說時，已經把傳說和歷史看成是層累的製造。後現代其實是對歷史客觀性的一種懷疑，作為解構歷史真實性、客觀性的後現代方法，又把歷史和傳說重新擺到了一起，把傳說納入思考歷史記憶的框架中。歷史傳說應該是一種歷史記憶，不過和我們所奉行的現代主義科學史觀的價值觀念完全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是科學，而傳說是虛構、是創作。在考慮歷史與傳說對立時應該反思最根本的方法和立場。人們對於過去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選擇一些東西把它記下來，並被很好的保存，這些東西就變成了我們所能依賴的唯一仲介——史料。但人們究竟是怎樣來選擇，歷史記憶的選擇機制究竟怎樣，並不是很清楚。從傳說和歷史的關係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對立完全是一種科學史觀的表現，但是現在是否還能繼續堅持這一立場，確實是後現代帶來的挑戰。

孫江（日本一橋大學）：〈後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

1890 年前的歷史學分為兩個時期：前一階段是啟蒙史學，是基於人性的同一性，試圖構建一個哲學化、文明化的歷史，是一種單數的、全體的、大寫的歷史。啟蒙史學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史學、文學不分，且對史料缺乏批判性。後一階段是 19 世紀中葉開始出現的經驗史學。德國歷史學家蘭克提出了政治史的敘述，把歷史學建立在對公共檔案材料的基礎上，而不是民間的私人材料。1890 年後出現了試圖突破政治史敘述的研究趨向。1929 年，年鑑學派浮出水面，主張研究社會性的經濟史學。20 世紀 60、70 年代，年鑑學派發展到高峰，代表作是布羅代爾的兩部大著。布羅代爾對史學的最大貢獻是建構了整體性結構歷史學。1989 年後有學者指出布羅代爾史學存在著致命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沒有政治和事件；第二個問題是一種結構的、主體不在的史學；第三個問題是背後隱藏著一種普遍性的追求。這種新興的歷史學應稱其為解構歷史學。我認為整體史敘事是根本做不到的，不僅整體史敘事做不到，而且我們經常運用的一些概念、理論方法實際上都把歷史簡單化了。歷史學確實應出現一個新認識論

的轉換，積極迎戰後現代主義對我們的挑戰。80 年代美國提出脫離歐洲中心主義，在中國發現歷史，這種論調當時迎合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或者說民粹主義，造成中國的歷史學出現了美國式中國研究的趨勢。近年來關於市民社會、國家社會理論的討論都是在跟著美國人走。作者認為很有必要建構一個中國本土化的歷史學典範，應該把概念、理論全部消解在一個地方性的語境中。

應星（中國政法大學）：〈身體政治與現代性問題〉

20 世紀人類經歷兩大劫難：一個是德國納粹的大屠殺，還有一個是中國文革所遭受的浩劫。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指出，大屠殺可能是現代性的另一方面。這種大屠殺、這種身體悲劇與現代性之間有什麼勾連？或者說我們要去思考身體在現代社會、現代政治中的處境如何？這個處境在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有什麼差異？古希臘觀念中身體從來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在基督教觀念中，身體跟政治的關係是矛盾的，一方面身體是神聖的，另一方面對身體有貶的意涵。真正把身體與政治從正面勾連起來的是霍布斯。霍布斯的一系列著作不僅第一次明確用身體來比喻西方現代國家，更重要的是他把現代政治的基礎就奠定在圍繞如何照看、控制公民的身體上。古代的身體並不是沒有，但古代更重視身心關係，所以叫做好的「物」、好的身體。但霍布斯認為「物」在現代社會裏逐漸消失了，公民身體本身開始成為一個政治問題。當然霍布斯也碰到了一個問題，如果用身體來比喻政治的話，人的身體是會死的，那麼如何來保證現代政治的長治久安呢？康特拉維茲解決了霍布斯留下的這個問題。他提出國王有兩個身體，一個是自然身體，一個是政治身體。雖然他的自然身體會死，但他的政治身體不會隨著自然身體而消亡。他以兩個身體的觀念保證了君主制在絕對主義時代統治的基礎。法國大革命不僅砍下了君王的頭，也消滅國王的政治身體。但它並不意味著身體和現代性政治毫無關係，實際上它只是說原來的焦點在國王身體上，現在的焦點則在大眾身體上。中國古代存在著「國君一體」思想，但大眾身體也始終不是政治問題。進入近代後中國社會出現了變化，一個是人口爆炸，一個是湘軍等地方軍事勢力興起，以及甲午戰敗對社會精英的刺激，都引起大家開始把身體作為一個政治問題，身體開始不斷的國家化，這與西方社會的前進方向明顯不同。近代從軍國民運動到國民教育運動，身體隨歷史發展不斷推進，最後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繫起來。農民身體的國家化是在共產主義革命興起之後。毛澤東在

20 年代寫了《體育的研究》，隨著他革命的不斷實踐，到延安整風模式，然後到土改這樣的實踐過程，也是他不斷創造出新的身體政治模式，使身體不斷國家化。當人的一切都不屬於自己而屬於國家、集體時，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就徹底發生分離，文革這樣的悲劇就難以避免。

陳春生（中山大學歷史系）：〈鄉村的故事與國家的歷史——以樟林為例兼論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方法問題〉

我們研究傳說時，如果把每一個傳說儘量的放到傳說可能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在哪裡形成的、為什麼會形成等這樣一些細節中展開連續考察的話，也許在傳說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真實的歷史。由此帶出來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把國家跟鄉村當成文件、一直在鼓吹用普通文本的例子來看普通人的觀點、普通人的歷史，平常所講的官方——民間，精英——大眾，國家——鄉村等概念，常常處於對立地位。使用這些概念時我們必須要防止一個可能，就是我們經常以為有一個理想的村莊存在。我們應該鄭重其事地看待鄉村社會內部的各種關係，其中不僅有階級差別，還有自己跟外來人的差別。我們在使用鄉村、國家，官方、民間這類概念時，要明白在中國的具體時間、空間裏，甚至在一個很小的、很具體的村落裏，其實鄉村就是國家，民間就是官方。國家其實無處不在。歷史不僅在一個行政控制的層面上存在，更加關鍵的是在一個觀念的層面上存在。我們做鄉村社會史研究，想瞭解民間老百姓的歷史，必須回到中國官方的層次、典章制度裏。只有放到這樣的歷史脈絡中，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的民間。所以中國的所有地方性知識背後都是一個國家話語的表達。反過來也一樣，在最正統的國家話語裏都有無數的地方性知識。鄉村研究不能離開經濟社會背景，個人是隸屬於鄉村的，這裏有更大的地域、社會背景。

劉志偉（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市場、海盜與蠻民——關於族群與地方社會之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

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可以進行對話，但由於雙方的問題意識、基本方法都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所以歷史學始終是歷史學，人類學始終是人類學，各自的關注點和旨趣明顯不同。宗族研究基本上是人類學者做得較好，但有些重要問題人類學家並不關心，像戶籍問題、禮儀制度、教化問題等。關於教化問題，邊緣地區、古代蠻夷地區的整個發展過程就是一種教化的過程，應特別注意地方社會的內在動力是如何利用教化手段進行同化，為什麼會這樣利用？這背後其實有一個精英階層的支配問題。另外族

群問題研究方面，陳寅恪曾說過，種族的劃分是文化而不是血統，這無疑對我們今天研究族群問題有巨大的啟發意義。

李零（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考古學和其他學科有很多東西是共通的，包括理論性問題。新史學如果是新之又新，其實也就很難稱其為新。王國維先生認為學問沒有古今中外，只是我們經常要把古和今、中和外對立起來。當然普遍認為新的比古的有更大的優越性，外國的對中國的有更大的優越性，這個優越性又被另外一些人稱作是霸權。考古學挖的是過去扔掉的一些東西。古代的人被扔掉了，古代的東西被扔掉了，古代的房子也被扔掉了，古代的糟粕以及一些書還有書裏面所承載的一些思想也被扔掉了。這裏面既有自然原因的淘汰，也有人為的選擇。考古學對於理論的探討，對於古代的探索，很難說是為了今天的某個問題或為恢復古代的真相。

趙丙祥（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系）：〈給神的禮物和給人的禮物——「禮物」作為歷史研究之一般概念的可能性〉

禮物有兩個範疇，一個是神給人的禮物，如天下、九鼎等；第二個是在上一前提基礎上人跟人之間的禮物交換關係。先秦王權如何通過禮物建構起來？相關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古代男性和女性的關係，男性和女性關係在王權建立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第二是對中國禮物物品的分析，一個是九鼎，一個是古代的玉器，通過對這兩個物品的分析來看王權是如何建構起來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九期

論 文

223 頁 平裝 250 元

洪傳祥：荷蘭人統治下大員港埠體系的形成與空間開發

胡 成：禮教下滲與鄉村社會的接受和回應——對清中期江南農村地區的觀察(1681-1853)

黃自進：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

Kai Yiu Chan : China's Grain Trade Networks in the Interwar Years,
Yeh-chien Wang 1918-1936

「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 國際學術研討會

沙培德*

這次會議的主題名稱叫做「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2002年11月21-23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召開）。當想到現代性這個特別的主題時，我發現很難遽下定義。我想起1964年一件美國最高法庭有關色情的有名案件。一位法官說道：「我無法替甚麼是色情下定義，但只要我看到了，我就知道是不是」。或許這就是我們必須如何來面對處理「現代性」的方式。西方語言中的「現代」一詞最早在9世紀是用來形容查理曼大帝。更多這一名詞的近代使用，可以說都是以歐洲為中心。毫無疑問地，「現代」一詞的根據是以年代次序的發展為前提。現代性因此證明了一種進化上的勝利。隨時間的推移，這項前提乃從一個特定的時間觀點轉換到文化的本體上。

與此同時，西方世界以外的知識分子和領導人物開始提出現代化的計畫。現代性因而等同於一種自我的裁決。如果說近代時局的演變首先迫使西方世界之外的知識分子重新思考他們本身的歷史的意義，那麼現在的西方則是被強迫重新思考「現代性」的意義及其歷史。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這樣的挑戰，但至少有兩個問題是許多西方知識分子在回應現代性之多元論時所將遭遇到的。一個是「後現代性」或者說各種對現代性作為支配論述的攻擊。另外一個是，甚至在現代性的架構底下，有許多人現在看出較早的目的論所推測的現代性導致「趨同作用」的假設是錯誤的。換句話說，不同的現代性的觀點，可以被看作是後現代意識的一部份，或者現代性持續擴散的一部份。不管是哪一個，它都是一個反進化目的論的概念。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Now I will attempt to discuss a few themes of the papers a little more specifically. What follows is an abbreviated and somewhat arbitrary discussion that fails to follow chronology, place, or the original panel divisions, but rather attempts to tease out particular strands of papers. I believe that the papers we have heard over the last three days are themselves part of this discourse about the meaning of modernity. Two themes are particularly striking when considering the papers as a whole. First, that life and knowledge are inseparable. By “life” (生活) is meant especially daily life or everyday life: the quotidian practices that define us—and that we define. Such definitions in turn reflect and shape knowledge(知識), which includes all mental activities, not just higher scholarship or the concerns of those we label intellectuals. And second, as life and knowledge cannot be separated, neither can knowledge and power, as Foucault (and many others) have pointed out. For knowledge is not only, inevitably a tool of power, it also shapes the parameters within which power must operate. This is made clear as soon as we look again at the everyday, with its constant negotiations of power. Yet to look at the everyday is also to reflect upon resistance to power, which knowledge both enables and limits. Modernity, then,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everyday life and knowledge.

In terms of the first theme, for example, the knowledge about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he daily life practice of raising children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熊秉真，〈去良能以就良知？清代幼兒天地中的生活與學習〉). Or in advertising: when we see both nationalist appeals and appeals to individualism and private benefit, two different frames of knowledge and subjectivity are being interposed (蔡維屏，“Nationalism, Commercialism and Individuality in *Shenbao's Tobacco Advertisements, 1919-1937*”). A particularly clear example comes from embroidery: in daily life embroidery represented women’s body practice, or in other words a specific skill; yet, simultaneously, it was also a field of knowledge displaying a degree of agency and empowerment(Grace Fong 方秀潔,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One might even say embroidery was a constituent factor

in women's subjectivity, and finally formalized as knowledge. This is seen in inscribed form: the writings of at least *elite* women, who thereby claim a kind of equality with male-gendered pursuits like painting and poetry, even scholarship.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differences in life and knowledge are gendered. Also, then, how modernity itself is gendered. To return to advertis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hardly surprises us that women are turned into both commodities and consumers. But the roots of this commodification are not very clear, at least to me. At the same time, as consumers, women would seem to be acquiring a particular kind of capitalist subjectivity like that of men, even while feminine and masculine consumption no doubt differs radically.

Again, class must play a role here that is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Obviously we can hardly assume capitalist modernity is making everyone modern in the same way. (Arguably, capitalist modernity depends on differentiation.) The modern fate of embroidery comes up again, since we see the effort to turn skills connected with elite women—so that they were a kind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ir own right—turned into a deliberate effort to find employment for non-elite women.

The late Ming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日用類書) clearly spread knowledge across classes and, at least in some ways, across spheres of life (王正華, “Art in Daily Lif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Late-Ming *Riyong Leishu*”). The example of sample letters for wives to write to husbands clearly shows how an activity of the private “life” sphere is turned into knowledge—commodified knowledge at that.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writing, the appearance of quotidian matters in print does suggest the creation of a new discourse and ‘alternative knowledge’. Whether this speaks to a Chinese modernity is another question, but of course much here seems vaguely modern. The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of rising social classes, the replace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still maintained in the upper classes) by marketed how-to instructions, and the challenge to upper class monopoly over culture-products reflect a period of rapid change.

Many, perhaps most, of the papers of the papers of this conference, speak

to this first theme (life-knowledge), but I want to turn to the second them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We see this again in the Ming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If they blurred some boundaries by spreading knowledge, they also reinforced boundaries, particularly between persons who had good functional literacy and persons who were essentially illiterat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ocial spectrum, we see the upper literati forced to higher extremes of connoisseurship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but nonetheless maintaining and perhaps even sharpening social distinctions. Not all knowledge, after all, could be conveyed in encyclopedias.

The clearest example of power/knowledge: is where the state plays a direct role. Here we have the case of Japan's 興亞院 during the war (久保亨,〈興亞院與戰時日本之中國調查〉). We could say it was primarily a tool of the military, but it still rested on intellectual premises about the world that had been built up over some time; also, of course, it rested on empirical work such as its research on industrialization. Post-war scholarship in Japan played a rather different role and had a different relationship to the state. For example, in debates over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theory of semi-colonialism/semi-feudalism(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achieved dominance because left-wing scholars were following Maoist notions(奧村哲,〈日本的中國近代社會構成論和社會主義體制觀〉). This changed quickly once Mao Zedong died and the Chinese reforms started. The question, though, is whether the formula ever played a counter-hegemonic role in Japanese academia and politics. Here, the Cold War and the ambiguities of Japan's role in it would have to be considered.

We also see in China itself how a formula essentially designed to serve the revolution—"semi-colonialism"—led people to rethink local social formations: in a progression from the strategic knowledg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ninism to, ultimately, the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Rebecca Karl, "Temporalities of Modernity and China's Two 'Semis'"]. In combining universal, linear time and local, non-synchronous lived-experience, so-called feudal remnants are brought into modernity as integral to it. We can thus say that semi-colonialism is in itself a form of modernity, not a stage in

some larger teleology; the question remains, however, as above, how much counter-hegemonic potential this possesses.

In thinking more broadly about imperialism, of course the Japanese working-out of ‘Asian history’ involved the self-separation of Japan from Asia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之一側面〉). We see clearly that, no matter how different the research methods, all the researchers shared the premise that Japanese imperialism on the Asian mainland was justified. It may be suggested that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Taiwan contributed to this conclusion. For Japanese leaders, knowledge, including notions of what constituted common sense, enabled their us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tions of territorial control in 1874(張隆志，“Sovereignty Debate,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Colonial Modernity: Re-reading the 1874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Aboriginal Taiwan”). Japan did not achieve its goals at the time, but it still radically altered the fate of Taiwan. Now, any effort to recover the voices of the colonized is going to be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Paul Katz 康豹, “Colonial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in Southern Taiwa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Ta-pa-ni Incident of 1915”). If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has long come under the spotlight for its complicity with imperialism, there is rather a lot of complicity to go around. In this sense, though,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might be set against the problem of ‘unthinkability’, or: that which could not be knowledge. Put conversely, the Japanese possessed ‘knowledge’ that aborigines could not rebel because they were either too savage to organize or too civilized to revolt (Leo T.S. Ching, “The Musha Rebellion as the Unthinkable: Coloniality, Aboriginality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Colonial Difference”). Did such knowledge help or hinder the colonialist project?

If societies can be colonized, so too perhaps can bodies. The general interest in ‘modern bodies’ that we see in a variety of political systems was a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黃金麟，〈身體領導與現代性的身體建構〉). This form of ‘cosmopolitanism’ is itself a mark of modernity, I think. And the need for bodily control represented both a kind of knowledge and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his was also seen in anti-state

revolutionaries—but the point here is that revolutionaries wanted to take over the state, not abolish it as such. The story of the body, though it is hardly over, also suggests the limits of power, since the state's desire to abolish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could hardly be a complete success, at leas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odernity. Nor were state officials necessarily opposed to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if it could be seen as constituent, not opposed to, the state, in a process that was (conceived to be) simultaneously disciplinary and liberatory (Peter Zarrow 沙培德,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Modernity in the Late Q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tate").

At the same time, nothing is closer to our everyday experiences than our bodies. And as for bodies, nothing could be apparently less modern than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gambling. These are ancient activities. Nor are the state's attempts to regulate them in the least new. But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various states associated with Shanghai—Britai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course China—thought about these issues in the 1920s and '30s, the modern questions surrounding citizenship were structured by discourses to which they could contribute but not control (張寧, 〈賭博與犯罪：從公共租界跑狗政策看上海的運動型賭博，1927-1934〉). 'Knowledge' here refers to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 sports gambling, which of course are part of larger systems of ideas. Gambling is itself a form of leisure consumption. It might seem that consumption is as simple a daily-life activity as there is, even at rarified levels like tourism (巫仁恕, 〈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 At one level there is a simply equation of consumption = class = power questions. Of course the knowledge system allows, and perhaps even encourages challenges at all levels. As with the Ming encyclopedias, Ming tourism linked knowledge to affirmations of the class system and resistance to it. The point of capitalism, and perhaps a high level of commercialization, is that the system's components then become self-destabilizing, though arguably not the system itself.

When we turn to specific intellectuals, we fi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knowledge-produc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tellectual and power generally has its ups and downs, as both

Zhang Taiyan (章太炎) and Liang Qichao (梁啟超) show in different ways. Zhang today look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as a critic of modernity (汪榮祖，〈章太炎對西方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If, on the other hand, we accept that the nation-state represents a kind of epitome of modernity, then Zhang Taiyan also emerges as its pioneer. So the question is, as a critic of Western modernity, did he represent an alternative Chinese modernity? His cultural pluralism was one response to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was thus inherently modern. Indeed, perhaps skepticism about modernity is itself a sign of modernity—and was a view in any case not unique to Zhang. (And could it be a kind of premature post-modernity, is also a question at least worth asking.) There are, however, real differences between Zhang's ideas and what we now think of as cultural relativism, one of these being that I do not think Zhang had any sense of hybridity.

Liang Qichao, too, represents paradox, in terms of any traditional theory of modernity (so to speak) (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In moving from scientific, unilinear, evolutionary history back to a greater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Buddhist notions, and an explicit critique of scientism and empiricism—surely Liang was becoming more modern not less. To be a critic of some aspects of rationalism does not make one an irrationalist, much less a traditionalist. But in spite of considerable work done on major intellectuals like thes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ir idea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needs further clarification. This suggests, more broadly speaking, the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range of lesser-known topics broached in the papers of this conference—allowing us to connect the everyday to power and knowledge in China over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中國近代國家的塑造」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任育德*

近百年來的中國，不論是內造或外塑，漸變或劇變，到了 20 世紀末的確走入了近代國家之林。中國國家塑造之過程中，包含了民族主義的興起、意識型態的形塑、國家機器的改造與運作、政黨和國家、戰爭與國家、婦女與國家等議題與方向，均值得史學界進一步深入討論與省思。2002 年 12 月 13、14 日（星期五、六），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協辦，純智文教基金會、中正文教基金會贊助，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廳召開之「中國近代國家的塑造」國際學術研討會，邀約中外史學工作者齊聚一堂，以史學研究之新概念與趨向，就以上議題進行相關研討，希望進一步豐富近代史研究之深度和廣度。

就國家塑造，進行理論反省、跨國性比較的論文，有以下 3 篇。澳洲 La Trobe 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指出，20 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中形塑「人民」，在追求國家、民族自尊的大目標下，同時蘊含之「受害者意識」，深遠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沈松喬認為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抑或是民族國家的行動者，均以固有的文化、歷史資源為基磐，塑造理想中的中國，唯因「族類論述」造成內在局限；就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外在脈絡論，又使得中國民族的想像與建構，深受國際現實政治條件限制。美國加州大學爾灣校區歷史系教授王國斌(R. Bin Wong)，則從塑造歐洲國家之基本問題——稅收制度著眼，探討自清至中共建政後，中央與地方面臨稅捐徵收與分配時，所面對的相同及不同挑戰。

有 3 篇論文針對政黨與國家塑造議題進行探討。日本山田辰雄教授認為中華民國作為統一的國民國家的軟弱性、構成其基礎的政治勢力的軟弱性、沒有封建議會、政黨擁有統治區域和軍隊、帝國主義的存在，導致民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時期國共兩黨會兩極分化並走向獨裁、政治無法制度化。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高郁雅針對抗戰後國民黨新聞事業機構企業化的嘗試為題，指出企業化成本高昂、國民黨對新聞事業模糊不清的界定，造成營利、宣傳目的兩頭告空。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王良卿，從 CC 系與蔣介石、黨國體制之間能否達成協調行動或者諒解角度出發，就 CC 系在國民黨政權遷台初期的政治適應，做出相關陳述與評價；也針對改造運動所開展的黜退政治提供部分解釋。

探討慶典、儀式與國家塑造之論文計 3 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沙培德(Peter Zarrow)認為，新式的民國慶典儀式標識出中華民族的統合，並鼓勵認同作為國家的一份子。同時，諸項民國慶典儀式也是國家的自我表現，而誰究竟應該列入慶祝的行列所引發的爭議，也就在眾人意料之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王超然，分析「國父」形象，指出國民黨透過國家機器運作，從上到下建構孫中山論述，試圖建構由國民黨主控的啓蒙意識型態，並為日後中國政治領袖建立個人論述開創先例。英國里茲大學東亞研究系講師 Henrietta Harrison，以選舉為例，根據山西舉人劉大鵬之《退想齋日記》，指出民初許多人以傳統語彙評斷現代制度，為了提供新國家合法性應運而生之新制度，在實施後卻往往事與願違，讓日後推行制度化的嘗試更形艱難。

有 4 篇論文從醫療、女性與國家塑造角度探討。臺灣科技大學人文學科助理教授范燕秋探討日治時期近代醫學、種族身體的塑造與帝國意識之建構與發展關係。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助研究員張哲嘉論述中、日兩國移植法醫學之進程遲速，指出國家參與之知識建構，對知識性格、國家與人民間之關係，造成了本質性改變。明道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許慧琦，探討由 1930 年代國府主導或發動進行之塑造「時代女性」形象嘗試，並探討政黨、政府與婦女彼此間可能發展出的關係。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柯惠鈴，分析清末革命政治中的女傑敘事，指出一方面導致女性性別認同之挫折；唯藉由她們的努力，仍使女界從性別角度被承認是社會階層的一個部分，並得與其他商界、學界、工、農等並列。

探討國家機器與國家塑造關係之論文共計 4 篇。臺灣科技大學人文學科陳純澄副教授，探討 1950 年代臺灣威權體制建構初期警政發展。親民工商專科學校共同學科副教授劉熙明從地方武力切入，指出抗日戰爭導致中央軍勢力擴展至河南鄉區，使地方武力與中央軍各系產生互動，甚至成為中

央軍系之地方代理人。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羅久蓉指出，司法改革係中國是否能夠躋身現代化國家指標之一，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故司法是否獨立備受矚目。1930、40 年代國府司法改革的一大特色是，由爭取國家主權獨立自主而來的「司法獨立」與國民黨「維護政權」兩種價值理念互相牽制，因此而形成的政治、文化上之緊張衝突，與國民政府司法改革相始終。元智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孫慧敏從國府統治時期上海的中國律師業發展，指出中國律師業與民眾之間的疏離關係，使律師業必須仰賴國家法令的保護才能生存，而國家予以保護，則主要是根據對西式司法制度的信仰，當該價值信仰在 1949 年遭逢政權變遷，上海律師業便迅速進入休眠狀態。

經過兩天議題的論文研討，並在中國近代史學會理事長呂芳上先生的主持下，進行五十分鐘的綜合討論後，研討會於下午四時四十分圓滿閉幕。

附：「中國近代國家的塑造」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講人與題目

1. 主題演講：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The Republic of Sentiment—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 Modern China*
2. 山田辰雄：中國政黨史論
3. 高郁雅：戰後國民黨新聞機構的企業化嘗試(1945-1949)
4. 王良卿：派系與黨國：國民黨政權遷台初期的 CC 系及其政治適應，
1949-1950
5. 張哲嘉：從洗一身之冤到躋萬國之列——近代中日兩國法醫學現代化
進程初探
6. 范燕秋：近代醫學、種族身體的塑造與帝國意識——以日治時期台灣
為例
7. 沈松儒：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
8. Peter Zarrow: *Celebrating the Nation: Symbols of Citizenship, 1912-1919.*
9. 王超然：領袖與國家：孫中山革命論述體系的建立(1925-1940)
10. 柯惠鈴：去舊質，鑄新魂：清末革命政治中的「女傑」
11. 許慧琦：過新生活，做新女性——1930 年代初期國民政府對時代女性
形象的塑造
12. 羅久蓉：國民政府司法改革初探

13. 劉熙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河南省的地方武力與中央之關係
14. 陳純瀅：我國威權體制建構初期之警政(1949-1958)
15. 王國斌：從財政角度談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形成
16. Henrietta Harrison : Experiencing the Modern State in Rural Shanxi:
Money and Democracy in the 1916 Elections for the National Assembly
17. 孫慧敏：依違於國家與民眾之間：國民政府時期上海「中國律師業」
的發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7)

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

呂妙芬著

484 頁 精裝 400 元 平裝 350 元

本書以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取徑研究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學術運動——陽明學——之興衰。除了循時序描述陽明學派的建構、後續發展和地方講會歷史外，探討的內容從學者個人思想內涵、議題論辯、學派內部差異、學者個人乃至群體的行動及其政治意涵、到明代教育與科舉制度所衍生的士人群體在社會結構上的變化及相關社會現象，所涵括的向度從個人内心世界延展到政治社會層面，乃試圖將陽明學置放在明代文化脈絡中進行研討。全書觸及的議題包括：陽明學做為一種私學，它與朝廷官方及程朱官學間的權力關係；陽明學賴以傳播的社會組織——講會，在性質與實際運作上如何關涉著明代士人群體乃至地方社會中的政治與文化；陽明講會活動在吉安府、寧國府與浙中三地區的發展歷史及所呈現出的地域性差異；陽明學者如何在道統框架內界定其學術的正統性；講會這種結集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與學者們對朋友之倫的論述之間的交互關係；以及晚明江左和江右地區文化與講學風尚的差異與對話。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 國際學術研討會

鍾淑敏*

2002年12月23至24日，中研院台史所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經費贊助下，舉辦了「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天的會議，分成「法治」、「文學」、「文化教育」及「殖民與從屬」四大主軸，由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台灣本地的學者共同發表15篇論文。會議議程及進行情形如下：

法治：吳豪人〈殖民地法學者的近代性認識——岡松參太郎研究的省思〉、淺野豐美（日）〈日本帝國的成員——以台灣、朝鮮戶籍及作為法域間秩序的共通法為中心〉，評論人是王泰升。吳文為作者對日治時期台灣舊慣調查事業總其成者岡松參太郎的系列研究之一，藉著分析岡松與其德國老師 Kohler 及同時期荷蘭殖民地法學者 van Vollenhoven 的相關論著，指出其近代性認識之侷促。淺野的論文重點則是透過共通法的制定過程，來討論分屬不同民族集團的個人發生結婚、交易或者設立會社等私法關係時，日本帝國法制如何規定的問題，藉以從法的側面來實證探討殖民地近代法上同化構造的課題。

文學部份分成兩個場次，首先登場的是王中忱（中）的〈殖民都市文化與《亞》詩人群的詩藝〉及柳書琴的〈反現代與反殖民論述的演繹——王白淵的泰戈爾論與甘地論〉，由陳芳明擔任評論人。王文重新建構1920年代殖民都市大連的文化圖像，透過對《亞》詩刊及詩人的分析，探討東亞的現代主義文學與殖民主義的複雜糾葛及辯證關係。柳文則指出王白淵的印度論說，是從東西方的反現代批評中獲取反殖民論述的資源，有助於我們從另一層面思考有關文化抗日或反殖民論述的問題。

文學的第二場次由岡林稔（日）的〈中村地平與臺灣小說——〈熱帶柳的種子〉中心的作品論〉、吳英珍（韓）〈鐵幹與謝野與韓國〉、岡田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英樹（日）〈由華文所構成的大東亞共榮圈——雜誌華文《大阪每日》《文友》的世界〉3篇所構成，評論人是邱若山。岡林重新檢討〈熱帶柳的種子〉一文的性格，認為其不只是純潔的中村地平之殖民地青春小說，而是體驗居住於殖民地的不愉快之後的著作。吳文透過對與謝野寬詩歌集《東南西北》的分析，探討其與日本暗殺朝鮮王朝閔妃事件之關連。岡田則指出《大阪每日》、《文友》等華文雜誌，雖是日軍的宣傳刊物，但是反而為「滿洲國」、華北、華南等分隔與孤立的文壇，提供一個實質的交流園地。

文化教育的第一場次是陳培豐〈殖民近代化中台灣人的主體性以及其影響——以大正期國語「同化」教育政策的轉換為論述〉、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感性知識〉兩篇論文，評論人為蔡錦堂。陳文指出1920年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兼具教育普及的現象與壓制被統治者平等權力的統治方式，形塑了日本帝國式殖民地統治的特殊性。廖文則以台大圖書館「田中文庫」、石川欽一郎、池上秀畝、佐藤春夫等為例，探討收藏家如何在台灣形成一種知識體制，而與本土的記憶產生特殊關聯的問題。

第二場則由許佩賢的〈「體操」、「唱歌」與身體的規律化（1895-1911）及駒込武（日）的〈林茂生與「殖民地式的近代」——殖民地教育與近代教育之間〉兩篇論文組成。許文討論殖民政府如何透過學校裝置，以體操科及唱歌科的設計達到改造新附民身體的目的。指出此種改造可說是將台灣人身體文明化、近代化的工程，但也必然包含了排除、差別及對身體的暴力。駒込論文則透過對林茂生博士論文的分析，指出其之所以批判殖民地教育，乃得自留學美國及英國傳教士所代表的近代之啓示。然而他雖對近代抱著憧憬，卻又為「近代」所排除。作者藉此批判「殖民地式的近代」具有暴力性格。本場次原訂評論的吳文星因家有急事，竟然無法與會。幸而本次會議學者參與踴躍，院內人才濟濟，大會情急之下，將在聽眾席上的游鑑明及黃智慧二位，半「脅迫」的敦請上台分別擔任評論人。幸虧二人為教育、女性史以及殖民主義等領域的專才，總算「化險為夷」的解決了一時危機。

殖民與從屬的第一場次是林玉茹的〈邊陲、戰爭與殖民產業——戰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投資事業的佈局〉及鍾淑敏的〈殖民與再殖民——「台灣經驗」在海南島的輸出〉，評論人為劉素芬。林文詳論台拓在

東台灣的投資狀況後，指出戰爭促使邊陲產業開發，但各項投資不但與在地日系或台灣人資本無關，工業化也並非配合地方實際開發而進行。鍾文則探討日本殖民台灣時所累積的「台灣經驗」在海南島的軍政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位居日本帝國底層的台灣人如何配合此殖民地的「再殖民」。

第二場是黃蘭翔的〈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在沖繩石垣島上之移墾與融入〉及陳翠蓮的〈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由張茂桂論評。黃文在田野調查的成果下，詳論日治時期台灣人移民石垣島之經過及與當地社會融合的情形，指出其生活態度與認同關係，受到沖繩、日本、台灣、中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之影響。陳文則透過自治主義政治運動的探討，呈現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愛恨糾纏的關係。並指出遵循殖民者所訂定的遊戲規則、複製殖民者思惟體系的自治主義政治運動，有落入自我矮化、畫地自限的困境，與無法顛覆殖民關係的危機。

閉幕前的「圓桌論壇」是另一重頭戲。在曹永和、西田勝的主持下，希望藉由 6 位引言人的專擅領域引導對「殖民與現代化」的再檢討。只是會議中意外連連。先是原訂引言的日本社會評論家小田實因故未能登機，其所預備談論的「日本小說家之我見我思」改以書面朗讀，以致原來針對此議題而來的台灣小說家平路之「我見我思」，失去對話的意義。代替小田實的女詩人高良留美子從女性主義的觀點，藉著樋口一葉的作品批判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亞洲的侵略。西田勝（日）的「殖民地下台、滿文學之比較」及徐勝（韓）的「清算日本殖民地支配之挫折以及韓國及台灣光復後之重大人權侵害」，都是洋洋灑灑的高論。尤其是徐勝因其政治犯的特殊背景，對於人權問題格外關心。然而長篇大論遙遙超過所預訂的時間，使得黃克武及張隆志的時間大幅受限。加上黃克武的「論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弔詭」及張隆志的「殖民現代性分析與台灣近代史研究」，都是從學術出發的討論，與前述的政治性發言大異其趣。結果，熱烈的場面雖使得閉幕時間較原訂延後半小時，可惜的是並沒有達到聚焦的共識。

對於本次會議論文的特色，「圓桌論壇」上黃克武作了最好的評述：本次研討會的一大特色是研究地域的擴大，將台灣史放在東亞史的脈絡中，走出國族疆界，以亞洲為空間範疇。所含括的範圍，除了殖民國日本外，也包括台灣、朝鮮、滿洲、香港、海南島、東南亞等有被殖民經驗的各個區域。其次是題材的豐富性，以文學空間、移民、旅行、記憶的創造與現代知識的傳播：如經濟、教育、法律、衛生與身體規訓、權力的介入：

如戰爭、侵略、宰制、暴力為特色的「國民塑造」與「人種塑造」等，來表現區域間互動的關係，藉此點出會議的主題「殖民主義與現代性」。會議中也以學術的中立性論及殖民與被殖民的兩面性，指出文明啓蒙與經濟開發的另一面則是暴力管訓與資源榨取。從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出發，為瞭解這一段複雜的歷史經驗奠定重要的基礎。

兩天的會議在制止不住的熱切發言與按捺不住的按鈴聲中熱鬧的閉幕。這樣的場景似乎不是一般研討會的常態，但正呈顯出一般人對此議題的關心。「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研討會雖然落幕，「殖民主義與現代性」想必仍然是個恆久的課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1)

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許雪姬等3人 紀錄：丘慧君

275頁 平裝 250元

王世慶先生，1928年（昭和3年）生於板橋下溪洲，先後就讀州立桃園農校及府立台北師範學校本科，在師範學校時期，受到國分直一老師的教導，開啟研讀歷史的興趣。1946年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教沙崙國校及山佳國校，1949年在黃純青先生的引薦下，進入了台灣省通志館（即日後台灣省文獻會）擔任採訪員一職，迄至1990年代以委員一職離開省文獻會，期間三度進出台灣省文獻會，而後轉任中央研究院社會人文科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在省文獻會的四十多年期間，先生深炙名流耆宿，如林熊祥、林衡立父子的鼓勵，研讀古籍名著，編纂通志，從事台灣史事的研究，奠定日後研究台灣史的根基，進而成爲戰後研究台灣史新生代的人物之一。1960及70年代，藉著與日本學者中村孝一及西方友人武雅士教授等人的學術切磋及文化交流，先生不僅拓展歷史領域及研究方法，多篇論著也引起西方學者對台灣史的重視及對先生的倚重，先生隱然成爲台灣史研究權威。

先生一生專研台灣史，專書三十九本，論著百餘篇（參見附錄），其研究領域可分爲：纂修通志，搜集、解讀、利用古文書（族譜、地契）及台灣清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其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及資料，對學術界無疑是一大貢獻，而其審慎治學的精神，尤值得後人學子效法。



學術演講

歷史的觀點與現代 ——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濱下武志**・箱田惠子、劉素芬譯***

我原以為今天是退休演講，不過主持人卻沒有介紹我的經歷，我認為這樣反而很好。

我在考慮今天的報告題目的時候，把重點放在現代來思考，因為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縱使在現代有短期性變動的情形之下（例如今天上午十一時美國和伊拉克開戰），從長期性的觀點來考慮，作為歷史研究有意義的課題，也能成為對社會提出的課題嗎？因此，基本上我今天的報告並不是現代史研究，而是從歷史的觀點與現代的角度來作報告。

因為今天是研究報告，我想應該先說明我現在的研究課題。我想要探討的是近五十年來東南亞的僑匯、東南亞及其向中國華南僑匯的動向，至於理論架構，就是現在所謂的 derivative 相關問題。derivative 就是所謂的「金融衍生商品」，其中包含股票選擇權(option)及期貨買賣等，本來具有很日常化的歷史的一面，但在近年的金融危機中，成為有得就有失的零和遊戲，而被認為具有高度的風險性。但是，關於現代金融市場的金融衍生商品的問題，歷史上的僑匯在作法、想法之中，已經含有同樣的風險性的問題。根據這樣的觀點，現在我打算把歷史上因僑匯所形成的東南亞與華南的聯繫，和現在的東南亞對華南非常積極的投資活動一起比照來考慮。關於這個問題，和今天的演講大綱的第二部分「如何把握近現代中國」與第三部分「亞洲研究的觀點」有關。

* 2003年3月20日，濱下武志教授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發表的告別演講。高見澤磨先生主持，黑田明伸先生評論。

** 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班研究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幾個實驗——學門、場域

今天是我在東洋文化研究所例行研究會的最後一次報告，所以我想先在第一部分回顧自己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課題及感興趣的問題。我的演講大綱前言的副標題是「幾個實驗」，這些實驗就是我的研究課題。雖然稱之為實驗，大家可能認為我還不能預料未來的結果，可是關於歷史研究的方法、課題或相關事宜應該如何進行，就是我的研究課題。我也不認為這種實驗馬上就能得出結果，但是我希望透過自己不斷地思考，能夠整理出一些東西來，所以稱之為實驗。至於學門(discipline)、場域(field)、資料三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考察，這就是我的課題。

歷史研究的場域，雖然和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場域不同，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司馬遷也是基於場域來研究歷史。對歷史研究來說，場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場域不是歷史研究的一種方法，而是用來質疑歷史研究，並和其他學門進行比較。

資料與 IT

另外一個主要的因素是資料，歷史研究的資料應該分成若干層次(level)、階段、深度。現在我比較關切的是，在把大量的歷史情報資訊開始數位化、收集、公開的時候，如何利用資訊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進行歷史研究。我認為雖然在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中，資訊技術已經成為研究的大前提，但是在所謂的歷史研究上，用處理資訊的技術辦法來處理歷史資料的話，對這樣的研究，應該給予什麼樣的學術評價？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各式各樣的議論，但是仍然還有很多討論的餘地。恐怕因為歷史研究具有非常主觀的、長期的對象，也有非常個別的對象，由於對象本身的非均質性、廣泛性，所以在情報資訊處理的過程中，歷史研究的方法不能被引用。總之，無論進行大量資料的數位化，或建置資料庫(database)，我認為歷史研究的角度、研究途徑應該是最重要的。不過，關於歷史研究，例如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投入大量的統計數字，得出三十年或五十年的統計圖形，這種用情報資訊處理的辦法得出歷史模式的研究，和過去的敘述性的歷史或以因果論、因果關係為基礎的歷史研究想必有所不同。就這一點而言，迄今在各方面已經建立了許多的 database 資料庫。雖然這些成果給我片斷的刺激，但是我不斷思考它們應該在歷史研

究上佔有什麼地位的課題。在我的印象中，1980 年代後半以後，臺灣和澳洲開始急速的情報資訊化或網路化，所以這並不只是日本或我們才有的問題，應該從各種角度來考慮，並提出解決的辦法。關於這一點，在情報資訊技術發展的情況之下，我把學門、場域和資料三者的關係應該如何考慮，列為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空間歷史

其次，是空間歷史的問題。雖然含糊籠統的說來，歷史學或歷史研究的對象還是處理時間的問題，基於時間的變化把事物的動向弄清楚明白的課題，但是如果把這種動向改放在空間的變化之中，以此來考察歷史或時間的話，結果會如何，這是我強烈關心的課題。關於這個問題的方法，雖然在歷史地理學或地緣政治學方面，有幾個方法上的討論已經有實質的成果。但是我所思考的，並非時間的變化，特別是經濟發展或歐洲模式所形成的以時間歷史主軸為中心的歷史，而是自由設定的空間，在空間之內如何形成地域、從什麼角度來看待地域等，我想考察這些形成地域的要素及其影響力。

網絡

再者，還有關於網絡的問題。雖然透過網路聯繹是很表面化的手法，但我這十年來，利用網絡聯繫事物的作用為中心來思考，不只是學術動態消息如此，連社會情報資訊全是透過現在所謂的網絡。特別是我最近感興趣的「中國」，我所指的並不是作為國家的「中國」，而是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以至於東南亞的領域，或視情況銜接歐洲的「中國」。在我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雖然所謂的網絡是非常表面性的方法，但它相對於現在各學門要求高度專門化的發展來說，可以根據專門化的深度，把被研究的問題再度綜合起來，從橫切面來考慮。亦即現在的網絡，或許可能有表面銜接的問題，但是對於現在學門領域的縱深切割，它能夠從橫向銜接來考慮問題。

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例如在一個星期內到三、四個不同國家的都市去，把它當作一種實驗。持續這樣做的話，除了國家的界線或文化的界限以外，或許可以發現和過去不同的平面。這十年來我懷著這樣的課題，到

漢城、北京、上海、廣州、香港、新加坡及台北等各個都市走動。如果以網絡的中心和線的聯繫來考慮的話，人居於網絡的中心或網絡上的點的位置，通過線得到各種消息，以進行交流。我把自己也當作那種線到各處走動，想做做看在線上活動之外的下線(off line)實驗。現在回顧我這十年來的實驗，在前述提及的各個都市中，有大學的研究領域和當地的研究學者們，現在我想考察這些人，他們具有什麼網絡的可能性，如何區分，他們的研究如何；至於在學門領域之內，面對國內、國外嚴格區分的現狀，我也想要把它們設法連結在一起，嘗試消除按國別區分研究的情形，所以進行這種實驗。不過後來也因此重新考慮網絡。譬如說，要從香港去韓國的時候，如果在香港忙到晚上的話，去韓國的班機已經沒有了，但是曼谷有去韓國的夜間班機，所以我從香港先到曼谷，然後在那兒搭機去韓國，那我可以在早上之前到韓國。不斷採用這樣的辦法，漸漸覺得很累。據說韓國的古諺裡有「旅毒」一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越旅行越累，我想這句諺語也許代表儒教勸人安土重遷的理念，按這樣的講法來說，我想自己早該死了。我這幾年這樣到處走動的實驗，以後會有什麼成果，要如何整理，目前我自己也還不能預料。還有這種問題並不限於歷史研究的範圍，除了日本的歷史研究或中國的歷史研究有所謂的國別(nationality)差異之外，研究還有所謂學門領域的普遍性的限制，所以歷史研究的一般化非常困難。因此，或許以某個地域或某個國家為主軸來進行研究比較好也說不定。以下把近二十年來歷史研究的特徵分成五項加以說明，雖然關於這些研究項目我相信有很多人比我更專門，我也沒有把握這種整理一定對。

一、近二十年來歷史研究（東亞史研究）的特徵

（一）社會史和認同(identity)

這兩個課題是這十餘年來歷史研究顯現的最大特徵。以社會為研究對象，除了權力結構或經濟、政治各方面之外，這種研究以把握社會非常多樣的側面為對象，目前已經得到很多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引進有關認同的討論。在歷史研究上，開始討論認同問題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例如某人在某處說什麼、想什麼，原先弄清楚這個事實就是最後的目的，但以此作為根據，關於那個人的活動、思想的背景、環境結構，應該進一步用他背後的資料來考察，出現這種新的課題。到了這個

地步以後，在歷史研究上認同研究變成非常重要的題目之一。另一方面，歷史資料和認同的關係，也是一個新的、讓人很感興趣的課題。

(二)來自鄰近學門的影響：人類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史

這些鄰近學門影響了歷史研究的結果。對社會研究而言，這些課題是必須討論的題目之一。歷史研究本來就具有自己的方針性，但是對於重新仔細考慮作為學門領域的歷史學而言，這些課題也是很有用的題目。譬如在中國的話，雖然史學史做為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已經確立，但是關於社會研究的方法，可以從各種角度來取材或得出結論，就這一點而言，中國沒有確立比較嚴密的學門領域範圍的想法。譬如在經濟史方面，經濟和歷史的關係要如何界定，這個問題也提出了新的課題。我比較喜歡從社會、經濟方面來研究歷史。由於經濟學是從學門來逼近現實，相對於歷史是從既有的事實來演繹的方向進行研究，因此經濟學門是非常嚴格的，這兩者的關係可以說是處於兩個極端的學門、實體、狀態，這兩個學門要如何相互討論？我這二十年來積極吸收鄰近各學門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現在我自己重新提出歷史研究有沒有必要具有特徵的疑問。但是就日本的東洋史歷史研究而言，它具有從漢學演變成東洋史的觀點，就很有地方性的特徵，再把這個特徵和所謂的國家主義互相结合。基於這樣的背景來考慮，歷史本身的確可以作為廣義的一般學門來定義。

(三)數位化資料和情報資訊技術

現在數位化進行得很快。我自己是在東洋文化研究所起步的，得力於丘山新先生很多。對於今後在歷史研究中要如何利用資訊技術的討論也很多，例如可以處理大量的資料，因此檢索起來就容易了，也可以進行各種比較，也可以討論長期性的傾向。譬如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圖書館有多少知識量，一般我們使用圖書館，只利用我們專門研究的部分，但如果把建築物全體掃描，連我們的頭腦裡面也能掃描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它有多少知識量、擁有什么特徵、具有研究什麼課題的可能性。我現在設想的是如何掃描成影像，如何有效利用 mega 情報資訊處理，而非針對專門性進行更加專門化的情報資訊處理。譬如對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整體進行掃描，從

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研究它的時候，情報資訊具有什麼特徵，有什麼研究方法，mega 情報資訊處理技術能否提供一種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或課題，讓我們可以從資訊的綜合性，特別是關聯性來進行研究。當這種課題出現的時候，過去各方面已經完成的很多的網絡資訊情報或數位化資訊情報，要如何整體研究，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最後，我要說的是一個如何處理資料的嘗試。最近幾年來我最感到興奮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接觸到 GHQ (General Headquarters，駐日盟軍總司令部) 的「關閉機關資料」。請各位參看另外一份資料「海軍省等移管南方軍政關係史料來歷表」。就資料的性質而言，這個資料的價值很高，因為是海軍省所收藏的，所以和 GHQ 的清算事業沒有關係，因此被收進外交史料館，它的基本性質是經濟資料、企業資料。從該表的左半，可以看到有「保險」、「事業給與」、「臺灣銀行」、「南洋開發會社」等項目。過去因為沒有 1930 年代、1940 年代經濟方面的資料，雖說當時的政治、軍事是研究的前提，可是沒有當時的經濟資料，就不能進行研究。從這樣的課題和研究說起來，這批 GHQ 的「關閉機關資料」具有很大的潛力。這批資料的發現是在施行「情報公開法」的前一年，我想這和各省廳處理自己所藏的資料有關係。當時大藏省和我聯絡，他們告訴我收藏了一批 GHQ 的資料，文件上註明這批資料已經被廢棄，如果有研究需要的話，他們可以出借，我毫不考慮的回答說需要。但是那批資料一共有 6,000 箱，每一個箱子比從前的蘋果箱更大，當然東京大學沒有地方收藏。湊巧我新就任的京都大學的地下室倉庫還沒有使用，所以我借用這個倉庫來收藏資料，箱子堆了十層，高不見頂，可見數量之龐大。這批資料記載了 1920 年代、1930 年代日本企業的具體經營狀況，國內企業的情報占三分之二，與亞洲有關的占三分之一，總之資料內有幾千箱所謂的舊滿洲、朝鮮半島、臺灣、海南島及南洋的企業資料。今後要如何進行整理這麼大量的資料？在過去的話，是按研究者自己關心的研究題目挑選出有關的資料，但是我個人現在的研究關切是要確立資料的總體具有什麼特徵，按照這些特徵，該批資料應該如何整理才好的問題。所以我想問的是，類似 GHQ 這樣的新資料問世，要如何處理的問題。

本來公文書館應該收藏這種基本資料，而且當時正逢政府學術機關進行獨立行政法人化，很幸運的正好那個時候在筑波設立了公文書館的分館，在借用這些資料的三年之間，由筑波分館收藏和整理，目前仍在進行

中。由這批資料可以知道下列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是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企業具體的內部結構、人事上的調動、金錢款項的流動都非常清楚。另一方面是清算事業的過程。聽說日本全國一共有一萬人在 GHQ 指定的一千家以上的公司進行清算，各該指定公司停止經營，計算它的國內的財產再予以拍賣，把出售所得分給股東，這種財產清理就是清算事業。其中有國內的滿鐵公司、朝鮮拓殖公司、東洋拓殖公司及南洋拓殖公司等幾個很重要的公司的資料。譬如東洋拓殖公司從北方到東南亞從事廣泛的企業活動，諸如此類的企業活動顯示日本也和美國一樣，有很多關係企業涉入清算事業之中。總之，調查這些資料，發現 1940 年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或前所未有的經營關係。就我個人的印象來說，在從前的歷史研究上，對戰爭問題，戰後歷史家難免有嫌惡或罪惡感——確實是罪惡的行爲。然而以這種認定作為研究前提，或許會喪失原本應該探求的歷史發展脈絡前後連貫的一面。其中一個理由可能就是因為沒有資料。與其以戰爭為象徵，不如從歷史脈絡前後連貫的角度來重新討論戰爭，此後的研究必須掌握歷史脈絡發展的前後關連性。由於這批資料的出現，才有可能促成此一轉變，進而提出這種課題。

與此一問題有關的，就是新近開放的「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網站 (<http://www.jacar.go.jp>)。關於這個機構的成立，可以追溯到村山內閣時曾經決定要從事戰爭研究，其後歷經波折，大約從三年前開始進行，目的在於把外務省外交資料部、防衛廳戰史資料室、公文書館三者的資料全部數位化、網路化，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下載資料、複印資料，而且完全免費。預計資料全部掃描共有 2,700 萬頁影像檔，計劃每年完成掃描 200 萬頁影像檔。負責該計畫的資料室室長是石井米雄先生。在進行過程中，我們也不斷開會討論各種具體可行的辦法。我認為這也和 mega 資訊情報處理技術的問題有關。當然關鍵字的檢索也是一個辦法，可是作為資料總體的特性，我們應該如何進行討論？處於可以利用 mega 資訊技術處理大量資料的時代，我們需要仔細考慮如何掌握總體特性的辦法。譬如京都大學經濟學部負責發展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經濟，亦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時代的經濟，在經濟學部圖書館的地下室，收藏當時日本國內刊行的出版品及中文、英文、俄文及法文等圖書，應有盡有。猜想可能受到戰後京都大學的發展方針所限，戰後五十年京都大學經濟學部沒有研究亞洲經濟的專家，因此沒有人利用這批收藏品。我認為與其研究一本本書的內容，不如

研究呈現當時時代像的資訊情報、制度組織，這是今後要考慮的問題，也和前面提到的數位化和 IT（資訊技術）的問題有關。譬如很多佛教經典已經數位化，以此為基礎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來了。但是我關心的，並非某一方面的數位化，而是從掌握總體為何物的角度來評價歷史。

(四)全球歷史研究(global history studies)

今後全球歷史研究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問題。譬如說 Andre Gunder Frank 以從屬資本主義的依賴理論，提出 ReOrient 來討論銀的世界，就是以 17、18 世紀的世界背景為前提來討論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1998)。就批評過去的歐洲中心主義這一點來說，他的研究具有強烈的宣示意義，然而作為亞洲經濟、亞洲地域經濟在全球歷史研究中佔有什麼地位，這是我想要改而提出的課題。當我會見 Andre Gunder Frank 的時候，他問我能不能解決 ReOrient 以後世界的問題，因為關於 19 世紀以後已經有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大英帝國(Pax Britanica)等很多的理論。我們的話題轉為接續 ReOrient 之後能不能提出新的理論。雖然我回答說我一定會提出新的看法，然而世界體系理論即便是以世界為對象、討論世界，但是我認為它還是歐洲地域論的延長而已。對華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理論，我也有強烈的這種感覺。以世界為前提來討論，以世界為背景的研究，現在在日本也有秋田茂先生從全球歷史的角度來進行研究，但是我認為世界體系理論還是以歐洲地域史來展開的一個觀點而已。

至於亞洲，雖然有人討論什麼是亞洲的定義（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 年），但是我認為要以如何探討地域論作為課題。就這一點而言，我關心下列兩個問題：一是 1930 年代、1940 年代的歷史，譬如說在我個人的印象中，這個時代的歷史被視為禁忌，我希望從長期的歷史脈絡的前後關連性來突破，這是一個課題。二是在討論國家對國家的關係之前，從和過去長遠的歷史發展已有不同的地域像或地域關係來討論。從這兩個角度來考慮的話，我對研究朝貢關係有興趣。

至於全球歷史研究，譬如，雖然美利堅合眾國沒有歷史，但是美洲大陸有歷史。如 Kenneth Pomeranz 等人的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the present (New York : M. E. Sharpe, 1999) 一書，提出以西班牙統治時代的南北美洲的白銀——墨西哥的銀、波多西 (Potosí) 的銀及玻利維亞的銀——來考慮的話，美洲是一個世界歷史的重要中心。還有玉米、辣椒及馬鈴薯等美洲原產的植物，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播到世界各地。這種觀點就是在全球歷史上確立美洲的地位，而不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地位。研究美洲歷史的時候，並不是從移民的歷史、移民和獨立的歷史開始研究，而是強調在全球化形成中美洲大陸歷史所扮演的角色。雖然這種觀點用所謂的「全球」來呈現，或許也懷有把現在美國的霸權植基於歷史上的論證或試圖予以證明的動機。因此，我們應該重新討論亞洲的地域主義或朝貢的問題，具有什麼樣的理論上的一般性，或亞洲歷史固有的特性。

就這一點而言，我接觸到琉球的《歷代寶案》，這是根據舊日本臺北帝國大學（現國立臺灣大學）收藏的檔案為中心，由小葉田敦先生編輯出版。它有長達五百年之久的均質資料，即使是資料更詳細的歐洲的東印度公司也沒有這麼長期的資料。《歷代寶案》的內容是琉球對東南亞各國派遣朝貢使節，採購蘇木和胡椒等商品，然後向中國朝貢。雖然在明代琉球是以這種朝貢方式為主，但清朝實行海禁之後，琉球就專辦中國和日本的貿易了。與其過去根據中國的《會典》、《會典事例》所記載的有關朝貢的規定，來討論亞洲的地域主義、亞洲的地域關係，不如現在根據周邊國家的朝貢記錄來討論亞洲的政治關係。就這一點而言，長達五百年之久的《歷代寶案》可以說明亞洲的地域關係。透過數位化，《歷代寶案》成為可以從經濟、政治及理論各方面討論亞洲地域關係的資料。就某種意義來說，還可以進行和英國和荷蘭的東印度公司的資料對照討論的課題。全球歷史研究有為了批判過去的歐洲中心主義而被提出來的一面，但在此同時，從系統性、長期性的觀點來說明以東亞為中心的地域關係的課題也得以成立，再加上亞洲也有《歷代寶案》這樣的資料，進而可以從所謂的周邊地域的角度來進行東亞地域關係的研究。

(五)華僑、華人研究（東南亞地域史、移動、商業網絡）

至於這個研究領域，是關於現在東南亞和中國華南的關係，或是移民的問題及其形成的所謂商業網絡的研究，特別是延伸到 1980 年代後半以

降的情形。我研究中國經濟史的時候，除了以國家為中心來主導的計劃經濟之外，還有在上海一帶的「發展經濟」和華南沿海一帶的「民間經濟」。又有以民族為主體的經濟活動的部分，可以稱之為「民族經濟」。更廣泛的說，「華僑經濟」也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特別是最近從海外來的投資活動，包括所謂的「新華僑政策」，及其對海外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從這點著眼，各地的華僑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譬如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臺灣的暨南大學等，從東南亞到東南沿海的大學都是華僑研究的中心，熱烈地討論文化方面的問題，或是所謂商業網絡的問題。在這樣的現狀之下，其中作為華僑、華人研究的課題，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討論，過去是以努力移動和同化(assimilation)為兩大研究重點，至於現在的研究則非常重視文化方面，成為最近華僑研究的主流。

以上這五個項目是現在我注意的問題，或是我自己參與研究的問題。尤其是最後的關於華僑網絡的問題。最近的華僑網絡和印度移民的印度洋網絡的形成有什麼關係，還是彼此不相干，這是很重要的課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經收集了相當多的資料，一方面以新加坡的印度人商會向印度匯款，另一方面透過印度的 ICICI(Industrial Credi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f India)銀行在全國的 100 個分行形成匯兌網絡，作為印度方面的資料。東南亞和華南之間的僑匯，當然也有同樣的華僑金融網絡。因此，在華南和東南亞之間的華僑金融網絡，和東南亞或新加坡與印度之間的印度網絡同時並存。從地域關係的觀點來看，過去緬甸僻處於東南亞的一隅，現在則成為二者交會的重要地方，緬甸的華僑也和其他的東南亞華僑不同，扮演連接印度和東南亞或連接雲南和東南亞的角色，我想又可以增加新的課題。以上所述是我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

二、如何把握近現代中國

(一)制度化中所出現的非制度問題（鄉鎮企業、非制度政治參與）

關於這個部分，請參考拙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觀點〉一文，不過在此我要補充說明一下。首先簡單的說就是如何研究現代的中國或中國近現代化的過程，我對其中制度和非制度的關係很感興趣。就最近以「國際政治」為指引的制度而言，我對制度化過程中非制度的一面比對制度化更

有興趣，也關切把過去非制度的一面予以制度化當作問題來處理的時候，所發生的如何制定不同等級的制度的問題。還有制度規定本身具有各種學門的區別，即便是歷史學中的制度（制度史）或經濟學中的制度（制度經濟學），也有很多爭論。所以雖然很粗略的說，但是我還是想要以在制度化過程中新出現的非制度化因素及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中心來掌握中國的動向。譬如決定外匯匯率的是財政部，還是人民銀行？這是在最近重新制度化的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在過去中國對外封閉的時候，這種事情或許不成問題。關於匯率要由何者決定才好，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在此先把它的情況稍作介紹。所謂鄉鎮企業的民間企業，或是半官半民的，或由地方自治團體經營的鄉鎮企業。這類中小規模的企業簽訂各種合同，在過去契約制度的時候，簽訂合同即是代表商議的結論，也是此後實際開始經營業務的共識。但是現在有的時候簽訂合同，只是代表此後開始坐上談判桌進行商議的意思。也就是說非制度的要素進入制度之中，或是非制度的要素更為突顯。因此，社會習慣或慣例，或是所謂的家族問題，看《中國制度史》這種書的話，全部都以制度來說明，但是在歷史上社會慣例和制度常有嚴格的區別。

我想要從這種制度和非制度的角度，來研究在制度朝非制度化發展的動向中所發生的社會摩擦，或稱之為動態(dynamism)，我認為這樣的動態正圍繞著現在中國的動向而發生。反之，考察明治維新以後已經相當制度化的日本社會、政治制度及經濟制度的時候，如何把非制度的一面導入，或是如何把制度導向非制度化，這樣的課題應該如何處理才好？還有關於政治參與的問題，在社會基層非制度的政治參與成為問題。還有關於所謂的官與民、營利與非營利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官是非營利的、民是營利的，這樣簡單明確的區別。官也要營利，因為只有薪俸難以維持，但是這種活動並不是純粹的商業活動，而是用升官發財的社會肯定來呈現。因此中國有這種官和營利的結構及民和非營利的結構，以此為縱橫軸所形成的象限，作為歷史主體來活動。現在代表民間且非營利的主體一方相當地活躍，因而增加討論這種歷史主體或社會主體的機會，應該如何從制度與非制度的關係、官與民、營利與非營利的觀點來討論。至於日本的話，以政府代表官和非營利、企業代表民和營利這兩個社會主體的區別是很清楚的。但是在中國的話，歷史上代表官和營利的主體及代表民和非營利的主體一直存在，所以這個領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制度和非制度的關

係，應該有它值得注意的地方。

(二)2030年問題與東亞——環境、生態、都市、地域共同體 (community)

因為第二節的題目是有意識地考慮現在的問題，因此我提出 2030 年的標題。關於人口論，根據速水融先生最近的說法（速水融，《歷史人口學で見た日本》，東京：文藝春秋，2001 年），到了 2010 年代的日本，因為戰後人口稠密的一代已經邁入 60 歲，諸如社會福利、退休金、晚年生活等問題，有何因應的對策，或能不能克服這些問題，他對於這方面頗有危機感。同時韓國也和日本一樣，面臨急速高齡化的人口結構變化，到 2030 年左右韓國 65 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百分之十幾以上。和日、韓的這種情況比起來，中國的人口結構是菇狀的，上面的菇頭很大，因為老年人口很多，而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很少，所以下面菇蒂的部分很小。這一代的人到 60 歲的時候人口結構會造成什麼問題，我覺得很重要。根據中國的統計推估，到了 2050 年超過 60 歲的人口有 9.6 億。果真如此的話，全東亞地區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社會結構、人口結構。

關於社會理論，過去韋伯(M. Weber)和馬克思的模式是大理論，1980 年代這些大理論發生變化，現在生態論、環境論、人口論等成為討論的重點，在過去的人口論上增加高齡化、少子化、人口成長等特徵作為研究的重點。我認為今後人口結構、世代結構所形成的問題將成為重要的課題。在討論這種問題的時候，社會究竟應該以國家為單位，還是應該以地域社會特有的標準——如社會共同體(community)——為單位，一定會出現這個課題。我一直認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是，沖繩縣的平均收入在日本全國的排行偏低，但關於人們的幸福感的測度，沖繩縣的得分非常高。可見收入增加不一定與幸福感、安定感直接有關，由此可見各地有各地的幸福感標準。我覺得自己很窮，是根據我自己的標準來判斷；但是認定你很窮，則是根據全球統一的標準認為收入偏低。但是收入很少並不代表當地沒有安定感，我注意到開發論的這種弔詭（悖論），即使在進行全球化的時候，還是經常在地域上呈現出來。因此，前述提倡的研究社會主體的課題，一方面把它從歷史中找出來；另一方面也考慮應該如何導入歷史上的經驗來因應今後的這個課題。

(三)美元和人民幣的國際化——1930 年代與 1990 年代的比較

現在因為各種理由，美元行市非常緊俏，已經面臨危險的關頭。例如英國曾經採用貶低英鎊行市的作法，雖然有海外資產貶值的問題，但是英國藉此把外國貸款一筆勾消。然而現在美元的既定政策卻是提高幣值。1997 年亞洲地區發生的金融危機，和 1930 年代的金融危機互相比較，在 1930 年代日本放棄金本位制度，加入亞洲的銀本位世界，拿來和 1997 年的金融危機比擬的話，就是認定亞洲是一個金融地區，以此來討論日圓的角色。不過從地域性金融和全球性金融的角度來考慮的話，今後中國人民幣的動向將會成為金融政策的課題，而且這不限於只是中國的課題，對亞洲也是很重要的課題。從這個意義來說，第二節的內容就是把現在的課題放在歷史的主題中形成問題來思考的結果，我認為這個議題合乎〈歷史的觀點與現代〉的演講主題。

三、亞洲研究的角度

(一)第二人稱的歷史研究——從關係性出發

至於第三節以下的內容，過去我在某些場合機會已經提到，而且是比較個人性的說法，所以我就簡單說明。我提倡第二人稱的歷史研究，大家一定猜想這是什麼意思。第一人稱的歷史研究可以說是基於學門，而以主張我自己如此認為為中心的研究。第三人稱的歷史研究也許是以資料、材料或超出個人的歷史事物為討論的研究。過去的歷史研究是第一人稱的研究和第三人稱的研究兩者的對話。對這種現況，我想要用第二人稱的歷史研究的形式、以關係為前提來研究歷史，在現在這個全球網絡的時代，已經沒有個別性或個案(case study)本身可供研究，所以我想要探求從第二人稱的歷史觀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歷史的可能性。

(二)作為實態的亞洲、意識型態(ideology)的亞洲（漢學與東洋史、國學與洋學）

雖然環繞著亞洲的定義有各種不同的意見，討論日本研究亞洲論的管道的時候，過去以漢學為中心的日本人，透過如德國的歷史學，以東洋史的形式重新通過歐洲認識亞洲。還有國學和洋學或國學和蘭學的對比、東

方與西方的對比，也都可以討論。重要的問題在下一步，就是東洋史家或漢學家和日本民族主義的關係，譬如說中日甲午戰爭前後很多人大量出版了所謂的《東洋史》這種書。考察這個東洋史的發展脈絡，當然有很多觀點是從歐洲歷史的角度來研究亞洲的歷史發展，但是同時也有研究它如何和日本民族主義銜接的課題。在研究中國的時候，考察日本史的脈絡或日本史中亞洲史的脈絡，也許可以提出討論的課題。譬如說雖然明治維新之後非常強調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但是如丸山真男等人已經指出的，他並沒有提出「脫亞入歐」的說法，而是相對於其他論者所提倡的「興亞」——振興亞洲——的說法，提出脫亞論。所以興亞和脫亞的對比很重要，而且應該進行研究。我認為要把它們放在歷史的脈絡之中來考察，但我也想要沿著亞洲研究的脈絡來研究亞洲論。

(三)全球歷史研究與亞洲地域史

關於這個部分，剛才已經說過了。雖說是全球歷史研究，從地域的主導性或由地域展開的觀點而言，又再回到原來的問題，全球歷史研究還是以美國、歐洲為中心的討論。

(四)環境、醫療、地域共同體(community)（地域的輪廓與地域的價值基準）

回到剛才所說的 2030 年的問題，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題之一，從環境、醫療、地域共同體的角度來進行的研究越來越重要，而且這些研究在中國和日本已經有各種成果出來了。

(五)新增的歷史主體（「單位制度」）

現在中國的「單位制度」正在變化。所謂的「單位制度」是把工作的單位、社會的單位、政治的單位等加以綜合歸屬成一個單位，而這個單位正在變化之中，關於這個情形有很多的討論。對於這一點，首先關切的就是前述提到的制度與非制度的變化，及其對社會制度、戶籍制度、司法制度等帶來的各種影響。

(六)歷史地理、地政論

前面已經提過從空間來研究歷史。過去在歷史地理、人文地理等都有所謂的地域，但在此要提出如何研究地政論（地緣政治論，簡稱地政論，*geographic politics*）的地理和歷史地理的地理，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等課題。從這點來看，世界體系理論也可以視為一種地緣關係。關於亞洲的地域關係，一方面以國家形成或國家主權的議題為中心來進行討論；另一方面正如拙著所指出的中國現在非常強調地緣政治的研究，例如中國的東亞是把日本置於地政論中的地位，這和日本把中國當成一個國家來看，我想是很有差別的。中國應該用地政論來掌握自己的多樣性，我們要如何進行研究是一個課題。

最後，我要說的是從朝鮮半島的韓國到緬甸等大都市，現在都已經國際化了，但是我更有興趣的是還保有地方性的韓國釜山或泰國清邁等地。這些地方的學生在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上討論地域像，十年以後他們運用地域觀念來為政策當局決定政策。這樣一來，從這種角度來創造地域的人才或許和地域研究者有所區別，但這些人才的想法和產生的資料，形成基本的地域研究。他們作為碩士、博士論文的觀點及其所形成的十年後的實況，兩者有何關係。從這點來考慮的話，從朝鮮半島到緬甸，如果能包含印度、西亞等在內更好，不是各地個別產生各地方的資料，而是為了要進行比較來產生資料，例如 *database* 化的資料。這時候什麼是亞洲地域？當地的人們如何認定地域？兩者之間有何關連？我想應該注意這些問題來產生資料。我這幾年在各處走動的時候，思考如果在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中把資料予以 *database* 化，這樣的話，亞洲不只可以作為理念的課題，也可以作為實態關係來討論，以此來改正地域像，透過地域像來研究亞洲，我想要提倡從這種觀點來思考問題。

以上所述是我今天想要說明的內容。作為歷史研究而言，我的看法相對來說也許是對現在或對現代有相當強烈的意識，但相對於 2030 年或 2050 年來說卻只是很短的過程，我們應該做好什麼準備，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而且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正如有著巨大轉機的 1930 年代或 19 世紀的後半期一樣，它們在歷史上的定位和角色，因著 50 年、150 年、500 年的歷史而隨之有各種不同的衡量尺度。因此，我想把現在當作一個意識，要如何來克服，這是一個課題。



研究概況

香港本土中醫藥歷史的研究概況 和史料徵集(1949-2002)*

吳國樑**

一、引言

中國醫學源遠流長。中醫經過千年經驗的累積，配合自身的思想文化，發展出一套獨立的醫療體系。香港自開埠以來，隨著殖民政府的建設，已然發展出一種與中國大陸涇渭分明的規模，但香港的人口始終以華人為主，加上英國殖民政府不干預，使在港華人得以保留華人本身的習俗，華人信服的中醫體系亦得以保存下來。個別評論更指中醫藥行業從前在香港的發展是「自生自滅」（謝永光，1998：20；江潤祥、關培生、梁頌名，1998：xxx）：殖民政府在建立西方醫療系統既沒有打壓中醫藥行業的生存空間，亦沒有投放資源發展這行業。

中醫藥學在香港一直發展，對中醫歷史感興趣的人着實不少，早年有侯寶璋(1894-1967)、¹陳存仁(1908-1990)、²蔣法賢(1903-1974)³等；70 年

* 本文撰作期間，承蒙區志堅博士、彭淑敏小姐協助搜集資料，特此致謝。

** 香港醫學博物館行政主任

¹ 侯寶璋教授本身是 50 年代香港大學醫學院病理系教授，亦是肝病學的專家，其業餘時翻閱中國文史資料，撰寫了幾篇關於中醫歷史文章，討論到中國衛生觀念(1942)、中國解剖學(1949a)及中國糖尿病學(1949b)等專科的歷史、還有從疏證唐詩中找出中唐時期中國瘡疾流行的情況(1960)等。

² 陳存仁是著名中醫師，戰後到港，著作很多，除《中國藥學大辭典》(1935)外，還有《存仁醫學叢刊》叢書，當中除介紹中醫理論、醫學常識外，亦兼及醫史的部份，例如《存仁醫學叢刊》第十及第十一冊介紹針灸的歷史(1955a, 1955b)，第十二冊介紹中國醫學史(1955c)。〔以筆者所見《存仁醫學叢刊》至少出版了十二冊，除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

代繼起的有謝永光(1928-1999)⁴和任勉芝⁵；隨着 90 年代中醫藥學在香港得到較高的重視，中醫藥歷史亦受到更大的注意，江潤祥、⁶關培生、⁷周佳

研究所存有的《存仁醫學叢刊》較齊備外，香港浸會大學存有第一冊〈血壓高及心臟病〉(1953a)、第二冊〈麻疹〉(1953b)、第四冊〈痧疹癰痘圖鑑〉(1953d)、第五冊〈神經衰弱／消渴症〉(1953)、第十二冊〈醫史特輯〉(1995c)。另外香港醫學博物館亦存有第十及第十一冊〈針灸特刊〉上下(1955a, 1955b)的複印本。]

在醫史方面，陳存仁早年出版了《中國醫學源流》(1958)，此書其實是陳氏三篇文章的合集，分別是〈中國醫學史綱要表〉、〈張仲景先生史事考證及年表〉和〈李時珍先生史事考證及年表〉。此外，陳存仁在 60 年代亦出版了《中國醫學史》(此書後以《中國醫學史圖鑑》之名出版) (1968)，簡單介紹中醫歷史的重要部份，特別之處在於以圖片作為介紹中醫歷史的媒介，份量及涵蓋的範圍較前作為大，可謂前著專精、後者博雅。

³ 蔣法賢，1925 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為香港著名西醫生，曾任香港扶輪社社長、聖約翰救傷隊總監、聯合書院校長兼董事局主席。其“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medical science”(Tseung, 1972)是香港早年介紹中醫歷史的英文作品。

⁴ 謝永光，資深報人兼中醫師，其《中醫針灸傳海外》(1970)在總結針灸歷史發展的同時，亦帶出針灸在亞洲、歐洲、北中美洲的傳承，主要將針灸技術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源流和概況作一簡單敘述。

⁵ 任勉芝的《中國醫學史大綱》(1977)是大綱式的資料紀錄，全書共分四篇，每篇以時間斷限，第一篇〈上古時期〉討論中醫學起源、神農與黃帝、巫醫等遠古醫學源流的傳說與考證，下至周秦時代的醫藥發展；第二篇〈中古時期〉分五章討論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金元等各朝代的醫學成就；第三篇〈近代時期〉則有明、清的醫學發展；第四篇〈現代時期〉談及中醫學的轉變與新生。作者舉出各時期的醫學發展特色，例如隋唐時期「兼收並蓄」、宋代「業績輝煌」、明清則「繁博、雜亂與創新」。本書以朝代為綱領，只見各項目的重點而未見帶出各種醫學專科中間的傳承與發展脈絡。縱然如此，亦可見作者對中醫藥學發展的獨到見解或是自己從事醫史寫作的經驗之談，例如談「中醫科學化」在近代的發展，作者指出不能單純認為是「西醫化中醫」或「中醫西醫化」就機械地將西方藥理知識和診斷方法全盤應用在中醫治療上，要「改進中醫，得從整個中醫體系研究着手，即在研究之前，必須經過全面性的學習和吸收。儘管是一點一滴的中醫中藥的文獻，民間經驗，也成為被搜集的對象」(頁 109)，雖然這見解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但放在今天的視野，似乎還是管用。

⁶ 江潤祥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編有《回回藥方》一書(1996)。《回回藥方》是元朝蒙古人漢譯亞拉伯人使用的藥方，今只存四卷，是討論中西醫學交流一個重要史料；在《回回藥方》一書中，還包括了幾篇江氏及其他相關作者探討阿拉伯醫學與中醫學關係的文章。

此外，江氏亦主編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中醫學教材《中國醫學文化叢書》，包括《中醫文選》、《本草研究入門》、《中藥學發凡》(江潤祥等，1998, 1999)；《成方新編》、《中醫臟腑概說》(梁頌名等，1999)。其中如《中醫文選》(1998)選錄了部份中醫藥歷史文章並作仔細注釋，而《本草研究入門》(1999)其中四章就重點介紹中

榮、⁸范家偉⁹等在這方面已積累了初步的成績。近年，區域性中國醫學歷史研究興起，¹⁰加上香港本土歷史概念的強化（Sinn, 1997b；王宏志, 2000；李培德, 2001；蔡榮芳, 2001），在這種環境下，如果我們認為學界對香港西醫歷史的研究已具一種「見樹不見林」的模樣（吳國樑, 2001：84），我們不禁要問香港本土中醫歷史的情況如何？故此，本文將嘗試探討有關香港本土中醫歷史發展的研究及其相關史料搜集的情況。本文所著錄的作

國本草學的發展，包括概論、古籍中本草的記載、本草類別及內容編排、重要本草介紹等，可說是藥物學史的入門讀物。

⁷ 關培生主力研究中國本草，曾增訂出版何克諫的《本草藥性備要》(1995)。他與江潤祥二人合編了《杏林史話：中國醫藥學史論文集》(1991)，全書分〈說補〉、〈藥物史〉、〈藥學史話〉三卷，內容以專題形式討論醫學歷史課題，例如〈說補〉一卷討論關於湯液、粥劑、營養學及傳統食療等醫學文獻；〈藥物史〉則考據燕窩、鮑魚、鹿、真珠、茶、橘、大麻、蘆薈、吳茱萸等藥的源流及其在史書中的相關記載；〈藥學史話〉則從山海經、回回藥方和宋詞等文獻探討中國有關藥物學的紀錄。

⁸ 周佳榮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其先後出版了兩篇介紹中醫學歷史著作研究概況文章（1998, 2001），並在此基礎下，編輯出版了《中國醫學史辭典》(2002)，本辭典編目有別於一般的工具書以筆劃序，全書共分三篇，即「名詞篇」、「人物篇」及「典籍篇」，每篇之下還有若干小節，「名詞篇」以醫藥用語、中醫理論、藥學理論、醫療機構和相關團體、醫學分科及相關學派作區分；「人物篇」和「典籍篇」則以按時序編入分上古至漢代、魏晉至五代、宋遼金元、明至清中葉、晚清至現代和外國相關事項等章節；各條按性質內容入目，共收條目約一千八百多條，當然難免有滄海遺珠，但這全港第一部中醫史的辭典實可被視作一部奠基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書後的三個附錄〈中國醫學史大事年表〉、〈中國醫學史文獻舉要〉及甚為詳盡的〈中國醫學史參考書目〉，甚具參考價值。其實浸會大學方面一直重視中醫史的研究，初期醫史課程由歷史系和中醫藥系合辦，歷史系同時亦進行一個名為“Visions, Persp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 Bibliography Study”的中國醫史文獻研究計畫。

⁹ 范家偉現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力研究後漢至唐代疾病史，其博士論文為《後漢至唐代疾疫流行及其影響：以人口移動為中心的考察》(1997)。除了博士論文外，亦有〈東晉至宋代腳氣病之探討〉(1995a)、〈從腳氣病記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醫學之傳入〉(1995b)、〈魏晉南朝疾疫與信仰〉(1995c)；〈養生與禁忌——以稽康觀點為中心〉(1996)、〈六朝時期人口遷移與嶺南地區瘴氣病〉(1998)；〈南朝醫家入土北朝之探討——唐代醫學淵源考論之一〉(2000)等論文多篇。其中對腳氣病的討論就指出東晉南北朝時北人南移，因為生活環境的變遷而引致腳氣病的問題，下及唐宋，中國醫師經過多年經驗的累積，終將疾病克服。(1995a)這種南遷北人感染地方病的個案，甚為值得地圖史研究的注意，例如蕭璠(1993：67-171)和林富士(2001：22-32)的研究就討論到相關課題。

¹⁰ 個別地區的醫史研究有沈英森的《嶺南中醫》(2000)、朱德明的《浙江醫學史》(1999)、杜建的《臺灣中醫藥縱覽》(1993)、王鏞的《西藏醫學史》(1991)等。

品都以香港出版或香港學者的著作為主，其他地區相關的著作只會酌情收入。又本文只是作者對此題目的初步報告，有關資料的搜集及介紹亦只集中在一般中國醫學，對於其他傳統民間療法，礙於筆者識見，暫不列入介紹之列，而文中如有舛誤，還望各界多加指正，特此致謝。

二、香港中醫藥發展的研究概況

(一) 総論

香港華人普遍接受中醫藥，其在香港的發展遠較西醫更早，有關其在香港發展的研究卻不多亦不深入。蔡永業(1921-2001)的“Chinese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Hong Kong”一文(Choa, 1966)，簡略談到中醫藥的理論及作者一些關於香港人對中醫接受程度的親身調查。任勉芝《中國醫學史綱》(1976)中〈現代時期〉一章就介紹到廣東及香港地區近數十年中醫發展的情況，礙於資料與篇幅，任氏對香港中醫學的發展只列出其大略及重點，例如中醫團體的簡介、二次大戰前後中醫的培訓、針灸科的發展等，(頁135-49)雖然如此，讀之卻使人深深感受到作者對保存香港中醫學歷史資料的熱誠，同時作者在字裏行間或帶出自己的所見所聞，提供了側面認識香港中醫面貌的資料。

資深報人兼中醫師謝永光的《香港中醫藥史話》(1998)是迄今較全面探討一個多世紀以來香港中醫藥發展的作品，全書分章專題論述百多年的中醫由盛轉衰的經過，先以〈一百多年香港中醫歷史〉一文作引子，繼而就個別專題如中醫生的培訓和登記、中藥業的出現、涼茶業興衰、日據時期的中醫、針灸的發展、東華三院、夏季義診、香港著名的中醫師、香港主要的中醫組織和出版資料等作介紹，還有陳述個別極具爭議的事件：在家醫痘條例(1918)、雄黃事件(1960)、火麻仁事件(1980年代)、禁中醫醫眼風波(1958)、毒藥管制(1988)、野生動物管制條例(1995)、多次中藥中毒事件(1980年代至1990年代)等。涵蓋的範圍與資料很多，點出了近百年來，香港中醫歷史發展的大部份重點。然而礙於課題太大，作者在個別問題的考訂上容或有失，正如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所言，在討論1894年香港鼠疫時，作者在基本資料的考訂都出現錯誤，(吳國樑：82-83)更遑論其能夠就香港這次鼠疫及有關這種淋巴腺鼠疫菌的發現作一個深入而詳細的討論了。筆者的評論亦指出，作者受民族史觀的影響，過份強調

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所受到殖民政府的壓迫，但是卻忽略了傳統中醫自身的局限，例如不及西方醫學分科專精和科學，或個別的技術如消毒無菌和止血等亦發展不足，加上華人本身對衛生常識不夠，其實這些因素都阻礙了中醫的發展，斷不能將全部責任推到殖民政府身上。（吳國樑：83）謝氏在逝世前還參與了中國大陸的《中國醫學通史》(2000)現代卷〈香港醫藥發展概況〉一章的撰作，將其著作的重點濃縮編入而成。

在 1999 年，香港醫學博物館曾舉辦了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中醫藥展覽「中醫藥展覽暨研討會——邁向新紀元」，展覽的場刊是香港地區近十年來較全面通論中醫歷史發展的圖文集，其中提及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歷史，唯展覽當局礙於人手有限，加上當時能夠徵集到一手材料着實不多，因此著墨亦少，只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概略的畫面；此外，在展覽的同時還舉行一個研討會，邀請香港著名中醫教授演講，其中江潤祥教授及許少珍教授的演講亦觸及到香港中醫藥教育的發展。（曹美芳等：10-18）

(二) 中醫藥行業：藥材轉運銷售及中成藥

轉口貿易一直是香港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自開埠以來，由於轉口貿易頻繁，一些華商（主要以潮汕籍商人為主，其次為其他粵籍的商人）漸漸在上環形成貨物運送及買賣的行業，即是南北行和金山莊貿易。南北行就是將北線（中國北方）的貨物如藥材、絲綢、糧油食品以至其他土產和南線（南洋）的貨物如大米、香料、海味、木材、椰油等運到香港再轉運出去；其貿易主要對象遠及北美。直到 1868 年，南北行公所正式成立，成為香港早期最重要的同業組織。當時大型的行商如元發行更手執這行業的牛耳。（蔡榮芳，2000：44-48）雖然近年香港華商及商人組織的歷史受到很大的重視，¹¹但對個別行業以至商號的注意還不足夠，以藥材業為例，它是轉口貿易重要一環，在早年，香港的藥材業曾被南北行公所十一

¹¹ 有關香港華人商人的研究有幾個主要的方向，例如華商在香港所建構出來的社會組織、同業公會、行會以及因血緣或地緣等關係所衍生的網絡如同鄉會一類的組織（冼玉儀，1997；Sinn，1990、1999、2000；Chung，2000；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2002）、華商置身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匯、衝擊的殖民地當中的發展脈絡及其徵象（Lee，1998；鍾寶賢，1999）、華裔與華南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吳倫霓霞、莫世祥，1993；Chung，1998）以至與亞太地區的互動情況（濱下武志，2000）、個別華人商號及團體的研究等（蔡志祥 1995、2001；許紫芬，2000；鄧開頌、陸曉敏，1998；趙克進，2001）。

家藥材店壟斷，全港的藥材舖都需要在那兒入貨，（馮邦彥：20）其大宗是可想而知。又如我們會發覺許紫芬(2000)研究「裕有行」和「永義和」的貿易活動中，藥材南北轉運就是這些商號的主要貿易貨物。時至今日，香港上環南北行，特別是皇后街、高陞街一帶還是著名的中藥材批發集散地，可惜，有關香港中藥材行業發展的注意始終不多，只有部份著作提及香港藥材行業轉口的情況。（馮邦彥，1998：15-28；張曉輝，1998：8-16；鄧開頌、陸曉敏，1998：590-98等）

今天生物科技這一行業在香港蓄勢待發，被視為一門甚具潛力的生意，其實香港中藥業與商業經營一向是不可分割的概念，由廣州遷移到來或香港本土出現的著名藥廠有很多，他們生產中成藥售賣。個別研究香港商業史的學者亦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浸會大學歷史系鍾寶賢研究以生產白鳳丸、保嬰丹聞名的余仁生家族多年，已有若干論文在學術會議上發表。此外，馮邦彥的著作也有介紹余仁生家族、及以生產驅風油聞名的胡文虎家族、以生產白花油聞名的顏氏家族等（馮邦彥，1997：125-32）；還有王健儀以小說形式介紹王老吉涼茶家族的發展（王健儀，1986）、張曉輝以掌故式介紹成藥行業在早年的情況（張曉輝，1998：191-99）等。馮氏、王氏、張氏的作品雖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就開拓資料及視野而言，仍有一定的貢獻。香港商業史的重點不是放在中成藥上，但香港歷史悠久的中醫藥店舖（包括藥材店、製藥廠、涼茶舖等）和成藥品牌實在很多，如余仁生、馬伯良、惠元堂、陳李濟、何世昌、李眾勝堂、永安堂、唐拾義、天善堂、靈芝藥廠（十靈丹）、和興白花油、王老吉、單眼佬涼茶等，可開拓的範圍確實還有不少，有些研究就利用這些中成藥品牌在粵港兩地形成的聯號網絡，去考察華商在粵港貿易上經營方式的特色。（吳倫霓霞、張曉輝，1995）此外，最近還有一個新的嘗試，一本名為《香港葫蘆賣七藥》的香港本土中成藥產品圖集（吳文正，2002）將一些具歷史的中成藥品牌的包裝及相關東西展示出來，對於探討早年香港中成藥市場的包裝和推銷，也有一定參考的價值。

(三)中草藥

由於古代關山阻隔，華南兩廣地區所用的南藥，皆屬民間偏方，形成所謂「嶺南」派醫藥療法。（沈英森：1-5；徐國樑：61）嶺南醫學歷史

悠久，在西晉(265-316)時已有嵇含(262-306)的《南方草木狀》（304年出版），至清朝時(1644-1911)也有何克諫(1606-?)的《生草藥性備要》（約1717年出版）及趙其光的《本草求原》（1848年出版）等介紹嶺南本草的著作。（朱曉光，1999；關培生，1995）至20世紀，蕭步丹出版《嶺南採藥錄》，此書經莊兆祥(1902-1982)增訂，在60年代出版了《增訂嶺南採藥錄》（莊兆祥，1964），可見「嶺南」派藥學之悠久歷史。時至今天，香港地區可找到的植物有3,136種，（韋徐潔儀等，2001）當中至少有1,615種被列為有藥用的價值，（李甯漢、劉啓文，2000：5）足見香港草藥的資源之豐富。

香港位處嶺南臨海，其氣候與北方中原不同，就如屈大均(1630-1696)所言：「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泄，陰溼之氣常蒸，陽泄，故人氣往往上壅，腠理苦疎，汗常浹背，當夏時多飲涼冽。」（屈大均：14-15）故此，涼茶是嶺南醫學的一大特色。（徐國樸：61-64）近年香港學者對粵港涼茶的發展亦有討論，例如江潤祥《香港草藥與涼茶》（2000）的出版，除了刊載香港本地常用的涼茶藥材，還收錄了香港植物學權威胡秀英教授的〈中草藥研究歷程〉，是胡氏的採藥心得及學藥小史，實為研究香港中草藥學發展不可多得的資料，此外還有徐國樸一篇〈生藥涼茶與學藥十法〉，記載了香港涼茶業的發展。

除了民間傳承外，早期的香港中草藥研究一直從屬於植物學的研究範疇。（胡秀英，1998：159-69；莊兆祥，1978：1-3；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植物標本室等：1-5）然而，傳統中醫的訓練不可避免與草藥結合，戰後，香港中草藥的研究漸成系統，較胡秀英更早還有莊兆祥教授帶領學生進行採藥及研究草藥生態，這段歷史在莊兆祥的〈采藥三十年之回顧〉（1964）、〈中草藥研究在香港〉（1978）二文得到驗證，莊兆祥本身是西醫，但卻熱心中醫的研究，尤精於中草藥學及中醫史。（謝永光，1998：290-294；李甯漢，1984：4-5）繼起的學生如李甯漢、劉啓文等續其工作，將他們的成果輯錄成《香港中草藥》一書，這套書終在2000年出版了最後一輯，全書共八輯（1978-2000），網羅香港可以找到的中草藥八百種，其中屬香港新發現的草藥共十四種。（李甯漢、劉啓文，2000：6）作為香港中醫發展史的一部份，甚為值得讀者們注意。時至今日，李甯漢等籌辦的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仍繼續舉辦上山學藥團，並且定期出版紀念特刊，將有關資料記錄下來。（劉啓文，1984；另參附表）可以說，香港中草藥的研究至

今天已積累相當豐碩的成果，下一步工作將是如何將現有的成果深化，例如胡秀英教授所指出的要對草藥正確的命名及釐清容易混淆的草藥，進而以科學驗證方法去考證草的功能和藥性。（胡秀英，1998：165-69）當然，如果將這種認藥的歷史記錄下來，就更能為後學提供學習模式及保存歷史作進一步的工作。

(四)民間儒醫與藥販

早年香港新界農村與城市截然不同，雖然有言殖民政府租借新界後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帶來「急速而巨大」的變化，（劉潤和：32-36）但從民生角度而言，新界村民的改變似乎還是不大。更有言殖民政府為了避免沉重財政負擔，當租借新界後並沒有積極發展及改善新界的衛生環境，故此傳統中醫在新界佔有一定市場，加上地域偏遠，新界地區的居民一般不會長途跋涉到市區求醫，只會求助附近鄉間精通醫術的人士。（李光雄：84-85）科大衛(David Faure)對新界西貢和許舒(James Hayes)對香港大潭篤村的研究分別告訴我們，香港早期農村墟鎮裏的醫療服務是由中醫師和藥材店提供，而村民治療疾病則會求助鄰近自己懂醫術的人。一般平民百姓甚至會世代相傳或自學一些醫學知識，而藥物的供應就以自己上山採摘生草藥或在市場向藥販購買為主。(Faure：182；Hayes：44)筆者最近從一位香港大嶼山梅窩老居民的口中所得知的情況也是如此：在五、六十年前，梅窩只有三數小村聚落，政府並沒有在該處建立醫療系統，不單缺乏西醫師，就連中醫的藥材店也沒有，醫療仰賴村中懂醫術的人士，這些人並不以醫療為業，只是遇有村中居民染疾，便在山上採藥作療治。他們的子孫未必繼承父業，但鄉村中總有自學加上經驗累積而成醫的人擔任醫療工作。¹²對於新界農村的醫療情況，我們或可以在一些回憶文字中找到這些早年的鄉間儒醫¹³及生草藥商的一鱗半爪，（胡秀英，2000；徐國樑，2000）但真正將鄉間的儒醫納入研究架構，組織一幅完整的圖像始終不多。其中李光雄就介紹了一位新界西貢墟儒醫翁仕朝（1874-1944）在西貢及海下

¹² 訪談日期：2002年9月12日，博愛醫院陳士修紀念社會服務中心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團。

¹³ 古時有云「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之說，可見科舉失意多轉投郎中之業，甚至有所謂「儒者為醫」、「士大夫為醫」的概念，有關「醫」、「儒」的關係及「儒醫」論述，可參陳元朋(1995，1997)。

附近的醫療事業。（李光雄，2002）儒醫的現象不應該只是出現在新界墟市，早年城市裏華人社區中醫師的經驗應該也有相類似的景況。徐國樑在介紹其父徐子真（1907-1998）在港的醫療活動時就涉及到這個課題。（徐國樑，2000：66-70）

（五）東華醫院

東華醫院是香港華人早年成立的一間以中醫治療病人的醫院，其在19世紀香港華人社會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在20年代初，東華系統陸續發展，成為東華三院，直至今時今日，雖然歷經變故，但是東華三院仍然是本港少數提供中醫服務的醫院。有關東華三院的研究已頗多，茲列舉數項較具代表性者：東華三院對於自己的歷史甚為注意，例如自己編印的《東華三院百年史略》（1970）、《東華三院一百三十年》（2000），這些著作大抵陳述了東華的基本發展脈絡和資料。冼玉儀的 *The Power of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ung Wah Hospital* (Sinn, 1989) 及帆刈浩之的〈東華醫院與華人網絡〉（1999）則是較嚴謹的學術著作，雖然主要討論香港以至廣東華人社區與東華醫院的互動關係，但是前作的第六章在探討 1894 年爆發的鼠疫時，作者亦能以東華醫院角度切入，討論到中西醫因鼠疫所帶來的挑戰及作出的回應，並點出這個中西醫學體系的衝突為中醫所帶來的衝擊。

整體而言，香港本土中醫藥學歷史的研究是一個尚待開發的範疇，我們不難在香港史研究領域裏找到一些零星相關的研究，但很多研究的重點都不是放在中醫藥學發展上，因此我們往往要從側面去把這個題目挖掘出來。要了解本土中醫學發展，進而深化研究各項分支課題還有待進一步的努力。怎樣將這些零星的點連成線繼而形成一幅圖像，相信還要下很多功夫，但相信首要解決的是香港本土中醫學歷史的研究史料問題。

三、香港本土中醫歷史的史料

歷史研究首重史料，就香港中醫歷史而言，筆者因為工作關係，日常都會接觸到很多捐贈文物的人士。筆者發現香港民間保存了大量中醫學古本典籍及其他相關物品，年代大部份是 20 世紀初至中期，這些物件的原來擁有者多已故，其子女們以其物件、書籍不合用而捐贈給文物保存機關。當筆者細問之下，擁有者大都不是以行醫為業，其收藏醫書多作為閒

時閱讀，這足以反映「醫儒不分」的傳統直至本世紀初的香港仍然存在。換另一角度而言，可能就是在政府不設監管、放任自由的情況下，民間市民大眾可以隨自己喜好習醫。這現象不但體認了香港中醫行業發展的一種趨勢，同時亦間接地把很多珍貴的資料保存下來。只是如何徵集、搜羅卻是一個難題。李光雄(2002)對翁仕朝的研究已告訴我們新界居民普遍接受儒醫的診療，單是翁仕朝所藏的醫書已過百冊，資料豐碩。若將視線由早年新界傳統農村社會轉移到城市，民間中醫師所展現的是哪一種模樣、他們又保留了那些材料，實是一個饒富趣味的切入點。

此外，早年個別出版商亦出版一些介紹中醫的資料，例如 1938 年健華印務行出版了一本《香港醫學大銓》（李學榮，1938），此書除了是一本當時的西醫、中醫、牙科、接生、藥廠的名錄外，亦包括多篇中醫學理論文章，撰作的都是如黃焯南、盧覺非等著名中醫師，該書還收錄了中華國醫學會、僑港國醫聯會和中藥聯商會等組織之履歷，實在是今天不可多得研究香港中醫（甚至西醫）歷史的資料集。又例如著名中醫陳存仁在 1950 年代出版的《存仁醫學叢刊》除了介紹中醫學理論外，當中收錄了很多香港中醫歷史發展的資料（參註 2），特別是陳存仁成立「香港中國針灸學院」的「成立公告」、「招生簡章」等（陳存仁，1955c），還有就是《叢刊》中多記錄一些中醫界「時事」及「廣告」，可側面微觀中醫藥歷史發展；而吳倫霓霞、張曉輝(1990)的研究也告訴我們舊報紙上刊載很多成藥聯號的資料；凡此種種對於我們認識 20 世紀上半葉香港中醫藥業界甚有幫助。

同時，各種各樣中醫學的商會、行會、公會、辦學機構、相關團體自由成立，數量實不知凡幾，百花齊放，那又從何入手呢？幸好一般組織都看重自己的位置，所以有關它們的資料是不難搜集，在特定的日子或年份，這些團體總會編印一些徵信錄或特刊等，增加我們對該團體的了解。另外，還有期刊的出版，例如香港中華國醫學會在 30 年代已出版了《國醫雜誌》，是為香港地區第一部中醫學雜誌，在 50、60 年代又有《現代中醫藥》、《中國新醫藥》、《針灸文摘》等，到 70、80 年代又有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的周年特刊、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的《香港中草藥》、菁華中醫學院的周年畢業年刊等。這些刊物一般以討論中醫的理論、疾病的辨證論治、藥物的採集和應用等為主，鮮有涉及香港中醫的歷史，但卻為體驗香港中醫行業發展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例如莊兆祥、謝永光等中醫

前輩的名篇多曾在《中國新醫藥》發表。雖云寫香港中醫的歷史是「吃力不討好」、「容易招惹無謂的是非」，（任勉芝，1976：135）但樂觀而言，由於香港中醫藥團體山頭林立，在歷史和文物的保存上，我們可以著手的地方還有很多，只要訪尋各方史料，多番細閱，詳加審訂，也非不可理出一個圖像來。只是各大專院校收藏的多不完整，我們還要再多花功夫。有關各大學和研究機關收藏有關香港主要中醫藥團體出版的著作資料，可參附表。

民間收藏中醫的歷史資料之豐富實在遠超過我們的估計，可惜我們至今還未能好好把握，更遑論利用其作為學術研究，其中大量中醫人材的口述資料並未得到收集，殊甚可惜！當中部份年紀老邁的中醫師已然辭世，造成很大的損失。舉一個簡單例子，當 80 年代末基本法起草的時候，就中醫的發展曾發生過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執，就是有關於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曾有意刪改其中第一百四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促進醫療衛生服務和中、西醫藥的發展，鼓勵社會團體和私人提供各種醫療衛生服務」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制定醫療衛生服務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種醫療衛生服務」，而令當時的中醫從業員甚感不滿，因為當中刪除了他們認為十分重要的「促進中、西醫藥的發展」，最後經過多番商議，起草委員會才決定維持原貌，不作刪改。¹⁴謝永光曾就此事撰文爭取，（謝永光：385-90）但箇中細節卻未曾得知，曾經參與討論這次事件的多位中醫師如劉錦慶、朱鶴皋、黃志強、鍾紹南、謝永光等皆已作古，在世只剩談靈鈞和李甯漢二人，所幸李甯漢將這次事件及相關相片記錄下來，否則，當時的情景已不可知矣。（李甯漢，2002：73-80）史料是要一點一滴積累，任勉芝研究中醫發展的觀點直到今天還是值得考慮和借鑑。（任勉芝，1976：135）

當下香港政府銳意立法規管香港中醫業界，同時多所大學亦開辦中醫學的學士學位（甚或更高級）的課程，中醫學在香港將會開展一個新里程，際此良機，正好給予我們調配資源，將過往被忽略的重新提起。例如香港

¹⁴ 在《基本法》刊行時，該條成為第一百三十八條，全文如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種醫療衛生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35）此與正文所引部份有出入，特備案在此以作參考，正文所引為部份李甯漢文中所引的文字。

的博物館很重視中醫歷史的保留，以至中醫與西醫的交流；¹⁵多間大學已有自己的中醫藥展覽廳或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至香港大學亦先後設立了獨立的中醫學圖書館、資料中心或中醫學書冊特藏等，各館有關中醫藥的藏書動輒過萬冊，加上各所大學原有香港史的特藏部份，相信在資料保存上已有很大躍進，反而普遍市民以至學界對本土中醫藥學發展的重視尚有待提昇，不過這點是指日可待的，如果多做一些口述歷史兼文物徵集活動，相信對香港中醫歷史資料的保存裨益更大。

四、餘論：展望將來的路向

在中醫史的研究上，大陸地區發展最早，而從事相關研究的多是醫科專業出身，所以重點放在「內史」上；台灣起步稍晚，從事研究部份為非醫者出身，故開闢了一個新的路向，在「外史」下了不少功夫，¹⁶兩者各有所長（當然大陸地區也有從事「外史」者，而港台地區同樣有「內史」的研究）。正如大陸學者鄭金生所言「現在我們分別從外史、內史兩頭向對方開鑿隧道，希望經常交流信息，早日打通內、外史之路。不要形成兩股道上跑車，走的不是一條路。」（鄭金生：35）香港中醫史研究還在起步階段，本文所引述及評介的著作人多是來自大學不同學系的講師教授，也有部份業餘史家，但研究陣容遠不及大陸及台灣的龐大，既然研究人員及機構尚待壯大，加上起步只是近數年的事，所以要做出成績還有待更大的努力呢！然而研究中醫學的歷史無可避免會碰到一些盲點，以台灣的經驗為例，長久以來人文和科學是兩個獨立的課題，歷史系的學生缺乏科學知識的培訓，造成不是醫生便不懂醫理的先天憂慮，而中醫藥系的學生則以其專業從事實證的研究，卻又缺少了對科學與社會當中傳承脈絡的理解和探討，最終使研究中醫學歷史的學者成為台灣史學界中的「弱勢社群」。

¹⁵ 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香港故事」的第六部份「香港開埠及早年發展」，就將香港一間早年的中藥材店「誠濟堂」藥店重新築起來。而香港醫學博物館館內的展覽內容除有針灸、骨傷跌打、中西醫療體系比較等與中醫藥有關的課題，還裝飾有一間中藥材店，透過館內的陳列增加市民大眾對中草藥的認識。

¹⁶ 所謂「外史」，即鄭金生所認為「研究的內容大多是介於社會史與醫療史之間的一些課題，還很少深入中國古代醫學的核心地帶」，是「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研究」。而「內史」則是「直接探討醫學理論源流等問題」。（鄭金生：35）

(祝平一：162-63) 加上台灣史學界數十年的建制，科技及醫療史只能滲入在國別史、斷代史、專題（如經濟、社會、文化）史等領域中，要將這個課題納入建制當中很困難。（祝平一：164）雖然香港與台灣的學術環境有別，香港沒有台灣那種「自體繁殖、山頭林立」（祝平一：164）的極端環境，但各大學的歷史系皆各自有其傳統重點與強項，醫學史根本很難納入其中，雖然香港大學中文系也有開辦中國科技史一課，但終究重點不是全放在醫學上；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曾開辦醫史課程也是個異數，一般而言醫史課程都是由中醫學系自己開辦，於是中醫的歷史便由中醫學系主導，局限了中醫學歷史研究發展的方向和視野。¹⁷既然傳統中醫學的歷史研究已是如此，更遑論邊緣中的邊緣——香港本土中醫的歷史研究了！不過隨著中醫人才的培訓和研究意識的喚醒，希望香港終亦能做出成果。

另一方面，香港獨特的境況也造成中醫史（特別是香港本身中醫的歷史研究）的發展存在其他隱憂。毫無疑問，在香港政府立法規管中醫藥、各大學爭相開辦中醫藥學課程之下，中醫學在香港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可惜落實了這個過往被視為異想天開的政策方向卻反而扼殺着原有民間中醫藥團體的生存空間，例如已有近五十年歷史的菁華中醫學院在 2001 年正式結束，這就表明了民間的中醫藥團體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小。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如何在這些團體離去的同時，能夠將它們的資料及歷史保存下來，將是有志香港中醫學發展者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今天香港接受中醫、學習中醫的人比從前更多，但這批中醫學生普遍對於中醫歷史不甚關注，試問我們又怎樣去建立起一隊更大型的隊伍保存中醫的資料。香港中醫藥的發展一日千里，難道我們真的只希望舊的東西最終存放在博物館裏嗎？例如在 30、40 年代香港中華國醫學會出版的《國醫雜誌》可說是香港中醫歷史發展的一個標記，今天已很難獲得，筆者遍尋各大學圖書館，僅香港大學藏有其中兩期而已（參附表），如果不再妥為保存史料，要認識歷史、認識過去將會是困難重重。

在加強保存史料意識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同時發展香港本土中醫歷史研究的路向，把握香港獨特的情況和現有研究取向，其中可考慮三個層面

¹⁷ 對於醫學史研究的方向和視野，祝平一（1997）和李建民（1997）都提出了很多積極而具建設性的觀點和意見，可參考。

的研究：第一，透過資料的搜集和整合，條理出中醫自身發展的道路；第二，展現出中醫與西醫的由各自為政、互相衝突到今天漸整合在政府架構的過程中，相互之影響；第三，中醫藥與香港商業活動、社會發展以至文化脈絡的互動情況，特別是一些百年老店的經營模式、策略以至形象包裝當中的改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改變與整個在社會發展脈絡的關係。從這三個方向而言，香港的經驗都有著與海峽兩岸不同的景況，如果真能整理下來，加上資訊交往愈見容易，兩岸三地的中醫史研究必定能互補長短，將使我們對自己的傳統醫學以至其他相關文化、社會課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香港主要中醫藥組織出版物一覽表（1920-2002）

名稱	出版機構	收存期數（年份）及收藏地點*
期刊		
中國醫學	中國醫學促進會（香港）	1-3 期(1981-84) HKU/3 期(1984) CUHK
中國新醫藥	中國新醫藥研究院	1-52/55(1954-66) HKU/ 1-48 (1954- 1960) CUHK
中醫研究	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	1-3 期(1974-77) HKU/ CUHK
香港中醫藥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1-2 期(1980-81) CUHK
針灸文摘	香港中國針灸學會	1-4 : 7 期(1966-69) CUHK
現代中醫藥	現代中醫藥雜誌社	2-7 期(1952) HKMMS 1 卷 1 期至 10 卷 3 期(1951-1962) CUHK
國醫雜誌	香港中華國醫學會	13/15 期(1933) HKU
菁華中醫學院畢業特刊	菁華中醫學院	1957-2000 HKU/ 1974/1985/1987 HKMMS/ 1994 CUHK/ 1996HKBU
徵信錄／會章／特刊／論文集		
1991 年國際中醫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中醫學會	1992 HKU/ CUHK/ HKBU
九龍中醫師公會會立九龍中醫學院特刊	九龍中醫師公會	第二屆(1952) HKU
中國草藥藥劑展覽特輯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1977 CUHK
中國國醫學院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香港中國國醫學院	30 周年(1977) HKU

中國醫學促進會章程	中國醫學促進會（香港）	1979 HKU
中醫藥特刊：中國醫藥學會成立五十一年，第四十屆會長理監事就職典禮	中國醫藥學會（香港）	1999 HKBU
中醫藥展覽特刊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1982 HKBU
中藥聯商會所徵信錄（香港）	中藥聯商會（香港）	1-2; 4; 11; 13-14 期(1926-40) HKU
香港中國國醫學院畢業特刊	香港中國國醫學院	第四屆(1951) HKU
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週年紀念特刊（每五週年出版一次）	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	5/10/15/20/25/30 週年 (1974/1979/1984/1989/1994/1999) CUHK / HKU
香港中醫師公會開幕特刊 附 香港中華國醫學會附設醫師研究所學員仁社醫刊	香港中醫師公會	1947 HKU
香港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第三十四週年紀念暨第八屆理監事就職典禮特刊	香港中醫師公會	1981 HKPL
香港中醫師公會復會四十一週年會慶特刊	香港中醫師公會	1988 CUHK
香港中醫學會論文匯編	香港中醫學會	2001 HKU / CUHK / HKBU
香港中醫藥年鑑	香港中醫藥年鑑出版社	1983 HKU / CUHK
香港中藥聯商會所徵信錄	香港中藥聯商會	1937/1939/1940 CUHK
香港中藥聯商會週年紀念特刊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44-47 周年(1972-1975); 49-63 周年 (1977-1991) HKU 47/49/50/55/57 周年 (1975/1977/1983/1985) CUHK
香港中藥聯商會金禧紀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1978 HKU / CUHK / HKBU

念中藥展覽特刊		
中藥聯商會所創辦紀念書	香港中藥聯商會	1927 CUHK
香港草藥展覽	香港中國醫學研究所	1976 HKU
香港菁華學院紀念特刊	香港菁華學院	20周年／40周年(1974/1994) CUHK
夏季贈醫施藥徵信特刊	港九夏季贈施中醫藥委員會／港九中醫師公會	1952-1954 HKU
第一屆中醫中藥展覽	香港中藥聯商會	1972 HKU
第二屆中醫中藥展覽	港九中醫師公會有限公司 香港中藥聯商會有限公司	1973 HKU / HKBU
港九中華熟藥總工會會刊	港九中華熟藥總工會	1956 HKU
港九中藥職工總會週年紀念特刊	港九中藥職工總會	11周年(1961) HKU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周年紀念特刊	新華中醫中藥促進會	20/25周年(1996/2002) HKU

- 各機構的代碼為：CUHK 香港中文大學，HKBU 香港浸會大學，HKPL 香港公共圖書館，HKMMS 香港醫學博物館，HKU 香港大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八期	
論 文	186 頁 平裝 250 元
巫仁恕：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	
賴惠敏：鐵杆莊稼？清末內務府辛者庫人的家戶與生計	
王樹槐：武昌竟成電氣公司，1911-1937	
陳平原：「精心結構」與「明白清楚」——胡適述學文體研究	

從「邊緣」邁向「正統」 ——中國歷史裏的香港史研究*

李培德**

一、引言

1842 年香港開埠至今，已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裏，香港史研究經歷了割讓九龍、租借新界、辛亥革命、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包括香港日佔時期）、中國解放、1960 年代社會暴動、1970 年代民主化運動、1980 年代經濟騰飛、1997 年主權回歸等幾次重大社會變動，由不被重視的「邊緣學科」逐漸演變成一門「本地史學」，箇中可謂錯綜複雜，牽涉到香港本身的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發展。本文旨在探討香港史研究發展的歷史過程，並指出香港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最大特點，既可從自己本身，亦可從中國近現代史去探索香港史研究的特點。

二、香港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¹

香港於 1842 年被割讓予英國，打開香港歷史新的一頁，香港開埠亦即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香港歷史，是否可以完全從中國割裂出來，目前

* 本文曾於 2001 年 11 月 28-30 日在日本長崎縣對馬島舉行的「從周邊看到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之後做了補充和修訂。

**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

¹ 有關香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綜論性文章，可參閱林啓彥，〈香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要〉，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12（1991 年 9 月）；林啓彥，〈戰後香港地區的中國近代史教研成果〉，載《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 年），頁 11-36；林啓彥，〈香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載周佳榮、劉穎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 年），頁 263-288；陳明錄，〈香港學界近年研究民國史的成果〉，載周佳榮、劉穎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 年），頁 289-302。

已不再需要去爭論。一部香港歷史，正可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²坦白說，香港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起步甚遲。於二次大戰前，由於學術研究並不普及，在大學裏並沒有開設中國近現代史課程。當時的香港，並不認為有研究中國問題的需要。

戰後香港社會百廢待舉，大量的中國移民湧入，也包括學者和知識分子。在這批南來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於中國史負盛名的，包括錢穆、左舜生、李璜、黃福鑾、陳安仁、李定一、羅香林、王德昭、全漢昇、司馬長風等人。³處於當時中國政治不穩的情況下，他們對台灣局勢都抱着觀望態度，遂樂意寓居香港，因而打開了香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新局面。由於這批學者都經歷過大時代的變動，他們無不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雖然如此，與當時中國大陸反帝極端民族主義史觀，或台灣過份鼓吹民族史觀相比，香港的觀點和立場都顯得比較溫和和客觀。⁴與戰前相比，戰後的香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有比較好的客觀和主觀發展環境。第一，中文的地位不斷提昇，有利於進行包括中國歷史在內的中國研究；第二，經歷冷戰和文化大革命，香港社會上普遍出現「認祖知宗」的強烈訴求；第三，香港的專上教育有新發展，隨着香港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於 1963 年成立，香港其他的專上教育機構都先後獲得政府認可和資助，得以繼續維持，例如浸會學院、樹仁學院、珠海書院、新亞研究所等，這些機構都是推動香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中堅。

除了這批寓居香港的史學家外，在進入 1970 年代以後，香港逐漸出現一批新的年輕學者，他們與上一代學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留學海外，帶來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新研究方法和觀點。至於香港自己培養的學者，則較多數從事香港史研究，專門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並不多見。香港的史學界，雖然在人才培養方面受外來影響（包括來自中國內地和台灣）甚大，但反過來亦非完全沒有對外產生影響。據筆者粗略統計，曾接受過香港教育的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目前活躍於國際學界而可以追查得到名字的，其實為數不少，約 20 多人。此外，隨着中國大陸對外開放，近年來赴港攻

² Lee Pui-tak edited, *China in Hong Kong history: a multidimension* (forthcoming).

³ 參閱李金強〈民國史學南移——左舜生生平與香港史學〉，載《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期 3(1989)。

⁴ 參閱林啟彥，〈香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263-288。

讀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學位的人數不斷上升，對將來香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學風的傳承，肯定會造成影響。據保守估計，從戰後到目前為止，香港約共培育了 300 多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專業學位。

需要指出者，無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學者，他們研究的興趣都集中於某幾個專題，例如：中港及中國對外關係、中國近代化、人物研究、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等。⁵總的來說，香港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既是中國了解海外的窗口，又是國外進入中國的橋頭堡，香港於連接中國和海外方面，特別是表現於世界華語社區的學術網絡樞紐，香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況且，從政治角度來看，香港相對於兩岸社會，通常予人有比較自由的感覺，這對學術研究的促進，無疑是大有幫助。

三、香港史研究環境⁶

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相似，戰前香港史研究十分冷清，著作數量不多，直至 1960 年代，中英文學術論著加起來才超過 200 本，雖然之後是不斷增加。若從不同分類的角度來看，英文著述是以政法外交題材的數量最多、宗教最少，而中文著述則以文化最多、地方史最少。

表一：中英文學術論著於不同分類和出版年代之比較

	通論	政法 外交	經濟	社會	文化	教育	宗教	地方史	軍事	考古 地理 交通	總數
19 世紀	1 (2)	0 (3)	0 (3)	0 (2)	0 (2)	0 (3)	0 (2)	0 (0)	0 (2)	0 (6)	1 (25)
1901-191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2)	0 (0)	0 (1)	0 (0)	0 (5)
1911-1920	0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1921-1930	1 (0)	0 (2)	0 (3)	1 (1)	1 (0)	0 (0)	0 (2)	0 (0)	0 (0)	0 (1)	3 (9)
1931-1940	1 (5)	1 (0)	2 (3)	2 (1)	1 (1)	0 (1)	0 (0)	0 (1)	3 (2)	2 (1)	12 (15)
1941-1950	3 (1)	2 (1)	3 (1)	0 (0)	3 (0)	1 (0)	1 (1)	1 (1)	7 (15)	1 (1)	22 (21)
1951-1960	1 (0)	8 (6)	8 (6)	1 (2)	7 (4)	1 (0)	0 (2)	0 (1)	0 (8)	1 (5)	27 (34)

⁵ 參閱林啓彥，〈戰後香港地區的中國近代史教研成果〉，頁 11-36。

⁶ 此部分和下文可參考拙文〈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 1998 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載拙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7-33。

1961-1970	1 (14)	0 (8)	4 (8)	0 (8)	2 (8)	1 (1)	0 (0)	1 (4)	2 (11)	4 (10)	15 (72)
1971-1980	5 (8)	5 (13)	4 (15)	2 (12)	2 (9)	1 (6)	1 (2)	1 (10)	5 (13)	2 (7)	28 (95)
1981-1990	31 (6)	24 (23)	16 (28)	11 (22)	49 (14)	4 (6)	1 (2)	6 (9)	18 (18)	7 (13)	167 (141)
1991-1998	56 (17)	37 (36)	49 (7)	19 (21)	79 (17)	10 (5)	9 (3)	2 (8)	19 (12)	11 (7)	291 (133)
出版年不明	2 (1)	1 (2)	0 (2)	0 (0)	2 (0)	0 (0)	0 (2)	0 (1)	0 (3)	1 (1)	6 (12)
總數	102 (55)	79 (95)	86 (76)	36 (69)	146 (57)	18 (22)	12 (18)	11 (35)	54 (85)	29 (52)	573 (564)

注：括弧內為英文書統計數字。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有超過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香港史研究在這個殖民地環境下生存和發展，可謂是一個艱辛歷程。原因十分簡單，主要在於政府的政策是鼓勵還是限制，香港人本身對香港史的看法是積極還是消極。要討論香港史研究環境，不得不從 19 世紀說起。

據統計，19 世紀出版的中英文香港史著述只有 55 本，且絕大部分屬於非研究性質。需要指出的是，這批書多屬於遊記、大事年記或其他文獻式紀錄，有時還不能僅從標題去判斷是否和香港有關。不過，在這批資料、文獻性質為主的著述裏，亦有少數甚具參考價值和值得推介的好書，例如：William Lobscheid, *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with 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religious notion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island*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59); William Tarrant, *Hong Kong I : 1839-1844* (Canton: Friend of China Office, 1861) ; G.T. Hare, *The Wai Seng Lottery* (Canton: s.n., 1894)，其中以最後一本價值較高，對了解起源於廣東的「闡姓博彩」，如何發展到省、港、澳連鎖關係式經營，提供了不少鮮為人知的資料。而 Arnold Wright 著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 Ltd., 1908)，雖然於 20 世紀出版，但該書的製作籌劃，可謂橫跨兩個世紀。由於該書作者從一民族誌角度來記述香港，不僅是西方人社會，本地華人社會都有述及，對了解 19 世紀香港的全貌，甚有幫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鍾勛所著《香港雜記》（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94 年），該書紀錄了當時香港政治、社會、經濟，甚至天氣概況，由於是罕有地以華人的角度摘錄，對了解清末時期的香港，頗有參考價值。

除了文獻式紀錄外，不可忽略的還有少數幾本的研究著述，例如 Ernest John Eitel (歐德理) 所著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Hong Kong: Kelly & Walsh Ltd., 1895)。雖然很多人都批評早期的香港史英文著述，無一不用香港總督任期為歷史分期之界線，形成所謂「行政史觀」，但作為德籍傳教士，歐德理最大的貢獻是沒有忽略當時的本地華人社會，亦使該書成為討論香港華人社會的第一本英文香港史學術著述。

出現於 19 世紀的「重洋輕華」和文獻紀錄式的寫作特點，一直延續到 20 世紀 1930、1940 年代，直到戰後 1950 年代，香港史研究無論是中文或英文的著作，纔逐漸慢慢發展起來。當然，無論從量變和質變的角度來看，真正的起飛是在 1980 年代。在這之前的香港史研究，由於受到殖民地政治環境的限制，香港史作為一獨立學科，不僅沒有被鼓勵，反而對於敏感性的課題，如鴉片戰爭、租借新界等更被禁止公開談論。另一方面，香港雖為中國南方大門，地屬邊陲，美其名曰中西文化交流，但在很多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眼裏，香港仍然是不中不西，缺乏文化和以商業掛帥的社會，因而「文化沙漠」的帽子一直被扣在香港人的頭上不知好幾十年。無疑文化沙漠的背後，是所謂「精英」文化觀，不過當時的精英文化中並沒有太多的香港史成份。因此，香港史研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停滯不前的。在這種政府不提倡，民間普遍缺乏本地史意識的情況下，只有少數外國人從事這方面之研究，再加上當時中文地位未被肯定，本地華人要從事香港史研究，可謂沒有一個栽種的泥土，更遑論茁壯成長。反映這樣研究環境底下的香港史研究，學者多只能從歷史地理、掌故、史話等通俗形式來發表他們的著作。

需要指出，這類的著作亦不乏重視史料和嚴謹方法的作品，所謂西方的考古學，即中國的地輿學，同樣重視考證的研究方法。由於香港史研究環境一直受殖民地條件限制，故華語作者多趨向於古代或政治敏感度較低的選題，研究空間是比較狹小的。於此段期間出版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計有：饒宗頤著《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59 年）、簡又文(1896-1978)著《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簡又文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 年）、羅香林(1905-1978)著《李鄭屋村與香港地區自漢至清初之沿革》（台北：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65 年）、林天蔚著《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

香港事蹟考》(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葉靈鳳(1904-1975)編著的《香港方物志》(香港：中華書局，1958年)、《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香港：上海書局，1970年)和《香江舊事》(香港：益群出版社，1971年)等。⁷

至於在報刊上發表過的包括史地和掌故式的香港史著述，因而很值得注意。據筆者調查所知，比較有代表性的，計有：黃佩佳(1906-1999)、葉靈鳳、吳瀟陵(1905-1976)和林友蘭(1916-1980)。其中，以葉靈鳳和吳瀟陵的文字最多，報刊上的專欄維持時間較長。從下表二可見，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喜歡用筆名，並且都用較淺白的文字撰寫，內容一般涉及地理、風景名勝等。不要小看這些具通俗性的專欄文章，因為這些文章的普及性極可能比嚴肅的學術專著還要高，更容易深入民間。對於一些具爭議性的香港歷史問題，例如香港於開埠時是荒島還是漁村，從葉靈鳳的掌故裏，會找到既輕鬆又令人滿意的答案。⁸

表二

原作者名	發表時署名	專欄名稱	報章名稱	發表日期
黃佩佳	江山故人、中原大俠	〈本地風光〉	《華僑日報》	1931年
黃佩佳	江山故人、中原大俠	〈本地風光〉、〈額涼集〉、〈新界風土名勝大觀〉、〈琴寒館漫話〉	《華僑日報》	1935至1936年
葉靈鳳	葉林豐	〈香港史地〉	《星島日報》	1947年6月至1948年4月
葉靈鳳	葉林豐	〈香港拾零〉	《星島日報》	1953年
華生	華生	〈舊聞新讀〉	《華僑晚報》	1955年4月至1959年11月
葉靈鳳	秋朗	〈香海異乘〉	《天天日報》	1962至1963年

⁷ 此外，還有許地山(1893-1941)所著《香港小史》(上、下)，載《天文台半週評論》，1940年3月28日，頁4及1940年4月1日，頁4；〈香港史地探略〉，載《時報週刊》，卷1期3，頁6-7；〈香港考古述略〉，載《時報週刊》，卷1期5，頁4-5；〈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載《廣東文物》(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頁88-89。詳見盧瑋鑾，〈許地山在香港活動紀程〉，載氏編，《許地山卷》(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1990年)，頁220-237。

⁸ 葉靈鳳，〈香港村和香港的由來〉，載氏著，《香港掌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319-321。

缺	老香港	〈香港掌故〉	《香港夜報》	1962年2月至1963年7月
葉靈鳳	葉林豐	〈香港書錄〉	《星島日報》	1969至1970年
吳灝陵	鰲洋客	〈香港掌故〉	《華僑日報》	1947年10月24日至1953年4月25日
吳灝陵	缺	〈香港勝景〉	《家庭生活旬刊》	1964年11月至1965年12月
林友蘭	缺	〈天堂話舊〉	《星島日報》	1975年4月1日至7月2日
缺	缺	〈香港之最〉	《東方日報》	1976年8月9日至1977年2月1日
林友蘭	缺	〈話說香港〉	《東方日報》	1977年
梁濤	夏歷	〈香港街坊志〉	《文匯報》	1979年7月至1986年1月
梁濤*	夏歷	〈香港生活史話〉	《文匯報》	1986年1月至1988年4月

* 另外，《明報》於1990年初曾闢有〈魯金專欄〉。

1990年10月《華僑日報》重新開闢有關香港史掌故專欄，每月刊一期，取名「香港史天地」，正如王賡武於〈發刊詞〉中說：「香港人多數沒有時間來仔細考究過去的事情；在他們看來，香港是創造財富而不是創造歷史的地方。這種情況現在已經開始了較大的變化，因為有愈來愈多的人看到：正確認識香港的歷史將是促進香港未來安定繁榮的一項重要因素。」⁹這個因應香港史引入中學課程，由歷史教師發起組成的香港史專欄，共出了18期，便於1992年3月停刊。兩年半過後，「香港史天地」又於1994年9月復刊，作出了不少完善措施，很可惜這個獨一無二的香港史專欄，隨《華僑日報》之停刊而於1995年1月8日刊出最後第15期後結束，前後共刊33期。據說，在復刊之前，「香港史天地」的編輯組曾於1992年8月移師《星島晚報》，改名曰「港史天地」，雙周刊出，可惜維持直至1993年4月24日，刊出第26期後停止。¹⁰

除掌故式研究外，其他能代表早期香港史中文著述的還有少數幾本類似掌故，但以史話為標題的作品，包括丁又（原名杜定友）著《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北京：三聯書店，1958年）、林友蘭著《香港史話》

⁹ 參閱《華僑日報》，1990年10月15日，頁25。

¹⁰ 周佳榮，〈黃約瑟博士與《香港史天地》〉，載劉健明編，《黃約瑟隋唐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10-211。

(香港：芭蕉書房，1975 年）。以上所述的掌故式研究，從戰前一直影響到戰後，已經成為中文香港史學研究的一個特色，甚至延續到 2002 年的今天。他們雖非史學訓練出身，但多為新聞或傳媒的資深工作者、作家，有俗稱「老香港」的生活體驗，而且作品數量甚多，如梁濤、子羽、黃南翔、朱維德、吳振邦、周蜜等，均可舉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梁濤 (1924-1995)，他於戰後數十年間，大量收集香港歷史文獻，分別用魯金、魯言、夏歷等不同筆名，陸續發表了為數驚人的香港史著述。在梁濤的作品中，香港掌故佔大多數，他於 1977 至 1991 年期間共發表了 13 冊的《香港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1991 年)。此外，他亦著有：《香港賭博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 年)、《廟在奇中》(香港：文采坊，1988 年)、《香港中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89 年)、《港人生活望後鏡》(香港：三聯書店，1991 年)、《香港街道命名考源》(香港：市政局，1992 年)、《九龍街道命名考源》(香港：市政局，1993 年)、《妙言廟宇》(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4 年)、《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香港：三聯書店，1995 年)、《香江舊語》(香港：次文化堂出版，1999 年)等書，被譽為研究本地史和民俗文化的開拓者。¹¹

四、本地史與本地史觀

進入 20 世紀，陸續有幾本通史式的香港史著作出現，英文方面計有：Geoffrey Robley Sayer 所著 *Hong Kong: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及 *Hong Kong: 1862- 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1939 年完成，1975 年出版) 兩本，Winifred A. Wood 著 *A brief history of Hongkong*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0)、G. B. Endacott 著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及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兩本，Gwenneth Stokes 著 *Hong Kong in histo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5)、Frank Welsh 著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

¹¹ 張靜兒，〈向魯金致敬——本土歷史文化研究繼往開來〉，《明報》，1995 年 3 月 3 日，頁 E9。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等。姑且勿論這些著作是否完全代表外國人觀點，但在研究方法上，部分著作只列參考書目而不加以注釋或列明資料出處，是值得檢討的。至於中文方面，則有劉國英編《香港百年》（香港：友聯出版社，1941 年）、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國編譯出版社，1948 年）、衛挺生、陳立峰編《香港史》（香港：世界書局，1953 年）、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 年）及《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二書。繼羅香林出版了《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之後，便有好幾本利用古代典籍、碑銘、方志及族譜等資料去撰述，以「香港前代史」為主題的論著產生，包括林天蔚、蕭國健合著《香港前代史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蕭國健所著《香港前代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0 年）、《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 年）及《香港古代史》（香港：中華書局，1995 年）等。

在中文香港史著述裏，特別是於 1990 年代，出現了一批內地學者的著作，如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 年）、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 年）、劉蜀永《香港的歷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 年）、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劉存寬《香港史論叢》（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 年）等。很容易察覺到，內地學者的著述都集中出現於 1990 年代，正如學者毫不諱言地說：「爾後直到 80 年代初，香港新界租期屆滿之時日益迫近，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業已開始，國內學術界才猛然感到香港及其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¹²

值得注意的是，1997 年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這是集合了 23 位研究香港問題的本地學者的論文集，有相當的代表性，正如編者所說：「外來移民安頓下來，土著居民對外開放。通過不斷一體化的教育體系，一種新的社會意識開始形成。到 1970 年代，

¹² 劉存寬，〈中國邊疆史地與香港史研究〉，載氏著，《香港史論叢》（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41-242。

一種源自中國價值觀的、獨特的香港意識出現了。它與英國和大陸的主流意識不同。新出現的詞彙『香港人』便概括了這種特性，而這種特性也決定了我們需要對迄今為止所書寫的香港歷史進行徹底評估。」¹³隨着二次大戰後香港社會的變化，本地史意識和本地史觀逐漸形成。

1967 年，香港發生史無前例的社會騷動，姑且勿論騷動後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出現的影響，暴動史向來是中英文香港史研究裏的一大禁區，就算是本地學者亦鮮有人從事這方面的學術研究。¹⁴香港的本地史觀就產生於這種政治上受限制、社會上「本地意識」思想萌生的一種環境，而推動本地史研究的學者，大多土生土長，或因工作關係長期於香港生活，對香港有特別的感情。於二次大戰後的香港，活躍於香港史學界的有：Frank H. H. King（景復朗）、Carl Smith（施其樂）、Dan Waters、Alan Birch（彭雅雋）、James Hayes（許舒）、Norman Miners（邁樂文）、Peter Wesley-Smith（史維理）、Anthony Sweeting（史偉廷）、Patrick Hase（夏思義）、吳倫霓霞、呂元聰、陳劉潔貞、霍啓昌、科大衛、陸鴻基、冼玉儀、丁新豹、蕭國健等人。

1980、1990 年代可以說是香港史研究的高峰期，在此期間不僅出版的著述特別多，在學位論文的數目上亦大大有所增加。如下表三所示，這批香港史研究的「新生代」，無論在研究方法、觀點、選題、資料各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表示出一種既與英國，又和中國大陸主流意識不盡相同的、獨特的本地史觀。如果大家細心觀察便可看到，有不少論文是把香港放入「南中國」的脈絡來進行分析的，這雖不能說是對過去歐洲中心論的反撲，但可以相信，新的本地史意識已經慢慢逐漸形成。值得指出的是，研究焦點並不局限於人物、制度、政治事件，而轉移到社會、商業、文化、生活史範疇。

¹³ 王慶武，〈序〉，載氏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頁 2。

¹⁴ 王宏志，〈「六七暴動」的非論述〉，《信報財經新聞》，1999 年 8 月 26 日，頁 34。

表三

姓 名	博 士 論 文 題 目	就 讀 大 學	年 份
趙令揚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Sir Kai Ho Kai	澳洲雪梨大學	1969
吳倫覽霞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1841-1913*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1976
蕭國健	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香港珠海書院	1983
曾銳生	Great Britain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英國牛津大學	1985
關一球	Deng Zhongxia and the Shenggang general strike(1925-26)*	英國倫敦大學	1985
冼玉儀	The Tung Wah Hospital, 1869-1896: a study of a med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香港大學	1986
梁廣漢	The impact of mission schools in Hong Kong (1842-1905) on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英國倫敦大學	1987
丁新豹	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	香港大學	1988
馮培榮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 developing city: Hong Kong (1900-1980)	英國荷魯大學	1988
蔡志祥	Descent group unification and segment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of Southern China	日本東京大學	1988
陳偉群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lass formation in Hong Kong*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	1989
梁炳華	中英就九龍城寨治權之交涉(1898-1948)*	香港中文大學	1993
李培德	A study of 'new business' in modern China: Canto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1870s-1930s)	日本東京大學	1994
廖迪生	Becoming marginal: a fluid community and Shamanis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美國匹茲堡大學	1995
陳蒨	Tradition inherited, tradition interpreted: a Chinese lineag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英國牛津大學	1995
鍾寶賢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英國牛津大學	1995
馮志明	History at the grassroots: rickshaw pull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1874-1992)	香港大學	1996
黃文江	Christian missions, Chinese culture,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James Legge and	香港中文大學	1996

	<i>Ernest John Eitel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i>		
李光雄	近代村儒社會職能的變化——翁仕朝(1874-1944)個案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1996
朱益宜	The 'new era's patriotic united front,' the Hong Kong ques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reform	美國夏威夷大學	1996
夏其龍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Hong Kong (1841-1894)	香港大學	1998
吳志華	香港警察制度的建立和早期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	1999
黃少儀	Adverti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since 1945	香港理工大學	1999
陳永海	Writing women's words: bridal lament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South China	美國耶魯大學	2000

* 表示已出書。

資料出處：李培德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Frank Joseph Shulman and Anna Leon Shulman compiled and edite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Hong Kong 1900-1997: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在上述本地史意識風氣下，地方社區歷史和文化被重新關注，甚至出現有社區歷史研究的難型。據筆者所知，目前已出版的地區風物志就有以下數種：北區風物志（北區區議會，1994年）、南區風物志（梁炳華編，南區區議會出版，1996年）、大埔風物志（大埔區區議會，1998年）、中西區風物志（梁炳華編，中西區區議會出版，1998年）、油尖旺區風物志（蕭國健編，油尖旺區區議會出版，1999年）。雖然這些風物志是由區議會倡導和組織編寫的，水平參差，但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始，至於如何能夠做到普及，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香港於1997年主權回歸前後的二、三年間，曾掀起一陣懷舊熱潮（nostalgia），¹⁵人們無不以一種緬懷過去和自我認同的心態去看待本地歷

¹⁵ 洛楓根據 Fred Davis 所著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對「懷舊」的思想和意識狀態有這樣的分析：首先「懷舊」有美化過去的功能。其次，是建立自我認同(identity)的途徑。「懷舊」可分兩個層面：「個人的懷舊」(private nostalgia)和「集體的懷舊」(collective nostalgia)。前者是個人歷史與記憶的追思，後者卻是在追思的過程中含有集體的意識、傾向和行為。要使「懷想」變成潮流、變成集體的意識、公眾的行為，大眾

史。乘此熱潮而推出的歷史出版品，如雨後春筍，多不勝數，特別是一些圖片冊、照相簿、畫冊，甚至明信片冊等，都受到市民大眾的歡迎。其實，原因很簡單，只因為社會生活節奏太快，城市面貌變化太速，稍一不留神，對周遭事物已有面目全非的感覺。此外，大眾傳媒對「回歸」新聞的炒作，倒數七・一「大限」反應更是熱烈，由此而產生對自我歷史追尋的動機，可謂並不出奇。奇怪的是，嚴肅的歷史學家反而沒有就回歸之契機發表個人的看法，或藉此闡述回歸於香港歷史上之意義。顯然，香港人對回歸的歷史意識還是薄弱的。

與懷舊熱潮出現的同時，有學者批評香港和內地之間曾有過本地史觀與「國家史觀」相衝突的現象發生。本地史觀學者最不能接受的是，內地學者被國家機器推動來論述香港歷史，¹⁶舉例來說，一些細小的問題在論爭中被「放大」來討論，例如香港於開埠時是不是一個荒島，曾引起不少學者撰文參加爭論。當然，內地學者是堅持香港不是荒島，嘗試推翻過去英國人或西方的一般說法，即認為香港是“barren rock”。這裏面牽涉的是回歸前夕香港的經濟成就和社會繁榮，到底是否全是英國人於香港所創造的成績？中英兩方的爭論點十分清楚，都着眼於英國人從中國手上接下來的香港是否「一片荒涼」，那麼香港的今日成就，是歸功於中國人還是英國人？值得注意的是，持這種英國人為香港帶來繁榮的觀點，不只是英國人獨有，本地華人程摯於1948年出版、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裏，已表述過同樣的觀點。¹⁷由此引發的爭論還推進到香港歷史是否由1842年英國佔領港島開始？當然，中方學者並不贊成此一說法，香港於1842年之前既不是荒島，歷史也不是從這年開始，但同意香港的資本主義歷史是從英國人來到香港之後發展的。¹⁸如王宏志所指出，中方的動機是不要

傳媒擔當了十分重要的推廣角色。藉著傳媒的力量，「懷舊」才會從個人的層面走向普及，形成普遍的認同，通過「懷舊」的形象化，才能形成集體的記憶。見洛楓《世紀末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61-64。

¹⁶ 王宏志，〈歷史的邊緣〉，《信報財經新聞》，1999年1月14日，頁32；〈香港歷史的憂鬱〉，《信報財經新聞》，1999年12月16日，頁36；〈香港的聲音〉，《信報財經新聞》，1999年12月30日，頁36。

¹⁷ 程摯，〈香港簡史〉，載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國編譯出版社，1948年），頁7。

¹⁸ 張海鵬，〈香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人之意義——人文與社會的觀察〉，載《亞洲研究》，

讓英國人帶走所有的榮耀，並且不要讓港人對英國統治有所戀棧。¹⁹中方強調英國的自由政策雖對香港有一定影響，但香港成功總不能缺少這幾點要素：一、華人之貢獻；二、中國為香港背後腹地之事實；三、中國改革開放，給予香港經濟繁榮的機會；四、今後香港脫離殖民地統治，邁向民族主義歷史新的一頁。徐曰彪於其所著〈香港史研究瑣議〉一文中說：「近現代香港史作為中英關係史、殖民主義擴張史或資本主義發展史的重要一頁，在世界史上應佔有相應的位置。有人主張將香港史納入世界史體系，賦予獨特的位置，似屬不妥。誠然，中國史也是世界史的一部份，但世界史實為『列國誌』，中國是『列國誌』的一員，與其他各國平列，這與香港史之於中國史，形式上雖同為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但兩者性質迥異，不宜相提並論。所謂『大香港主義』，立意欠明，易生歧見，似不可取。」²⁰呂大樂對這種以中國為主位而發展出來的香港史論述，亦持保留的態度，他針對回歸前由北京中央電視台拍攝的《香港滄桑》電視節目，指出純粹用民族史觀、中國近代史發展大脈絡去表述香港的「滄桑」，對於向來重視生活體驗和親身經歷的香港人來說，是太遙遠和不奏效。他雖然批評電視節目製作人的觀點和表達方法，但也同時對港人那種只講生活體驗而無「歷史自覺」的性格表示無奈，指出生活體驗充其量只可發展成掌故式的論述，距歷史自覺之境界，還有相當一段距離。²¹

五、結語

如何能進一步開拓香港史研究的空間，特別是對於一些過去被忽視的研究領域和資料，相信是今後香港史要面對的問題。歷史上中國與香港有甚密切的關係，在中國發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香港都難獨善其身，因此中國應保存有不少與香港有關的資料。過去的研究無論是香港本身或香港與中國關係史，都較少有人注意利用中文檔案。此外，台灣現在保存的中國大陸檔案中，有多少是與香港有關的，也缺乏專人去整理。因此，檔案

期 30 (1999 年 4 月)，頁 9-11。

¹⁹ 王宏志，〈勤奮的香港人〉，《信報財經新聞》，1999 年 9 月 23 日，頁 38。

²⁰ 徐曰彪，〈香港史研究瑣議〉，香港史研究現狀與前景研討會論文，1995 年 12 月，珠海。

²¹ 呂大樂，〈〈香港滄桑〉的大歷史觀〉，載氏著，《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閒人行，1997 年），頁 32-39。

的發掘、整理、公開和利用都影響到香港史研究的發展。過去我們把注意力集中於英文檔案，相信中國各省市檔案館，特別是廣州、上海、天津、北京等都收藏不少與香港有關的檔案資料，發掘香港史的中文檔案，確是刻不容緩。香港史，無論是作為獨立的學科，或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部分，都不能改變其本質，從中國近現代史脈絡去探索香港史，正是今後的發展趨勢。隨學科本身受重視程度的增加，新研究資料的不斷湧現，香港史研究大有發展的空間。

筆者有一研究設想，但需數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完全實現，就是將香港和其他地方如澳門、上海、廣州、台灣、新加坡的歷史相比較，以顯現香港歷史本身的特點。如果將香港的百多年歷史和上海比較，正如下表四所示，兩地之間其實有不少共同特點。香港和上海不僅於地理位置上同處於戰略優勢，且差不多同時開埠，更有幾乎相同的歷史經驗，均受英國的影響和被日本侵佔。唯一不同的是，上海比香港建城早，因此開埠後不久便能取代香港，當然在二次大戰後形勢逆轉。港滬兩個中國對外最大的城市，有着千絲萬縷的經濟、文化、社會關係，值得深入探討。

表四：香港和上海的歷史比較（截至 2002 年止）

	香 港	上 海
建城	159 年（維多利亞城 Settlement of Victoria）	711 年（元代至元 28 年，公元 1291 年建上海縣）
開埠	160 年（1842 年起）	159 年（1843 年起）
政治地位	新安縣→英屬殖民地→中國特別行政區	上海縣→特別市→直轄市→經濟特區（浦東）
外來侵佔	日本侵佔，1941 年 12 月 25 日，俗稱三年零八個月	1932 年一·二八事變；1937 年八·一三事變；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佔領租界
地理位置	珠江三角洲（東）	長江三角洲（西）
鄰近城市	澳門、廣州	蘇州、南京
城市區域劃分	殖民地（香港、九龍、新界）	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三界四方並存，浦東浦西分割）*

* 唐振常，〈序〉，鄭祖安，《百年上海城》（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

若把最近二十年香港史的發展和台灣史比較，我們會發現香港史作為

本地史研究，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複雜問題。²²若與澳門史相比，我們比較幸運，保存較多的中文檔案。可是我們與上海史相比，就缺乏那種衝勁、自信和團隊力量，能在短短的十數年間創下傲人成績。²³

目前，香港已回歸中國，進入脫殖民地時期，過去中國與英國於外交上的政治爭執已經告一段落，因此應撇開所有不必要的政治限制，開放香港史研究空間，為將來的發展趨勢鋪路。香港史，亦即是本地史（或稱鄉土史），研究本地史是世界潮流，相信今後香港史研究作為一個獨立學科，還有很多發展空間。處於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新環境，香港實毋須囿於意識形態，在講求研究素質和追求客觀歷史事實的前提下，中文的香港史著述水準必可提高，而在殖民地時代出現的，完全漠視中文資料和華人社會客觀存在現實的英文著述，也將被淘汰。

²² 翁佳音、薛化元、劉燕儻、沈宗憲著，〈歷史知識與國家政策〉，《臺灣通史類著作解題與分析》（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147-159。

²³ 據熊月之著《上海通史》第一卷〈導論〉所記，於1987-1998年間出版之上海地方志共有20種；1994-1998年間出版之上海專業志共有39種；1976-1997年間出版之上海史中文著述共有223種。參閱氏著，《上海通史》，第一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82-184、230-242。



史料介紹

中央研究院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整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計畫概述

莊樹華*

一、緣起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91年元月改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以下簡稱文獻館，之前稱文獻會）典藏日治時期三大檔案，也是過去日本各殖民地中保存至今最完整的史料。此批檔案隨文獻會播遷多次，保存狀況每下愈況，多年前文獻會曾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作成微捲，但效果不佳；近年亦曾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前2,000冊製作成數位化影像，唯亦無法開放利用。

為了讓讀者有一簡單的目錄使用，民國77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許雪姬女士在文建會與近史所的經費支持下，與文獻會合作，主持編纂臺灣總督府檔案183冊目錄。民國8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在其支持之下，由經濟研究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共同與文獻會合作整理該會典藏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另外，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與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亦與文獻會簽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資料之合作研究計畫。基於長期的合作基礎，文獻會於民國86年11月與中央研究院簽訂為期五年的學術合作協議書，進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兩大檔案的整理及數位化計畫，後又延長半年，於91年12月結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簡任編審兼檔案館主任

二、計畫內容

本計畫除由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書，另訂定合作協議書施行細則，規範雙方合作事項、範圍、經費等。整個計畫內容包括檔案整理、編目、掃描、建檔、系統開發。在雙方的分工上，文獻會負責檔案典藏管理、提還卷、編碼、拆卷、裱褙維護及每週數位影像品檢等事項；中央研究院負責檔案清查、編製目錄、建檔、系統程式開發設計等事項。經費分攤上，86 年度由臺灣省文化處補助 1,307,000 元，文獻會亦於協議書上明列 87 年到 91 年的預算金額共計 41,388,000 元，唯五年來實際通過的預算經費為 39,022,000 元。計畫最後半年的經費由中研院提供 4,811,198 元。除此之外，中研院參與計畫的單位包括近史所、台史所籌備處、社科所、經濟所及計算中心，各單位為配合工作的推動亦支援助理及目錄建檔經費。不計入計算中心所支援的人力及設備費用，中研院所負擔的經費亦達 14,769,608 元。本計畫五年半來投入龐大的人力及物力，正如合作協議書上開宗明義所說的「以檔案開放利用為最終目標」，希望將這批國際矚目的珍貴檔案能利用數位影像製成複本，以利原始文件的保存，最後可以資料庫的模式方便國內外人士的利用。

三、檔案內容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從明治 28 年至昭和 20 年(1895-1945)，實際包含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十五年保存公文類及少數的五年保存（大正以後）、一年保存（昭和 17-19 年）文書，另有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舊縣公文類纂、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類纂、土木局公文類纂、糖務局公文類纂、臺灣施行法規、進退昇等昇給行政整理原議及土地申告書等類文書群的總稱，總計 13,144 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包括臺灣總督府與日本政府的來往文書及各項施政檔案彙編，對於臺灣的政治、經濟、財政、外交、司法、軍事、衛生、教育、宗教、抗日等問題，提供廣泛而深入的第一手史料。民國 88 年舉行「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初步成果展示會」，即以埔里水道、霧峰林家、澎湖的海上問題、臺灣神社、鹽水港製糖會社、鹿港辜家、基隆顏家、打狗港、愛國婦人會、鐵道、安平稅關等十一個主題，分別挑選檔案樣本撰文介紹。

臺灣總督府的專賣事業始於明治 30 年(1897)4 月 1 日的阿片（鴉片）專賣，爾後依次加入食鹽、樟腦、煙草、酒及酒精，昭和 17 年(1942)後再依次加入度量衡、燐寸（火柴）、石油、苦汁。專賣局檔案包括一般文書、庶務會計專賣事業台帳、人事履歷書類等，合併專賣局局報在內，總計 12,923 冊。對於總督府的統治政策、人事派系、財政收支、人民稅賦負擔、經濟生活、嗜好消費、族群體質、疾病醫學、生態環境、農村經濟、農業技術等問題，提供廣泛而深入的第一手史料，有助於臺灣及東亞各國區域比較之相關研究。中央研究院於 91 年 12 月舉行之「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成果展示會」即以有關鴉片海外考察報告、日本皇太子來台、臺灣博覽會、七股鹽田、地震災後重建、菸草移民村、賣捌人（指定經銷商）、酒專賣及南興公司為主題，介紹專賣局檔案提供各種研究的可能性。

四、整理經過

本計畫在中研院採取跨所合作的方式進行，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多所的研究人員，共同組成「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以下簡稱整理小組），由劉翠溶院士擔任召集人，其他成員包括近史所許雪姬、劉素芬、洪秋芬、莊樹華，社科所朱德蘭、台史所鍾淑敏及中研院計算中心（以下簡稱計算中心）的張孟元、林晰等業務相關人員，並請王世慶先生擔任整理小組顧問。小組會議每月召開一次，另每兩月與文獻會共同舉行雙月會報。除小組成員外，台史所及近史所檔案館亦支援若干名助理進行目錄建置作業。此外，整理小組並督導三至四名助理於文獻會進行檔案清查、編目等工作。

由於在本計畫進行之前，文獻會已先完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 至 2000 冊的數位化影像，採用 200dpi 的黑白 TIFF 影像規格。因此本計畫自 2001 冊起，進行清查整理，然後採用 150dpi JPEG 的全彩影像規格掃描成數位化影像，並開發檢索系統，以便在網路上開放利用。助理首先根據總目錄核對每一冊文書的內容，訂定文號並查核文書內容是否遺漏，補作目錄，清查之後的文書再交由工讀生編寫頁碼，再由文獻會的工作人員拆頁，送交廠商掃描。由於文獻會已對總督府檔案訂定冊號，也製作成微捲開放多年，為了研究利用的前後一致性，除非不得已，整理小組盡可能不更動類別排序。少部份更動冊號的檔案如下：

1. 舊冊號 10343 之後的文書多為昭和 10 年以後的文件，日人尚未整

理，有些文書只有三、四頁即編為一冊，因此整理小組將原有的 2,906 冊文書合併為 186 冊文書，依年代先後重排序號，新編冊號為 10343 至 10528。

2. 原先編號為 20000 冊以後的總督府法務部（課）參考書類、預算關係書類、定員豫算關係書類、國有官有財產臺帳、書類篇使用許可書等，也因此重編接續前冊號為 11107 至 11521。
3. 原先排在糖務局公文類纂後之官租地一筆限調查書、土地申告書、土地業主查定名簿、民有大租名寄帳、大租權補償金臺帳，併入原編為 20000 冊號的土地申告相關文書群。
4. 土地申告相關文書群根據王世慶先生的建議重新排序如下：土地申告書、業主查定簿、大租權補償金仕譯簿、民有大租名寄帳、大租權補償金臺帳、官租地一筆限調書，並接續於國有官有財產臺帳、書類篇使用許可書之後。

總之，本計畫的檔案整理按日治時期政府檔案管理的原則為基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部分沿用文獻會既有的冊號，〈專賣局檔案〉由於文獻會過去從未整理，冊號全部新編。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和原來文獻會的「現藏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目錄」183 冊的內容均已修正包含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資料庫中。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一覽表

類別	冊號起訖	收錄年份
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	00001-04193	明治 28 年~昭和 09 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	04194-04485	明治 31 年~明治 38 年
臺灣總督府十五年保存公文類纂	04486-07401	明治 28 年~昭和 08 年
收發件名簿	07402-08408	明治 29 年~昭和 18 年
記錄件名簿	08409-08725	明治 28 年~昭和 20 年
永久保存總目錄	08726-08804	明治 29 年~昭和 20 年
十五年保存總目錄	08805-08845	明治 28 年~昭和 21 年
類別目錄	08846-09092	明治 28 年~昭和 20 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總目錄	09093-9094	明治 31 年~明治 38 年
舊縣公文總目錄	09095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臺北縣公文類纂	09096-09313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臺中縣公文類纂	09314-09408	明治 29 年~明治 34 年
臺南縣公文類纂	09409-09570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新竹縣公文類纂	09571-09612	明治 29 年~明治 31 年
臺東縣公文類纂	09613-09620	明治 30 年~明治 34 年
鳳山縣公文類纂	09621-09642	明治 28 年~明治 31 年
嘉義縣公文類纂	09643-09663	明治 30 年~明治 32 年
元臺南縣書類總目錄	09664	明治 28 年~明治 34 年
臺南縣公文類纂	09665-09877	明治 28 年~明治 31 年
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公文類纂	09878-09968	大正 03 年~大正 07 年
指令番號簿	09969-09975	明治 30 年~大正 03 年
臺灣施行法規	09976-10045	大正 03 年~昭和 07 年
進退昇等昇給行政整理原議	10046-10342	大正 05 年~昭和 10 年
臺灣總督府永久保存公文類纂	10343-10510	昭和 10 年~昭和 20 年
臺灣總督府十五年保存公文類纂	10511-10528	昭和 09 年~昭和 21 年
國庫補助永久保存	10529-10923	大正元年~昭和 18 年
稅賦課徵收條例	10924	昭和 16 年度
市街庄稅賦課徵條例	10925-10931	昭和 16 年度~昭和 18 年度
廳稅定期調查成績書	10932	昭和 17 年度~昭和 18 年度
土木局總目錄	10933	昭和 17 年~昭和 18 年
土木局公文類纂	10934-10955	明治 32 年~明治 44 年
糖務局永久保存總目錄	10956	明治 35 年~明治 42 年
糖務局公文類纂	10957-10967	明治 35 年~明治 42 年
臺灣總督府五年保存文書	10968-11062	大正元年~昭和 21 年
臺灣總督府一年保存文書	11063-11068	昭和 17 年~昭和 19 年
資料不全辨識困難簿冊	11069-11106	
元總督府法務部（課）參考書類	11107-11200	明治 30 年~昭和 20 年
預算關係書類	11201-11215	昭和 02 年~昭和 20 年
定員豫算關係書類	11216	昭和 13 年~昭和 18 年
國有官有財產臺帳、書類篇使用許可書等	11217-11521	大正 05 年~昭和 20 年
土地申告書	11522-12693	明治 34 年
業主查定簿	12694-12767	明治 34 年
大租權補償金仕譯簿	12768-12774	明治 34 年
民有大租名寄帳	12775-13076	明治 34 年
大租權補償金臺帳	13077-13122	明治 34 年

官租地一筆限調書	13123-13143	明治 34 年
豫約賣渡許可	13144	明治 34 年
共計	13,144 冊	

專賣局檔案從前均未整理，資料又分置不同空間，加上整理期間文獻會資料室搬遷三次，文書的零亂程度遠超過總督府檔案。專賣局檔案的整理，雖有總目錄、類別目錄、臺帳目錄、收發件名簿及廢棄文書目錄等原檔案整理原則可資參照；然而，一則目錄不全，二則檔案中有許多未標明保存年限，或封皮掉落，或文件零散不全無法成冊，必須靠累積相當之整理經驗後，才能判讀歸類。由於文獻會希望專賣局檔案能比照總督府檔案以流水號排序，但對於尚未分類整理的文書群，流水號是最不科學的編目方式，一旦插號，所有的號碼必須重順一遍。為解決這個問題，整理小組不得已於每一冊號後預留兩碼，以保留插冊空間，如 2100 冊與 2101 冊中需插入一冊，冊號則編為 210010，如此一來，檔案冊號與實體檔案冊數便有落差，專賣局檔案整理後冊號編至 12390 號，但實際檔案共計 12,923 冊。

專賣局檔案文書部分依保存年限（永久、二十年、十年、五年、一年保存）分類，台帳部分依業務性質分類，燐寸、度量衡、石油、苦汁及資源調查及動員等則按年代排序。

專賣局檔案一覽表

類 別	冊 號 起	冊 號 止	實體檔案編號
永久保存、永久追加	0001	200840	1-2048
永久別冊	2009	4456	2049-4741
二十年別冊	4457	4880	4742-5166
十年保存	4881	5087	5167-5393
十年別冊	5088	585110	5394-6204
五年保存	5852	592110	6205-6285
五年別冊	5922	664840	6286-7087
一年保存——事業概況書	6649	6712	7088-7152
出勤簿	6713	6856	7153-7296
文書發送簿	6857	6874	7297-7314

書留送付簿	6875	6886	7315-7326
金券送付簿	6887	6891	7327-7331
送付簿	6892	6930	7332-7370
局內發送簿	6931	6955	7371-7395
郵便切手送拂簿	6956	6974	7396-7414
出張命令簿	6975	7011	7415-7451
日誌	7012	7117	7452-7560
合議件名簿	7118	7161	7561-7606
總督會議文書處理簿	7162	7181	7607-7626
指令件名簿	7182	7207	7627-7652
訓令件名簿	7208	7211	7653-7656
訓件名簿	7212	7218	7657-7663
勤務命令簿	7219	7227	7664-7672
局長接待用品請求簿	7228	7231	7673-7676
發著簿	7232	7234	7677-7679
辭令原簿	7235	7240	7680-7685
職員名簿	7241	7245	7686-7690
傭員名簿	7246	7268	7691-7713
傭人名傭員以下臺帳、命免伺簿	7269	728710	7714-7734
出納官吏、會計官吏命免簿等	7288	7297	7735-7745
營繕工事檢查命令伺簿	7298	7303	7746-7751
人夫使役伺簿	7304	7305	7752-7753
金錢受拂簿	7306	7312	7754-7761
賜暇臺帳關係書類	7313	7326	7762-7776
休暇指令簿	7327	7329	7777-7779
甲乙丙補助簿	7330	7517	7780-7970
雜類(職工進退錄、事務分命令簿、出張命簿、航郵便發送伺簿)	7518	7528	7971-7988
會計臺帳(簿記帳、和式帳、證憑書類、共濟組合、義務貯金、應召軍人後援會等)	7529	9698	7989-10201
阿片	9699	9907	10202-10410
樟腦	9908	9914	10411-10418
食鹽	9915	9930	10419-10434
煙草	9931	10126	10435-10633

酒	10127	10289	10634-10804
收發件名簿（總目錄、類別目錄、簿冊臺帳）	10290	1109720	10805-11612
度量衡、燐寸、石油、資源調查與動員	11098	1184010	11613-12372
人事書類、履歷書類	11841	12163	12373-12696
其他	12164	12216	12697-12749
雜類	12217	12244	12750-12777
戰後檔案	12245	12282	12778-12815
局報（未掃描）	12283	12390	12816-12923

五、影像製作

總督府檔案與專賣局檔案影像數量龐大，影像製作採外包方式進行，由於當時國內尚未有大量檔案影像外製之經驗，市場價格偏高，透過計算中心協助廠商規劃一人操作多台機器的作業模式，得以大量降低製作成本，並成為此後檔案影像製作市場的基準。

影像製作規格為 A3 尺寸以下（含 A3 尺寸）的檔案，大於 A3 的圖表檔案文獻館自 90 年起納入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製作成影像檔案，完成之後與本計畫的影像檔案合併使用。總督府檔案影像以全彩 150 點解析度的 JPEG 格式製作儲存，以目前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影像標準 300dpiTIFF 而言，當時的規格可能偏低，但以 86 年當時國內影像製作仍處於黑白影像的階段，在有限的預算之下，能採取全彩的掃描規格，已屬不易。本計畫完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影像計 2,824,001 頁，〈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檔案影像計 3,785,445 頁，合計 6,609,446 頁，影像總容量高達 10TB。製作完成之影像除儲存於計算中心的資料庫之外，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及文獻館各存有一份光碟備份。

六、資料庫的開放與使用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目錄查尋系統目前已開放於總督府網站 <http://sotokufu.sinica.edu.tw/>，中研院與文獻館雙方對於開放利用辦法經過多次討論協商，影像部分採申請核定制，使用者可直接上網申請，經核可繳費後，取得帳號密碼，即可上網使用。查尋系統預計自 92 年 6

月起對外開放。專賣局檔案俟目錄校對及圖文比對後，採階段性逐步開放。

檢索系統採欄位檢索，使用者必須在所選定的欄位上以關鍵字進行搜尋。為方便讀者使用，系統於門別、類別、目別均作提示性選單，使用者可針對特定的類、目作查尋。

七、結語

由於本計畫的工作地點南北分隔，參與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文獻館、廠商。中研院由多所研究人員參與，五年半來整理小組成員固定參與，建立分工及協調機制；影像製作廠商由華經資訊公司獨力完成，文獻館則歷經多次主管變動及機關改隸。各單位雖有分工，但必須彼此合作，許多問題透過不斷地溝通協調設法解決，整理小組的助理五年半來亦更動多次，因此也有工作經驗傳承的問題等，以致工作的推動遠比一般檔案整理更為困難。在本計畫進行的第二年遇「九二一」地震，助理在水電供應不足的環境下，除了要協助復原工作，又要擔心隨時而來的餘震，部分助理還在文獻館宿舍外草坪搭帳篷露宿，計畫推動過程一波三折，辛勞備至。

此批檔案於民國 91 年底整編掃描告一段落，然尚有許多工作仍須進行，如目錄與影像聯結的校正，必須逐筆以文號核對影像及將檔案中的重要訊息補充在目錄上。另專賣局檔案有 564 冊、總督府公文類纂有 1,865 冊，因文件破損嚴重，而未掃描，日後修裱完成須進行補掃。兩大文書資料庫大於 A3 尺寸的圖表，文獻館目前置於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下進行，這些資料日後均需整合於資料庫中。另外，整理小組原預定將文獻館所藏專賣局局報 108 冊，並調查國內其他單位所藏的專賣局局報，合併納入掃描範圍，後因文獻館推翻成議反對而作罷。將來若能將此一專賣局局報納入資料庫，使用者利用專賣局相關資料將更為方便。此外，總督府資料庫有許多古日文漢字與現代書寫方式不一，這些同義不同字詞，必須進一步作對照，進行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才能提高檢索率。同時作為一個國際性的資料庫，必須考慮未來與其他資料庫整合及交換的可能，因此後設資料庫(Metadata)的設計及國際標準的比對等相關事宜，將是繼初步的檔案整理及影像製作之後，需要再努力的工作。

《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 1895-1927年》簡介

朱蔭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聶寶璋、朱蔭貴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1895-1927)為第一輯(1840-18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的續編。本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已出八種 30 餘冊)系列的一種。作為收集記錄近代中國輪船航運業誕生、沿革和發展的大型資料工具書，在國內外尚無同類可資比較成果的情況下，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中國輪船航運業是中國近代企業產生最早的部門，同時也是其中數量最多、分佈領域最廣、最為活躍的領域。研究輪船航運業發展史，不僅對於中國近代經濟史和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企業史、交通史、金融史、貿易史等等領域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參考價值。

這套資料集在體例上沿襲第一輯，大體按帝國主義在華輪船航運業、輪船招商局和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三大塊劃分。編輯原則是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反覆研究消化資料，提出問題，分立專案(約為書中之「目」)，按問題選取資料，再組織章節編排。全書共計 3 編、15 章、81 節，近 300 個目。由於第二輯與第一輯分屬不同的歷史階段，隨著整體歷史條件的變化，中國近代輪船航運業的發展歷程也必然顯現出不同的歷史階段性。

這套資料集的第一編計分五章，輯錄的是外國在華航運業的有關資料。前四章輯錄的資料集中體現外國航運勢力不同階段的擴張。第五章反映的則是外國航運業資本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控制及其收益。全編反映的重點，是甲午戰爭以前在中國江海航線上居於明顯優勢地位的英國航運勢力，甲午戰爭以後很快就受到迅速擴張的日、德航運勢力的威脅，而且出現外國航運勢力向各地內河航線深入擴張這種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該編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輯錄的資料，從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朝政府被迫向外國列強開放內河航運開始，彙集條列了從東北一直到華南尤其是長江流域帝國主義列強航運勢力進一步擴張的內容。其中尤其反映了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在爭奪中國航權中的咄咄逼人之勢，以及在與各帝國主義列強相互爭奪中國航權的鬥爭中迅速崛起，成為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在華外國航運勢力的過程。

第二編輯錄的是中國最大的輪船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的有關資料。就本時期的輪船招商局而言，同樣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在盛宣懷主持階段，由盛宣懷、袁世凱的爭權到擾攘不斷的內部派系之爭，在體制上雖有商辦、商辦隸部的醞釀，實際上終未擺脫官督商辦的窠臼，業務經營上也未能擺脫封建勢力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以輪船運輸業務為主的輪船招商局對輪船的投資未見擴大，房地產投資卻見明顯增長，運力不強，難以與外輪競爭，只能憑藉與中外少數大公司結成的運價聯盟來維持。然而進入 20 世紀後，這家經營慘澹而資產龐大的中國最大的輪船運輸企業竟成了外商伺機購併的目標，政府也屢欲將之抵押求借巨額外債。當事者因應乏策，幸而未被日郵資本所乘，最終導致一分為二，分立招商局及積餘產業公司兩個單位。迨盛宣懷去世後，招商局仍然處於官商矛盾的紛擾中，終無大的起色。第二編設置四章，其中三章為招商局不同階段的發展進程及業務經營，另一章為「招商局的壟斷地位」，用以進一步探討這家輪船企業的獨特性質。輪船招商局是中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輪船航運企業，至今仍然存在，但在近代中國的狀況卻限於資料分散零亂、缺乏整理而不是很清楚，這部分資料的收集整理，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研究這期間輪船招商局卻又資料缺乏的局面。

第三編為民族資本輪船運輸業的內容，共計六章。在本輯涉及的歷史時期內，最為耀眼的部分就是中國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的發生與發展了。在列強環伺的大環境裏，收回利權的時代潮流顯然成為驅動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發展的動力之一。擁資幾十萬兩（元）的大中型輪船企業陸續出現在中國的江海主航道上，特別是甲午戰後，各地內河資本一般只在幾萬兩（元）以下或是幾千兩（元）的小輪公司大量湧現。限於資料，作出完全的統計，幾乎是不可能的。人們不難看到，凡是外商憑藉特權創辦輪運的內河航線上莫不有華商小輪的蹤跡，在一些邊遠的外商小輪尚未及涉足的內地航線上也會出現華商置輪的活動。大中型華商輪船公司如政紀、寧

紹、大達、芝罘、北海等也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但是，始自 19 世紀末葉的中國近代小輪業十數年的蓬勃發展勢頭並未能順利持續下去。外輪勢力的競爭及封建社會的苛捐雜稅，以及軍閥戰爭的騷擾，使中國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的發展歷程備極艱辛。本編前四章均以不同階段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的發展歷程為主題。第五章集中展示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難以順利發展的癥結，第六章則反映民族資本輪船航運業發展過程中輪船與木船及鐵路間的關係。

本資料集一如第一輯，輯錄彙集資料的物件既有中文報刊、檔案、函牘、筆記、奏章、條例之類，又有英文、日文、外交檔、專書和各種報章雜誌，由於資料範圍廣泛龐雜，加上時代不同，繁文縟節、虛應故事所在多有，所輯資料大多難以保留全文，只輯錄有關段落或有關文句，均以能說明問題作為收集與取捨的標準。

總之，這部資料集集中彙聚和系統反映了 1895-1927 年間輪船航運業這個近代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最活躍、涉及面最廣和數量最多的行業中出現的種種變化和發展趨勢，並編制了若干統計表與文字資料相互印證。可以相信，這套資料集的出版，必將對中國輪船航運業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相關研究，以及對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的深化擴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對於學術界加深瞭解中國社會特色，探求中國社會經濟傳統中綿延不絕的活力，把握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規律等等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3)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六)

作者：張麗俊	(五)精裝 550 元 平裝 500 元 459 頁
解讀：許雪姬・洪秋芬	(六)精裝 500 元 平裝 450 元 452 頁

《水竹居主人日記》是豐原下南坑人張麗俊所寫的日記，日記以工整楷書，詳載日本時期豐原的民生、社會種種，時間長達二十八年。藉由本書可閱讀到當時商社經營、人際悲歡、台灣禮俗及張家的家族史等第一手資料，是研究二十世紀前半台灣社會變遷重要的史料。

關於近代貴州鴉片檔案存藏 等情況的補充

秦和平*

2002年初，我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3期撰〈近代西南地區鴉片史料的種類與存藏情況介紹〉一文，對貴州省檔案館存藏的鴉片資料作了如是介紹：

貴州的檔案情況，我不瞭解，但從貴州省社科院研究者輯錄的資料及文章引證來看，該省檔案館存藏的資料極少；即使有，數量也不會很多，內容仍集中禁政。究其原因，估計與當年貴州的禁煙運動開展較為順利有關。

拙文雖蒙貴刊惠予發表，然我自己畢竟沒有親自在貴州檔案館查閱資料，心裏總感到有些不踏實。最近為尋找其他內容的資料，我來到貴陽，特地到貴州檔案館等單位查閱檔案，印證拙文結論的當否。

經實地查卷後，我認為拙文的表述基本沒有錯誤，但其中「該省檔案館存藏的資料極少」這句話應更正為「該省檔案館存藏的資料比較少」。為何將「極少」更改為「比較少」呢？在介紹貴州省的相關檔案後，再解釋緣由。

有關清季的禁政資料，貴州省檔案館相當地缺乏，它們對此也不隱諱。該館主要存藏是民國時期的資料，其分類如下：

- 一、禁煙機構的檔案，內分(1)貴州省肅清私存煙土公署(1939.8-1940.3)，全宗號 M19，計 226 卷；(2)貴州省禁煙特派員公署(1937-1948)，全宗號 M20，計 18 卷；(3)貴州省禁煙督察團(1940.11-1941.3)，全宗號 M21，計 5 卷。以上三者合計 249 卷。
- 二、民政廳的「禁煙禁毒類」檔案。民政廳檔案的全宗 M8，案卷總數達 8,667 卷，但其中的禁煙禁毒類案卷數量有多少？該館沒有說明。

* 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與其他檔案館的作法不同的是，貴州省檔案館對外不披露卷宗目錄而公布所謂「專題目錄」。其公布的禁煙禁毒檔案分有綜合、法規、組織、禁種、禁吸、禁運、查緝煙稅和土膏行店這 8 類專題，裝入編號為 15、16 兩木盒中，我初步估算有 2,000 餘份文件，多數係民政廳的檔案(M8)。我們暫不考慮其中的重複部分，按照每個卷宗約存 20 份文件折算，民政廳的禁煙禁毒檔案約有 100 個卷宗，連同前述禁煙機構的檔案合計，共有 400 個卷宗（包）。與雲南、四川省的相關檔案比較，貴州省存藏的禁煙檔案數量的確少量。

需要解釋的是，為何我會得出檔案「極少」的結論呢？固然與我沒有到貴州省檔案館查閱有關（拙文有說明），主要受貴州學者較少利用檔案的影響而得出這不妥當之結論。其中的緣由，此次我親臨其地才明白：在西南三省的歷史檔案中，貴州的檔案是學者們利用最少的，大有「拓荒」之價值。

四川省檔案館在成都市花牌坊街，雲南省檔案館在昆明西昌路中共雲南省委內（1998 年前如此，據說目前搬至昆明東陸飯店附近，街名不詳）。此兩處檔案館的資料，中外學者利用較多，不用多說。貴州省檔案館位於貴陽市西南方的嘉潤路（原倒岩路）。該檔案館因新近建成使用且因位置偏僻，新版貴陽地圖沒有注明，多數市民尚不知道，尋找相當不容易，但乘公共汽車或中巴車比較方便，在冷庫站下車，走數百米即到。

檔案館的開放時間，各省級檔案館大同小異，按規定的作息時間延後或提前約 20 分鐘。但到貴州省檔案館查閱檔案須注意：(1)下午 5 時左右須離館；(2)星期五下午為該館的業務學習時間，不提取檔案，但利用接待部允許查專題目錄。

四川、雲南省檔案館均提供卷宗目錄，並注明卷宗的頁碼，費用按查閱者提取的卷宗數量收取。¹貴州不提供卷宗目錄，只提供專題目錄，收費則按查閱者提取卷宗的頁數按每頁人民幣 0.1 元標準收取。如，某卷宗有 200 頁，涉及的專題內容只有 3 頁，收取的費用不是 0.3 元而是 20 元。在複印檔案方面，四川、雲南均要加收一定數量的檔案保護費，貴州則不收取。我個人認為，就查閱者而言，四川、雲南兩省檔案館宜多提卷宗、多抄錄、少複印；貴州則相反，少提卷宗、少抄錄、多複印。

¹ 四川省檔案館每個卷宗收費 2 元錢，雲南省檔案館的收費標準也差不多。

編後語

謝國興*

1986年3月，在當時任近史所所長的張玉法院士規劃催生之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半年刊）創刊號誕生了。這份刊物一開始就定位為登載報導海內外中國近代史的相關研究動態與訊息，而不只是「近史所研究通訊」。也因為這樣，我記得早期輪值主編者都會特別注意近史所同仁在撰稿時不能出現「本所」如何如何的文句。

作為一個近代史研究訊息的溝通媒介與互動舞台，十餘年來《通訊》扮演了相當耀眼的角色。早期《通訊》的海外流通對象是日本、歐美的主要大學（有漢學研究）圖書館及少數漢學家，1990年代起逐漸擴及海內外個別學者及中國大陸的學術機構與學者，同時外稿中來自大陸的比重也愈來愈高。最早訂定的「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要點」規定，每期通訊篇幅以五萬字為度，也就是50頁左右。實際上50頁的限制目標從未實現過，多數在150頁至200頁之間，第11期甚至多達316頁，也就是三十萬字左右。起初《通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由近史所所長指派，任期兩年，編輯委員中推一人任一期執行編輯，另外指派兩到三位新進研究人員當助理編輯，張力先生及李達嘉先生是早期出力較多的兩位助理編輯，尤其草創期多借重張力先生在編輯體例與排版印刷方面的經驗，奠下良好基礎。後來近史所成立四個學術分組，就由四個組輪流主編，輪值的學術組成員自行組織編輯委員會，推定執行編輯負責編務，助理編輯則由近史所出版小組（委員會）派員支援。2002年12月，因中央研究院組織調整，各所原有的學術分組取消，《通訊》的編務輪值方式也勢必調整。

《通訊》發行迄今，已進入第十七個年頭，早期可說是中文發行報導中國近代史研究動態最重要的資訊，也是發行範圍最廣的一份刊物。不過隨著電腦與網路科技的發展，資訊流通速度加快，每半年發行一次的newsletter顯得有點不能及時；後來又有《漢學研究通訊》（台北漢學研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究中心主辦)、《近代史學會通訊》(台灣的中國近代史學會發行)出現，近史所的部份同仁遂有檢討《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是否必要繼續發行的意見。2002年9月，陳永發先生接任近史所所長，在沈松僑副所長輔弼下，全面翻修近史所各項規制，《通訊》去留或改版問題也提出討論。基本上大家對於每期《通訊》往往以皇皇巨冊方式呈現多不表贊同，部份同仁甚至主張停刊，後來達成初步共識：《通訊》仍舊發行，不過應改版精簡或配合發行網路電子版的方式進行。

第35期《通訊》原由「一般近代史組」輪值編務，預定出版時間是2003年3月。由於去年12月學術分組取消，加上《通訊》是否改版或去留問題的確切方向有些渾沌，編委會的組織遂成不上不下之局。在此過渡時期，由於本人是「一般近代史組」的末代組主任，經陳永發所長指派負責本期編務。本期在「精簡」的精神下，篇幅大約十萬字左右，已是創辦以來最瘦身的一期。未來《通訊》的發展方向，除了原有的書評部份已移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刊登外，如何配合網路版繼續發行紙本，篇幅、內容、排版如何改善，目前正在研議之中，今年(2003)下半年，或許改頭換面的《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就會呈現讀者諸君面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82)

林金莖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黃自進 紀錄：簡佳慧

320頁 平裝 300元

林金莖，1923年生，台南縣人。1946年公費保送國立復旦大學，1948年轉入台灣大學法律系，1962年取得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碩士，1965博士班課程修畢，1988年獲頒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法法學博士學位。1950至1952年期間，連續通過高考普通行政、律師及外交官領事官考試。公務生涯曾任司法行政部(今法務部)秘書、省民政廳科長，外交部亞太司專員、專門委員兼科長、駐大阪領事、駐日大使館政務參事、亞東關係協會駐日副代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駐日代表及亞東關係協會會長等職。林先生依其卓越的法學素養及職業外交家專長，致力於中日外交工作四十餘年，期間並與日本朝野政壇領袖、各界菁英建立深厚情誼。為中日斷交後，落實兩國之實務關係，奠定良好基礎，其豐富的閱歷，更為中日交流留下最佳的見證。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無聲之聲》會議論文集三種

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

主編：呂芳上

295 頁 平裝 300 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劃群於 2001 年 8 月，邀集國內外跨學科的學者，召開「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就各項議題交換研究心得，討論可深入開發的研究領域、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互為切磋。會後將審查通過之論文結集成三本論文集。本書是其中一冊，即《無聲之聲：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一共收入 9 篇論文。顧名思義，本書的內容多與國家、政治、公私脫不了關係。這 9 篇論文在時間上涉及 15 世紀以降，一直延伸到 20 世紀 50 年代，在地域上有中心、有邊陲，在內容上涉及勞動婦女、女性詩人、女奴妹仔、女漢奸與女幹部等；在使用的資料上，有公私文書，也利用口述歷史，整個的內容廣泛，有新視角，顯示婦女史研究走上五彩繽紛、多彩多姿的境界。

無聲之聲(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1950)

主編：游鑑明

285 頁 平裝 280 元

1600-1950 年的近四百年間，中國女性從傳統跨入近代，無論是傳統女性或近代女性，她們的命運與家庭、社會或國家密不可分，留下的歷史更是曲折多變。這本書收錄的 9 篇論文，分別從女命批斷、溺女記敘、家庭糾紛、再嫁問題、婚姻策略、婚姻型態、女裝演變、健美觀念與服裝改革運動論述女性歷史，因關注的視角不同，這 9 篇論文呈現個別差異，也存在著不少共同話題，貫穿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無聲之聲(I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1600-1950)

主編：羅久蓉・呂妙芬

410 頁 平裝 400 元

婦女史的研究，已成為晚近史學研究新開發的重要領域。傳統歷史，婦女位處邊陲，如今婦女歷史的研究，在提高婦女社會地位，使無聲者發聲。本書收錄 9 篇論文，時間上由 15 世紀到 20 世紀 50 年代，地域上有中央、有邊陲，對象上有勞動婦女、女詩人、妹仔、女漢奸、女幹部，還有兩性知識份子。論文多能利用公私文書和口述歷史，作深入的探究。對了解近代中國婦女與國家、政治、公私關係，本書實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新的詮釋角度。

本期要目

「國家、地方、民衆的互動與社會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簡述

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 100 周年」會議紀要

「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近代國家的塑造」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

歷史的觀點與現代——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香港本土中醫藥歷史的研究概況和史料徵集(1949-2002)

從「邊緣」邁向「正統」——中國歷史裏的香港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作整理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計畫概述

《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二輯，1895-1927年》簡介

關於近代貴州鴉片檔案存藏等情況的補充

編後語

